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伟人之初 领袖篇

刘少奇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丛书献词

我们在近现代中国悲壮而撼人的历史画卷前肃立、沉思！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一个个名字不停地闪烁，一条条对理想苦苦追求的轨迹清晰地呈现。

如果有人问：谁的理想最宏远，谁的追求最理性，谁在中华民族的自救和解放道路上洒下了最多的热情与鲜血？历史已经昭示，那就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面对着这一代震古烁今的共产党领袖们，我们常想：同处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为什么他们能走出封建中国凝重的历史和文化壁垒，在改造社会中不断抛弃旧我，完善新我？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宏大的理想，如此不屈的求索精神，如此撼人的牺牲精神？为什么他们能脱颖而出，成为领着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与富强的领袖，成为我们这个悠久、灿烂而又一度落伍的古老民族的脊梁？

我们企望沿着他们从平凡走向伟大所留下的履迹寻求答案。

我们努力地求索。

我们坚信，这中间蕴含着一个不屈民族永恒的内力。

我们还坚信，中华民族走向明天的灿烂与辉煌，依旧需要这种永恒的力量。

《伟人之初》丛书，正是我们这种努力的记录和结果。如果青年朋友们在与这些也曾从年轻时代走过来的伟人们的心灵对话中有所启迪的话，那末，这就是对我们这种努力和追求的最大鼓励。

《伟人之初》丛书编委会

刘 少 奇

一 求知若渴的学子

宁乡花明楼

湖南省自古称芙蓉之国。

位于这清浥之境东北部的宁乡县，山清水秀，美丽富饶，历来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宁乡县西部的伪山，是唐代佛教禅宗五家之一的沩仰宗的发祥地，沩山密印寺因而成为名胜。与伪山相毗连的官山，葬有宋代抗金名将张浚和著名理学家张南轩父子的陵墓。宁乡地域，东屏长沙，北抵桃江、益阳，南接湘乡、湘潭，西连安化、涟源各县。在这里，三国东吴始设新阳县，后晋而改新康，到宋代才定名宁乡。

刘少奇的家乡花明楼炭子冲，就坐落在宁乡县西南隅。这里山丘绵延起伏，层峦环拱，林木繁茂，堆青叠翠，粼粼靳水自西而贯，阡陌纵横，田园一片。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人杰辈出，宁乡县也不乏其人。何叔衡、谢觉哉等就都是宁乡人。如今更因刘少奇的关系，宁乡县与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在湖南一样有名，炭子冲与韶山冲同为人们所敬仰的地方。 1988 年，在花明楼炭子冲刘少奇的故居旁边，建成了刘少奇纪念馆和一座巍峨的刘少奇铜像，使这地方更加璀璨光彩，令人流连忘返。

在刘少奇纪念馆开馆典礼和刘少奇铜像揭幕仪式上，国家主席杨尚昆在讲话中热情洋溢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十一月二十四日，是刘少奇同志九十周年诞辰。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举行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开馆典礼和刘少奇同志铜像揭幕仪式，是为了表达全国人民对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怀念，是为了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一百多年来，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中国的无数先进分子进行了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人站在这个斗争的前列。刘少奇同志便是他们中间涌现出来的一位历史巨人。

“他从年轻时起，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长期斗争烈火的冶炼和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使他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即便在极端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他总能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独立地把握方向，打开局面。他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一起是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①]

历史，就是这样刻下的。

[①] 杨尚昆：《刘少奇与中国人民的事业同在——1988 年 11 月 24 日在刘少奇纪念馆开馆典礼和刘少奇铜像揭幕式上的讲话》，《刘少奇研究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版，第 1 页。

耕读之家

刘少奇，名绍选，字渭璜。1898 年 11 月 24 日（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十月十一日），诞生在花明楼炭子冲一个世代农民的家庭。因在叔伯兄弟、族中平辈九人中排行最后，故被称呼九满，又叫九伢子。

刘少奇的家，建在炭子冲口开阔地带，坐东朝西，前抱几株依依杨柳，拥一潭池水，后倚小丘，是一座年代已久的砖木结构普通四合院，茅瓦屋相兼。从槽门过小坪，升阶而入，正中至右，便有正堂、正房、卧室、饭厅、烤火间、猪牛栏、难房等，为典型的南方农家院子。

据《宁乡南塘刘氏初修族谱》记载，刘少奇的祖籍原在江西省吉水县。有祖于明朝中叶在湖南省做过知县，离任后没有再回江西，迁居花明楼南塘一带始事田园生活，躬耕生息。从族谱记载所知，刘少奇的先辈以“耕读”为传家祖训。康熙年间曾任宁乡县知事，后来当了朝廷都察院御史的陈嘉猷，为《宁乡南塘刘氏初修族谱》作序时，就对此褒扬说：“南塘刘氏族虽不甚显，而族之人士俱极老成持重、耕读传家，汉书所谓孝弟力田、管子所谓秀民足赖者庶几近之，吾有以知其族之必大且昌也。”

刘少奇家当时属宁乡县五都芳储乡。五都相当于现在区的建制，管辖五六个乡。五都现为道林区。炭子冲，距宁乡县城六十多华里，到湖南首府长沙也差不多里程，除了交通那时候不是大方便外，地方不算太偏僻。这里山多田少，清朝时人以烧炭为生，炭子冲由此得名。离刘少奇家五六里地，有个清溪煤矿，后来又叫双狮岭煤矿，可开采少量煤，使这个贫困落后地方的人们增加了些经济门路。据说刘家的小有发迹同双狮岭煤矿还有一点关系。

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在洲在炭子冲打长工几十年，起早摸黑地劳作，省吃俭用积攒下一些钱，买地置产，多方经营，使家道日渐兴发，在炭子冲终于成为一户殷实人家。刘少奇的祖父刘得云好像只不过是一个平平的传接人，并没有作出多大发展。

刘少奇的父亲刘寿松（又写作刘寿生，“松”和“生”在湖南人的发音中相近），也是“耕读传家”的躬行者，稍有文墨，为人忠厚，一生没有离开过土地。刘少奇回忆，他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间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指挥生产”。在刘寿松的带领下，合家大小，男男女女，个个辛勤劳动，不吃闲饭。

刘少奇的母亲鲁氏，道地劳动妇女，克勤克俭，精于操持家计，把个数口之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刘少奇有兄三、姐二。大哥刘墨卿，是帮衬父亲种田的主要劳力。二哥刘云庭，在族中排行第六，所以也称六哥。刘云庭有一副好脚力，做过轿夫，当过长沙新军的兵，对刘少奇较有影响。三哥刘作衡，在族中排行第七，所以也称七哥。刘作衡心眼比较活，很能算计，开个铺子，酒也打，米也卖。刘少奇的气质与刘作衡不大相得。

农家儿参加劳动早，刘少奇六岁便帮家里干点割草、铡草、看牛、捡柴等零活，脚湿朝露，晚滚一身泥。风风雨雨，凉凉热热，对他来说是从小惯了的，算不得什么。八岁开始上私塾，在离家不远的拓木冲受启蒙教育。

“ 刘九书柜 ”

拓木冲的塾师叫朱赞廷，人品端正，乡里人尊重他，称呼朱五阿公。当时朱老师的私塾里，有学生三十多名，刘少奇是其中年龄较小的，却最肯用功而守规矩，品学兼优。

朱老师家的房前屋后栽了许多桔子树，一到夏秋，满树绿盈盈、黄澄澄，这景象着实逗人。八九岁的孩子哪个不喜耍好闹，禁不住手底发痒，伸向枝头摘取果实。这原也是没奈何的事情。可刘少奇从不这样做，他克制力强，自尊自爱，不乱方寸。对此，朱老师默察在心，很喜欢刘少奇。有一次，朱老师特地摘了几个成熟的大桔子奖给他。刘少奇恭敬地接过桔子，并未独自去吃，而与在场同学一起分享。刚要入口，从外又进来一位同学，刘少奇马上又从自己留下的两瓣桔子中取一瓣分给了那位同学。孔融让梨，是中国历史上传颂了一两千年的佳话。刘少奇的这一类似举动，惹得朱学究一腔感慨，他语重心长地启发学生，做人就是要有这种美德，要有关心他人的品格。朱老师的这种现场教育，对孩子们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特别是对被表扬的刘少奇。所以刘少奇曾说：“我永忘不了这位教我识字，教我做人的启蒙老师。”

1961 年 5 月，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刘少奇，在阔别了数十年的家乡作调查研究时，得知自己童年时代的启蒙老师朱赞廷的遗孀朱五阿婆还健在，就同自己的夫人王光美，一起去看望了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刘少奇以浓重的乡音向她嘘寒问暖，祝她健康长寿，并追忆了往事。如今在“ 刘少奇同志故居 ”的展览室里，还挂有这张在安湖塘食堂看望“ 师母 ”的照片。参观者看到它，缅怀刘少奇尊师敬老的高尚情操，无不动情！

九岁和十岁，刘少奇还先后转到罗家塘和月塘念了两年私塾。无非都是读四书五经，聆听老先生入神的琅琅诵读，以及他们自己也“ 不甚解 ”的讲述。一般儿童常常因乏味而对学习产生厌倦，把坐板凳作为一件苦差使。但是刘少奇竟是那样地忘情和乐在其中。他生性好静，好读书，就像海绵一样能吸水，恨不得把许许多多知识装进头脑。他不仅努力读课堂上的书，课余时间还自己去找书读，养成了手不释卷的习惯。刘少奇有位同学叫周祖三，他家住在首子冲，与炭子冲一山之隔。其父周瑞仙，曾留学日本东京宏文师范，还是同盟会会员，喜欢购置新书刊，藏书不少。刘少奇便常向周家借阅书籍，并在读书手册上摘记。周家看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很乐意接待他在家里与周祖三一起看书学习。在滴水成冰的一个大冷天，看书入了迷的刘少奇，被炭火烤着了棉鞋，发散出烤焦的气味，却不知觉。周家因此风趣地叫他“ 小书柜 ”。“ 刘九书柜 ”的雅号便在刘氏族中传开。这一誉称大概缘自宋代吴时典故，吴时博学能文，以美名“ 书橱 ”传世。

1909 年，十一岁了。好学的刘少奇不顾离家太远，不顾许多不便，背起书包到离炭子冲约二十来里地的粉铺子洪家大屋读书。先生是杨毓群，受过新式学校的正规师范教育，很有些新知识。刘少奇在这里开始接触到与其他私塾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首次学习了国文和算术的课程。洪家是个大户人家，书香门第，塾师是由他们延请的。洪家也接受了一些新思想，较为开明，对封建礼教并不讲究，女孩子天足一双，不缠小脚，还与男孩子一起同窗攻读，无所顾忌。这在当时是新鲜事，在农村更为稀罕，给刘少奇留下很深印象。由于刘少奇勤奋聪颖，文质彬彬，洪家对他也很器重。刘少奇和这家主人的一个男孩洪赓飏，相处甚洽，成了少年时代的莫逆之交。后来

洪赓飏的婚事，还是刘少奇做的月老。

刘少奇的父亲不免有点古板，只赞成刘少奇能学得点写写算算的本事，成为一个多少是读过书的人，并不满意他在洪家大屋的学习。刘寿松认为专读“四书”、“五经”才是正儿八经的教育，他看不惯这种野路子的教育。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刘寿松死活要儿子转学。刘少奇拗不过父亲，只得卷起书包，告辞洪家，与洪赓飏惜别，转到红米冲又上私塾。

天有不测风云。没有几个月，父亲病逝。一家的台柱子倒了，不仅经济生活受很大影响，整个家庭秩序也不能不有所变动。加上刘少奇自己又得了严重痢疾，当时缺医少药，哩哩啦啦不得安宁，只好休学。这对一个酷爱学习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性格比较内向的刘少奇一时郁郁寡欢。好在他仍常到首子冲周家去借书和看书，使心头的郁闷得到排遣。有好几年，他几乎成了周家的常客，以后复学了，寒暑假里也常去。有关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史事，就是他在辛亥革命后从周家的书中阅读到的。历史总是会产生它固有的教育作用的，这个求知若渴的少年的心灵，被这些爱国主义的历史内容和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所感染，潜移默化地在发生变化。

1911 年，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在被称为“居天下之中”的通衢武汉爆发，全国震动。清王朝的统治似大厦之崩，纷纷解体。两湖革命党人原有信誓约定，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予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予响应。在湖北革命的推动下，湖南的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马上联络会党、运动湖南长沙新军进行起义。湖南巡抚余诚格闻变，仓皇潜逃。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和几个不识时务的清吏企图顽抗，结果被杀。起义一举成功，当时刘少奇的二哥刘云庭，就在长沙新军中当兵，也参加了部队的起义。刘云庭回家时带回来一些革命传单和书籍，刘少奇从中了解了辛亥革命的始末，明白了这个世界正在闹革命的事，思想上开始产生变化。少年人说干就干，在他的坚持下，由他姐姐捉剪，把头上的一根显示清王朝臣民身份的粗长大辫铰了下来。

玉潭学校的莘莘学子

社会的巨大变动既然已经发生，新鲜的思想既然也已经输入到山村，从小具有志气的刘少奇，哪里还能在炭子冲沉静下去。湖南是全国革命势力发展很快的省份之一，以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学”，不仅在省会长沙，而且在宁乡等这些离长沙较近的县份得到传播。不满旧学，成为接受新思潮的必然行动。 1913 年，在刘少奇的苦求下，母亲应允他去报考设立在宁乡县城里的玉潭学校，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通过严格考试，刘少奇终于如愿以偿，以优异成绩入学，接受新式学堂的教育。

当时宁乡县有两所负有盛名的新式学校，一所是云山学校，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原是云山书院，设立在离县城九十里开外的水云山下。再一所就是玉潭学校，它设立在县城玉潭镇的镇中心骆公词里。它们的建立，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一批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不被船坚炮利的外国所欺侮，他们提倡变法，向西方学习，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学等。刘少奇出生的那年即 1898 年，曾发生戊戌维新运动。这次变法虽然以流血告终，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无法消除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科举制度的终于废除，广设新式学堂，提倡西学，取消各地书院、淫祠而改为学堂的主张，在一些地方就别开生面地实行起来。宁乡县的玉潭书院于是改为玉潭学校，打破孔孟经书一统教学的做法，开设了国文、史地、数学、修身、化学、体育、图画、英文等课程。

对于这样的学校，刘少奇原只能向往，现在终于成为它的莘莘学子，欢愉之心难以形容。据说他曾写了“春风无意去，明月几时来”的诗句来表示他当时的心情。诗意不大好解，大概就是春风得意的意思，并且希望有一个光明的前程，以一展少年抱负。

初入校时，刘少奇一身土气，乡下穿着，大襟子衣衫很显眼，被大家呼为“乡里伢子”。“乡里伢子”又怎么呢？矮了半截吗？刘少奇对这些毫不在乎，而且很快使那些“城里伢子”不敢小视他，反倒都佩服他几分。他的作文，文笔和思想性都好，情文并茂，义理交融，常被国文老师作为楷模。他全面发展，门门功课成绩都居前。他喜欢踢足球，在运动场上显示出这个细高条的“乡里伢子”还有一副不让于人的好脚力。他还弄棒习武，看来是不好欺侮的。他常常维护弱小同学，弱小同学更信任他。 1916 年刘少奇毕业，其毕业成绩在全校各班名列第一，整个校园为之轰动。学校特地为他发放“红榜”，并派专人送到家里，在炭子冲曾引起一阵热闹。在人们的眼里，这情景好像同过去考上秀才或中举一般。乡亲们都夸奖刘家的九伢子，说他将来准有大出息。

在玉潭学校的三年学习生活中，关于刘少奇的佳话留下不少，其中自然也夹有某些美好的演义成分。

有说他多思善想，看问题常有独到见解，做事往往匠心独运。有次上图画课，老师出了一道“深山藏古寺”的画题，其他同学几乎都直白地、一目了然地把一片“山林”和完整的“古寺”端在画面上。唯有刘少奇不落俗套，只几笔勾勒了寺庙一角，掩映在茂密的枝叶丛里，添上一条幽径，没入树林深处，意境深远，耐人寻味。

有说刘少奇侠胆义心，最肯帮助同学，待人赤诚。谁有困难，他只要能做到，总是乐于相助；有好处的事，他却是避让。

有说刘少奇从小就是不寻常，有胆略有智慧。据说，有次暑假，刘少奇和他的一位堂姐夫去双狮岭游玩，耍得兴起，两人便来题诗作对。堂姐夫出上联：“坐镇双狮岭，哪怕豺狼当大道。”刘少奇听了没有对，却说要修改它两个字。堂姐夫觉得稀奇，对对子哪有先改人家上联的？刘少奇说，应该把“哪怕”两字改成“不许”，“坐镇双狮岭，不许豺狼当大道”，这才好。因为他们正站在双狮之头，连雄狮都踏在了脚底，豺狼岂在话下，没有怕不怕的问题，就是不许这些野兽们横行霸道。堂姐夫听了直点头，被刘少奇的气魄所折服。

也是在一个暑假里，炭子冲一带久旱不雨，庄稼人不由得个个心焦，切盼着云霓和甘霖。一般巫祝之徒乘机搞起求神、许愿的把戏，坑骗群众。双狮岭上长久冷落的郑太公庙前，大大热闹起来。刘少奇得知，邀了几个要好同学，去制止这种愚弄和诈骗穷苦乡亲的迷信活动。刘少奇慢条斯理地问带头的，郑太公真能有求必应？得到的回答是，只要心诚，神明感动，必有雨下。刘少奇哈哈一乐，他一板一眼地说，郑太公真有神通，为什么前年刮大风，他的庙顶被掀掉半边？为什么去年松毛虫为害，庙旁的山林照样被吃得不轻？现在庙里的许多梁柱子部被白蚂蚁蛀空了，真的是泥菩萨过河，连自身都难保，还能保护遭受旱灾的人们？一连三个平平常常的问题，把个带头搞求神拜佛的问得张口结舌，无言答对，一时愣了神。刘少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轻而易举地把对方置于尴尬境地，表现出高度的智慧。

有说刘少奇从小就同穷人心连心，处处护着穷苦乡亲。他在假期里，有时也帮开铺子的刘作衡站站柜台。可他并不认真做生意，遇到穷苦乡亲来买，他常常有意周济，不是多给人家货物，就是少收或不收人家钱款。 1910 年 4 月，发生了波及长沙附近各县的长沙饥民抢米事件。那年湖南各地大旱，饥民无食，连树皮草根都剥掘殆尽，其骨瘦如柴之状伤心惨目，最后被逼得铤而走险。刘少奇同情饥民的悲惨遭遇，痛恨不法商贾趁人之危，对穷苦人民进行盘剥。他有机会就要照着自己的主意去办，施善于人。刘少奇的义举，后来被刘作衡发觉。刘作衡十分恼火，大骂刘少奇是吃里扒外的败家子。

这些事情都反映出，在玉潭学校学习的刘少奇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孩子了，有志、勤奋、聪颖、机智、正直和敢说敢于、心地善良、嫉恶如仇等许多美德集于一身。

弃文习武

刘少奇在玉潭学校的三年，正是国事日非、风云迭起的三年，学习生活并不平静。

辛亥革命成功了没有？没有。辛亥革命将宣统小皇帝赶下台，挂起了“民国”的旗子，曾使进行革命有年的孙中山踌躇满志，以为“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民生主义尚未着手”。然而中国是多难的，赶走了清朝皇帝，冒出了窃国大盗。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还没有坐暖，就被迫“荐举”袁世凯以自代，革命的果实就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所篡窃。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实行偷天换日手段，变着法子要把刚建立的“民国”退回去。响应武昌起义的湖南长沙起义成功了没有？当然也没有。以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的军政府一成立，以湖南咨议局长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马上就发起了对以焦、陈为首的革命党人的进攻。在使用阴谋手段杀害焦、陈两人以后，谭延闿便取而代之，当上了湖南的都督。革命派掌握的政权转眼云烟，不到十天便落到了立宪派手里。1912 年 3 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谭延闿首先电袁拥戴，进行投机。同年 7 月，袁世凯投桃报李，正式任命谭为湖南都督。但袁终视善于逢迎的谭为异己，便在 1913 年 10 月，任命海军次长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把谭赶下了台。汤芗铭残忍嗜杀，人称“汤屠户”。除动辄杀人而外，压制舆论，摧残教育，汤也无所不用其极。汤芗铭在湖南，从 1913 年 10 月到 1916 年 7 月，近三年的残暴统治，搞得民怨沸腾，骂汤之声遍于街巷。这便是刘少奇在玉潭学校学习期间，全国的、也是湖南的一幅凄伦的历史背景图。中国人民还没有得到所希望的东西，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并未扫除，中国的积弱仍未振兴，政治不见清明，人民依旧无权。

当然，尽管辛亥革命失败了，但孙中山所倡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却在全国各地不可阻挡地广泛传播开来。玉潭学校，地处离长沙不远的宁乡县城，教员大都倾向进步，像史地教员梅冶成还是追随过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后来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大革命时期是宁乡县的地下党员，任过农民协会委员长），比较重视民主主义教育。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渗入了学生的稚嫩心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者成了他们十分崇拜的人物。因此袁世凯，汤芗铭等的倒行逆施，在这里只能如烈火喷油，引起更大的思想激荡，遭到强烈的反对。

1915 年，是刘少奇进入玉潭学校的第三年，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的称帝野心，迫使他接受“二十一条”，使中华民族蒙受又一次奇耻大辱的一年。这年 1 月，日本帝国主义者，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命令其驻华公使日置益，咄咄逼人地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了日本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几番锣鼓，几番叫场，到 5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以“最后通牒”方式，辅以武力恫吓，胁迫袁世凯就范。5 月 9 日，袁肚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公然接受苛刻要求。这“二十一条”内容，连当时参与谈判的曹汝霖都不得不承认，它“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中国军队军械由日本控制，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等，因而曹汝霖“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消息传开，举国

上下，一片激愤，拒日讨袁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各大城市纷纷成立反日爱国组织，频频举行抗议集会，誓死不承认“二十一条”，决心进一步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玉潭学校的师生们也无比震怒。他们当即停课讨袁，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和进行演讲。刘少奇身挂“毋忘国耻”标语，手执写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小旗，走在游行队伍前面。在行进过程中，人们不断加入，队伍从县城的南门到北门，越走越长。“四万万同胞何日醒”的悲壮歌声，响彻云霄。刘少奇还和同学一起，到各商店铺栈，检查和封存日货，向商人宣讲“国耻”，劝导他们一致行动，抵制“仇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音。一时间玉潭镇日货敛迹，国货畅销。刘少奇为了表明保卫中华民族的抱负和决心，将他的字“渭璜”改为“卫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12月，袁世凯终于悍然宣布复辟帝制。他接受朝贺，进行封官加爵，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定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极”。消息传到宁乡，刘少奇和同学们拍案而起。玉潭镇上，骆公祠旁，沩水河畔，到处是与袁贼不共戴天的呼声。他们热烈声援蔡锷等人的讨袁义师，并要求驱逐对袁世凯称帝通电拥戴的湖南部督汤芗铭。直到1916年3月，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的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这势不可挡的斗争浪潮方告平息，玉潭学校也才渐渐恢复正常上课。从这以后，刘少奇似乎成熟了许多，虽然他的思想仍然具有发端阶段所不可避免的混浊不清和五花八门的特征。刘少奇开始为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而焦虑，开始思考救国救民的大问题。他在床头刻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

1916年5月，汤萝铭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声明和袁世凯的政府脱离关系。但是由于他的罪恶太大，湖南人民仍坚持驱汤。汤芗铭不得已，通过其兄汤化龙，挽请寓居上海的谭延闿出来调停，谭便推荐其湘军旧部、国民党军人赵恒惕等回长沙，为汤“赞襄大计”。7 月，程潜奉孙中山之命，回湘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率军大败汤萝铭部于道林，进逼长沙。汤芗铭仓皇出逃。赵恒惕等乘机拥戴谭延闿回湖南，使谭二次督湘。

1916年夏，刘少奇从玉潭学校毕业，考入设在长沙的宁乡驻省中学。在长沙，继续投入驱逐湖南反动军阀汤芗铭的斗争。这时的刘少奇人渐长成，英气勃勃。他崇尚西汉苏武、东汉班超、马援等爱国志士，钦慕南宋岳飞“精忠报国”壮举，萌发了好男儿投笔从戎、以身许国志向。这年秋，刘少奇转而报考原为谭延闿在长沙创办的陆军讲武堂，赫然以头名被录取。

同年10月和11月，辛亥革命的主要军事领导人黄兴，护国讨袁的著名将领蔡锷，相继在上海和日本病逝。黄是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县）人，蔡是湖南邵阳人。噩耗传到湖南，刘少奇不禁痛哭失声。湖南省各界，隆重追悼黄兴、蔡锷，并进行迎葬。黄、蔡两人的灵柩，后都安葬于长沙岳麓山。刘少奇随学校参加了追悼大会，并多次到灵堂吊唁，抄下好几百首挽联，充分表达了他对两位爱国先驱的敬仰和哀思。他决心效法黄兴、蔡愕，更加寄希望于在讲武堂的学习，努力要在军事上进行深造。

讲武堂的学制为一年半。半年补习文化，一年学习军事。但是讲武堂不仅由于校舍不足开学时间拖延了，而且不久即因1917年发生的“护法战争”而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直系军阀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总揽大权，肆意推行以北洋派为中心的武力政策，又

一次废弃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并于 8 月下令改派陆军次长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请谭延闿辞职去沪。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对峙。程潜又回到湖南任湘军总司令，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任前敌总指挥。傅良佐派兵讨伐，湖南战争即发生。赵恒惕打进长沙，其部围打了在讲武堂中的守军。讲武堂在长沙的 11 月战事中被毁。

刘少奇未能如愿学完军事课程，无可奈何地回到炭子冲家里，进行自学。

“五四”大潮下的游子

刘少奇的从军救国计划受挫后，在家里的一段日子并不好过。他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和行动，从一开始便遭到除刘云庭而外的家里人的反对。原来只希望刘少奇读上几年私塾，打下点文化基础，往后学一手手艺，当上个脑子灵、手脚麻利的干活人，不曾想到刘少奇竟迷上读书，断断续续读到中学。这时候家里人的期望值，最多也只升高到让刘少奇当个教书先生，在家乡开个私塾，坐坐馆而已。所以对刘少奇在学校参加学潮闹事，刚进了宁乡驻省中学又转考陆军讲武堂，并不赞成，认为他不能安分守己。现在讲武堂解散，刘少奇失学回家，双方迥然不同的思想见解，使得原来的矛盾日渐突出，变得更加格格不入。刘少奇和他三哥刘作衡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这样。他在家里简直度日如年，住不下去，常在外面要好同学家中住宿，继续看点书，打发日子。家里人对他的我行我素，既气恼又不放心，于是想用包办婚姻、强制成亲的封建桎梏来锁住他。但是他们完全想错了，这时的刘少奇哪是轻易动摇的人，他早已下定决心要同封建主义的东西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只要抱定了宗旨，要为大事业去奋斗，年青人的作为是从不去计较别的后果的。刘少奇出走了，不辞而别。

1919 年初，刘少奇插入长沙私立育才高等中学毕业班学习。嗣后，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大潮吸引，以全副身心投入了这一爱国运动。

从这年初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在和会上提出了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正当要求。4 月下旬，和会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不顾中国的正当要求，悍然决定把战前德国在山东霸占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这种强权主义的做法，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首先在知识界和学生中激起无比愤慨。5 月 4 日，北京的十三所大专学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集会，示威游行，严正要求政府在巴黎和约上拒绝签字，并严惩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洋军阀政府无视民意，出动军警，逮捕示威群众三十多人。北洋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更加引起公愤。5 月 5 日，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6 月 3、4 日，北洋军阀政府继续大批逮捕爱国学生，激起人民群众的更大反抗。从 6 月 5 日起，上海有十五万以上工人参加罢工，支援学生反帝爱国斗争。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唐山、长辛店、九江等地工人接着起来进行政治罢工，其他各地也有所酝酿。对这样浩大的斗争，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都始料未及而感到恐慌。北洋军阀政府在 6 月间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免除曹、章、陆三人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北京爆发的学生运动波及长沙后，湖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情绪激昂，纷纷响应，声援北京学生斗争。长沙市迅速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并由学生联合会发起，建立湖南各界联合会，使学生的爱国运动扩展为各阶层的人民爱国运动。在学生联合会的指挥下，刘少奇和长沙各校学生一起参加了罢课游行，开展爱国宣传活动和抵制日货的斗争。为了把热火朝天的学生运动持续下去，各校都提前考试。刘少奇在参加毕业考后，不等毕业证书发到手里，就急如星火北上全国爱国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与京、津等地学生一道，参加了这场已近尾声、但还没有停息的声势浩大的斗争。刘少奇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是暑假，天津的学生也有不少到了北

京，曾在天安门举行了很大的示威，并在天安门露宿了几天，街上的群众运动从这次示威以后，即不多见。也从此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五四运动最大的直接成果。”[①]刘少奇通过在长沙和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的实践，受到了一次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伟大革命斗争的洗礼，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北洋政府和盘踞在各地的封建军阀的反动性，他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得到新的升华。

在中华民族忧愤屈辱的年代，在国家民族的灾难有增无减的年代，他该怎样铺开自己脚下的前程？是考著名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或进军事学校继续去实现弃文习武的愿望，还是想别的什么办法？主意一时拿不定。这时候，他在北京考了几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大本营，正负盛名，是青年们向往的地方，刘少奇自然也去考了。虽然都榜上有名，但他不是嫌学制过长，就是嫌学费过昂。在得不到家里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学习的费用问题是主要困难，像阴影一样压在心头。还有的是专业不如人意。思虑再三，结果都放弃了。

到西方去学科学、学技术、学革命理论，是“五四”运动前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所认定的救国的道路。国内的许多地方，掀起了一股留法热潮。一些主要报刊，不断发表宣传留法勤工俭学的文章。很多省、市，设立主办留法事宜的机构和预备学校。不少地方的当政者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给予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以支持和赞助。湖南省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当时也是搞得比较热的省份。这对刘少奇不能不有所影响。为了解决学习经费这个实际问题，刘少奇意欲走留法勤工俭学的道路。当时的刘少奇对达尔文的“人生于世，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那套理论，是接受的，他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那样，梦想过“实业救国”的道路和“教育救国”的道路。因此一个偶然而冲动的念头，促使他不避冒昧，拜访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著名发起人李石曾和范静生。李、范热情地接待了这位素不相识的瘦高个子的南方青年。在他们的鼓励和推荐下，刘少奇进了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

[①] 刘少奇：《感想与回忆》，载于《中国青年》1939 年第 2 期。

二 寻求真理之路

留法预备班

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原是 1917 年 8 月由华法教育学会的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创办。育德中学是所私立学校，校址在保定市西关，系老同盟会会员陈幼云于 1907 年建立。1917 年，校长王国光试行实用主义教育，组织学生从事课外劳动。蔡元培、李石曾等参观后，建议在该校附设留法预备班，得到赞同，即于该年秋招收了第一期勤工俭学生。李富春和李维汉都是 1918 年招进的第二期学生。为组织湖南学生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毛泽东、蔡和森也曾先后来过这里。刘少奇是第三期学生。

留法预备班设有实习工厂、共分锻工、锉工、翻砂、机械四部。每部又分成几组。各部、组的实习内容，每周更换一次，循序进行。实习工厂挫工部设有油发动机一台，车床两台；锻工部有风箱、火炉、铁砧等设备。总之，都还是像像样样的。在这里，刘少奇学得一套较好手艺。后来，在五六十年代，刘少奇提倡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时，曾多次说到他在这里的学习体验。可见留法预备班的教育方法，对他的成长是有益的。

育德中学，也是一所素有进步传统的学校。辛亥革命时，曾是同盟会在河北地区的秘密集会场所。“五四”运动中，师生们大都投入爱国狂澜。校长王国光和机械制图教师刘仙洲等都有比较进步的思想。在这里，《新青年》、《每周评论》、《东方》等进步刊物，陈之书架，传于手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刘少奇就是在这里读到的。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文章中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育德中学的师生们还自办刊物，激扬文字，谈说纵横，慷慨陈义，介绍国内外形势、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等。[①]

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爱国运动又推动了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原来受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支配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这个过程，已经不可遏止。因为“五四”运动所争得的胜利，包括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和拒签“和约”等，并没有使中国人民，尤其是先进的知识分子获得满足，从而使大大激动起来的心情趋于平静。相反，他们在这场空前规模的爱国运动中认识了人民的力量后，面对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潮流，快快起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要求得更急，喊得更响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在这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生动环境里，刘少奇前所未有地受到了各种思想的冲激，包括最初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同

[①] 据刘少奇的“简历”。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1360 页。

师生中一些社会主义派人物的接近，使他的思想不断地向激进的方向演变。虽然他后来由于内囊空涩，以及留法预备班在 1920 年就停办等原因，未能踏上去法国留学的征程，但他的眼界已大为开阔，从此在他的面前开辟了一个已非一乡一省的天地，具有了放眼世界的企求。任何牢笼再也不能锁住他，一切困顿反而增加了他追求真理的动力，他对红色苏俄无限神往。

刘少奇曾有一段回忆，大概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后来逐渐占了这个运动的优势。在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传到了中国，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当时的《新青年》杂志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一方面拥护一切进步的东西，同时传播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思想。俄国的革命也给了中国以很大影响，吸引了不少人对它关注。所谓“过激派”的名称并没能够吓退中国要求进步的人们。刘少奇的这些回忆，既反映了当时在各种思潮的激烈竞争中，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的情况，也反映了刘少奇这一时期通过反复的思想比较，终于倾向马克思主义，同情俄国革命，憧憬和向往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

上海外国语学社

1920 年夏，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此时，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风流云散，正处在衰落之中。刘少奇在京、津找不到留学门路，又因直皖战争发生，交通阻绝，欲回湖南而不能，身上带的几个钱也快用光，只得在北京鼓楼附近的一位同学家里暂栖，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狼狈不堪。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无情地煎熬着他：面对国家的积弱不振、民族的深重灾难和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他热血沸腾，一颗年轻人的心在剧烈跳动，而对自己的饱尝艰辛、报国无门、处处受阻、寸步难行的窘境，他又不由彷徨、郁闷、悲愤，忧心如焚。山重水复疑无路，在这种情况底下，他给正在日本留学的少年挚友洪赓飏写下了一首《赠友诗》，一方面向洪倾吐他这时的处境和心情，一方面也因洪最有可能在经济上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诗中写道：

身长七尺好奇男，
汝何悲愤而长忆？
尔之命促数且奇，
一生富贵何可期。
胡不及时以行乐，
飘零千里，备罹万难欲何为？
人才西渡正纷纷，
尔之翘首望何陲？
岂欲长征班定远，
仗策以相随。
满目带愁思，
意蠢情亦痴。
天津桥上无人识，
只得远寄与相知。

把诗翻成白话，大意是说：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要这样悲愤和沉涧于回忆往事？命运在这样地捉弄人，不期望去图一生的富贵。那未又为什么不肯去作及时行乐的苟且行为，而偏要远离家乡、吃尽千辛万苦呢？有志气的人们正纷纷到西方去留学，我最向往的是哪里？背起行装，也作一次远征吧。可是难哪，怎么去呢，真想得人要发痴。人地生疏，这些情况能说给谁听，谁又能了解，只好投诉于在远方的知心朋友了。

刘少奇青年时代所写的这首诗，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江青推波助澜的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曾遭到肆意歪曲和诋毁。按照某些人的“革命”观念，似乎马克思主义者生来便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根本不需要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更不存在转变的问题。然而，这种观念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态度，也不符合历史的客观真实过程。离开历史、离开客观可能性的东西，只能是神话！

在我国思想界发生大变动的五四时期，作为一个刚刚从封建家庭的罗网中冲杀出来的有志青年，刘少奇不能不和当时所有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和所有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都要不可避免地经历阵痛，经过一番反复的激烈的思想震荡和斗争，经过艰难

而痛苦的思想转折过程，只是因各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的不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艰难困苦，玉汝以成 ”。现实的生活正毫不留情地逼迫刘少奇尽快寻找出路，选择方向。

对于这类情况，刘少奇 1942 年在《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中就作过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和分析。他指出，在中国的很大的知识分子群众与青年学生群众中，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并为他们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是受帝国主义、封建残余与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使他们遭受着失业、失学的威胁的。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他们或多或少的有了现代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中国革命中能够起先锋的桥梁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的传播与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中。他同时也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与民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与民众利益服务并使其生活群众化之时，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他们的这些缺点，也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洗刷干净。刘少奇的这番话说得何等的好！

刘少奇所写的这首诗，正反映了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以前，一个二十岁出头一点的五四时期的困苦青年学生的色彩，否则倒是难以想象。不平则鸣，物之常理。这首诗的情调是悲愤的，它尽情地抒发着作者一腔怨愤难平之气，特别是对当时军阀混战局面的极度厌恶。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向知友如怨似诉地表达心头的不平，从实质上来说，作者是在对那个使人走投无路的社会的不公平状态作着尖锐的控诉和抨击。只有如此来审视，才更为贴切和入情入理。

洪赓飏有否收到刘少奇的这首诗或信，不清楚。但刘少奇没有得到洪赓飏在经济上的什么帮助，这是清楚的。刘少奇只能向他的母亲和二哥刘云庭提出经济上的要求，也只有他的母亲和二哥才能有这方面的帮助。

为了寻求真理，刘少奇在北京逗留期间，频繁地接触了许多人，抓紧机会又阅读了一些进步刊物，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更有了亲切之感。

在直皖战争结束，局面稍为平静一些后，刘少奇匆匆返回湖南。由于原玉潭学校老师梅冶成的关系，在长沙找到何叔衡，通过何与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有了接触。俄罗斯研究会是毛泽东和何叔衡等组织起来的。当时俄罗斯研究会正按照在上海刚建立的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号召，组织革命青年到俄国勤工俭学。刘少奇还通过何叔衡认识了船山学校的校长贺民范。贺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望，与陈独秀也有交往。刘少奇便通过这样一些联系，进入了陈独秀等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主攻俄文，作赴苏留学准备。

1920 年 4 月，第三国际派东方局的魏经斯基来中国开展工作，魏经斯基同李大钊、陈独秀等商议后，决定在上海首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后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了培养干部和输送一批青年到苏俄去学习深造。回来推动中国革命，专门办了个“ 外国语学社 ”，由魏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当校长，魏经斯基夫妇、沈雁冰、李达、李汉俊等担任教师。学社教授俄、英、法等语言，主要是俄语，同时也学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一些革命活动。

刘少奇来到上海后，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六号。这里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所在地，杨明斋还在此办了个“ 华俄通讯社 ”。“ 外国语学社 ”是公开的，在门口挂了牌子。渔阳里六号，是座二上二下的弄堂

房屋。大门内一个小天井，客堂作教室，厢房作会客室和会议室，楼上作办公室。刘少奇住在东厢房。先后从各地来到这里学习的，还有任弼时、萧劲光、汪寿华、罗亦农、许之桢、傅大庆、李启汉（森）、曹靖华、韦素园、蒋光赤、马念一（哲民）、周昭秋、胡士廉、任岳、陈启沃等，共二十多人。他们除学习俄语外，还参加陈独秀等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和上海马克思研究会的活动，并且帮助《劳动号》和“华俄通讯社”做些抄写、校对的事。当时刘少奇是工读互助团的负责人之一。他一面攻读俄文，同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并开始到工人中去，到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进行讲课等。刘少奇发奋学习和工作，珍惜时间，一刻不偷闲，从不见他上街逛马路，给同学们留下很深印象。

据萧劲光回忆，刘少奇、任弼时和他，在 1920 年冬，在这里由工读互助团转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刘少奇说自己是于该年在长沙由贺民范介绍加入的。根据各种情况来看，萧劲光的回忆比较准确。[①]

[①] 参见《萧劲光回忆录》第 17—18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周志兴：《刘少奇入团问题初探》，《湖南党史通讯》1987 年第 2 期。

赴苏历程

1921 年春，正是江南莺飞草长时节，刘少奇作为组长，与任弼时、萧劲光、蒋光赤、曹靖华、吴葆萼等同学，经杨明斋联系和安排，带着陈望道、李汉俊和魏经斯基写的介绍信和一张“做生意”的护照，由上海吴淞港登船，踏上去苏俄的旅途。

当时去苏联的道路，并不是畅通的。事实上，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北洋军阀政府千方百计地防止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影响。1918 年 1 月起，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下、黑龙江省的督军鲍贵卿，在镇压了苏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中东路的活动后，封闭了中俄边境，关断中俄交通。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所以能关闭住中俄交通，隔绝西伯利亚布尔什维克同中国的联系，是由当时的西伯利亚政治形势所决定的。这年，沙俄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哥萨克人谢美诺夫、中东路督办霍伐斯等三股白匪蜂起，接着日、美、英、法、中（北洋军阀政府）五国出兵干涉西伯利亚，反对新生的苏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兵是象征性的，只进占中东路和封锁中俄国境。 1918 年 11 月间，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高尔察克夺取了鄂木斯克的政权，成为西伯利亚白色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直到 1920 年 2 月，苏俄红军才把高尔察克彻底打垮。这时，苏俄决定成立“缓冲国”，即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这个地处苏俄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同中国接壤的“缓冲国”，便成为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的前进基地。当然，这种联系还是很困难的。因为苏俄境内，白匪残余还没有完全消灭，西伯利亚还不平静；中国这边，北洋军阀政府是敌视苏俄的；其间，还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

刘少奇一行搭乘的轮船，先到日本长崎。在长崎住了一星期左右，继续乘船往海参威。初到海参威，到处冰天雪地。因为从上海出发时天已暖和，谁也没带棉衣，他们冻得吃不消，住在中国街的一家旅馆里，简直不敢上街。

当时海参威还被日本占领着，伯力已经由苏俄红军控制。伊曼河成为分界线，这边白色地段，那边红色区域，互相渗透，互相严密防范。刘少奇一行小心翼翼进入海参威，就被北洋军阀政府驻海参威的总领事馆所注意。他们把刘少奇等误作孙中山派往苏俄去的人，借故抓了刘少奇等几个去审问。

刀枪手两边站立，杀气腾腾。审问的人问刘少奇是什么地方人，干什么的，要到什么地方去，……问得好严厉。

刘少奇虽然初临这种场面，倒也能沉着应付。不管审问者怎样吹胡子瞪眼，刘少奇照样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故意带着浓重的湖南话音，一一回答。他说自己是湖南人，因家乡遭灾，出来谋口饭吃，做手艺。

审问的人又问会什么手艺。

刘少奇连说带比，说木工、铁工活都拿得起。

审问者以逼视的眼光把刘少奇上下打量了一会儿，将信将疑，要手下人察看刘少奇的手。还好，刘少奇在留法预备班工厂实习时留下的老茧没有完全蜕掉。再问别的，刘少奇的一口湖南话真难听懂。审问者再没有耐心，挥挥手，把刘少奇等放了。

刘少奇一行根据原来的联系和安排，迅速与第三国际驻海参威的机关和海参威大学的教授伊凡诺夫接上头。伊要他们马上去伯力，以防在这里再发生不测，并给了他们每人一个用俄文打印的秘密通行证。伊叮嘱，千万妥为

保存，不遇红军不暴露。被敌人发现要掉脑袋，丢失了就无法入境。在伊的安排下，刘少奇等乘上了去伯力的火车。

火车吭吭哧哧跑了一整天，在暮色苍茫中到达乌苏里，喘一声长气停下来。这里是交界处，所谓“真空地带”，火车到底了。但见各要口均为日本士兵把守着，非久留之地。刘少奇等急忙下车，夹杂在人群里不知所向地跟着走了一程。见有一辆既不打灯光又没有鸣笛的火车缓缓驶来，他们不顾三七二十一，纵身攀上了这辆只有三节车厢的火车。

列车人员发现这么些年轻人跳上来，作了戒备，上前盘问。刘少奇他们防备这些无标志的列车人员是白匪军，回答吞吞吐吐。这就更引起列车人员的怀疑，盘问得越发紧，说要全部枪毙他们。后来干脆对他们进行严格检查，一位同学的机密证件掉落下来。列车人员怔了一下，盯着证件一时没有作声。同学们也紧张得屏住了气，面面相觑。突然一阵大笑，划破了似乎凝结的空气，列车人员亮出了赤卫军标志。同学们弄清这些列车人员就是红军以后，都把自己的机密证件自动掏了出来。没有国界的“同志”情谊。立刻把任何距离和陌生都消除了。红军把他们安排到头等车厢住下。刘少奇同列车长热热乎乎地坐在一起，用生硬的、不连贯的俄语攀谈起来。同学们高兴得又唱又笑，尽情地享受着这“解放”的欢乐，疲惫和忧虑无影无踪了。

刘少奇一行到达伯力后，因铁路被破坏，休息了五六天，然后改搭黑龙江轮船到布拉戈维申斯克（中国的传统名称叫海兰泡）。按照联系安排，找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红军驻军司令部。

这个司令部所属有一个中国支队，队长很喜欢这些有文化的年轻人，竟要他们放弃去莫斯科，留下来在支队工作。同学们一再说明他们是受命去莫斯科学习，不是自己能够作主的。但支队长执意要留，同学们觉得为难，不再好多说。按规定，支队要增加较多的编制，必须得到司令部的批准，于是支队长带着他们去见卡兰达什将军。卡是一位久经战争风霜的老布尔什维克，考虑问题周到，想得远，认为仗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不需要再增加编制了，同学们去莫斯科学习是一件大好事，将来有更要紧的事做。一席话把事情了结了。刘少奇他们喜出望外。在红军的安排下，他们踏上经赤塔继续前往莫斯科的旅途。

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是一列装货物用的闷罐车，自然没有客车舒服和方便，刘少奇一行也顾不了许多。一路上，城市和农村因战争造成的惨状，满目疮痍的景象，随处可见。

火车没有煤烧，代用木柴。所以列车人员和旅客不仅要一起对付那些白匪帮残余的骚扰和破坏，而且时常要下车一起去搬运木柴。火车也不得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往往在一个地方耽得很久。这样，带来的困难就更多，有时还领不到面包，只好饿两天肚子。途中历时两个多月，天寒地冻，备受艰辛。

正如半年后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所说：“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①]刘少奇他们看到了那儿的劳动人民（觉悟的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共产党员们，在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巩固苏维埃政权，正排除万难，意气风发地工作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页。

和战斗着，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高度的主人翁态度和共产主义觉悟。

最使刘少奇他们感动的是，这个国家这样困难，自己粮食严重匾乏，还拿出“面包”来给他们，帮助中国的革命，表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刘少奇下决心也要加入像列宁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明白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自己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坚定性。

这时候，中国国内毛泽东等人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十月革命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不过这是远在国外的刘少奇等人十分向往，但暂时还所知不详的事。

莫斯科东方大学

1921 年初夏，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莫斯科河畔已经绿草如茵，寒冬迹象完全消失了。

这时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从 1921 年 6 月 22 日一直开到 7 月 12 日。刘少奇等也得到机会轮流参加旁听。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五千多座位的剧院里座无虚席，人头攒动，《国际歌》、《劳工歌》的歌声，掌声和欢呼声滚滚如雷。开幕式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就在克里姆林宫安德莱厅进行。这是一座稀有的艺术之宫，光彩四射，瑰丽无比。使刘少奇等更感到荣幸的是，在会上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聆听了列宁的报告。他们兴奋之极，尽情鼓掌。对这情形，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的瞿秋白，曾在他写的《赤都心史》中作了生动的记载：“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绞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未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①

刘少奇第一次参加这样隆重的世界性大会，真实地体验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一个游荡于欧洲的怪影”，在怎样地变成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的伟大理想，在怎样地鼓舞着全世界的无产者作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会后，刘少奇进入在 5 月间刚成立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该校名誉校长是斯大林，学生大多来自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部分来自远东各国，有中国、日本、朝鲜等。中国学生人多，单独编为中国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柯庆施、王一飞、卜士奇、胡士廉、廖化平、任岳、任作民、谢文挣、华林等四十多人。为了避免将来回国做革命工作时暴露身份，中国学生每人都取了一个俄国名字。课程大都由俄国教师任教。开始，教学非常困难。一方面中国学生除个别有点俄文基础，大都初学。刘少奇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只打了几个月的底子，听说写都吃力。另一方面俄国教师中，又大都不懂中文，不能适应教学对象。学习的内容很多，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俄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关于工会运动的小册子等。教材都属草创，不怎么像样。工具书也只有哈尔滨出版的、很粗糙的《俄华辞典》。新名词、新术语一大堆，对于初学者来说，犹如倾盆大雨。同学们负担奇重。后来就请正在苏联采访的瞿秋白，还有别的人，来当政治理论课程的翻译。瞿秋白也在班中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为了让这些历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到苏俄来寻求真理的青年学生能学好课程，瞿秋白想方设法收集适用教材，认真细致备课，尽量讲究教授方法，并经常深入到学生中，了解学习状况，进行具体帮助。这样，情况才有一定改观。

在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极其艰苦，吃、穿、住等条件都很差，当时，白匪虽然已基本被消灭，但其残余分子的活动还很猖撅，反革命分子到处都有，社会秩序没完全恢复正常，不安定情况仍然严重。由于连年战乱，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粮食奇缺、燃料匾乏的局面还未根本扭转。苏维埃正处于百废待

兴之中。刘少奇和同学们，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参加站岗放哨，做保卫工作。星期天或者星期六，还要到工厂参加义务劳动。体力消耗比较大，得到的给养却严重不足。学校为照顾这些留学生，也尽了最大努力。同学们享受的是红军战士的同等待遇。据说列宁也不过如此。尽管这样，每人每天只能发到四两重的两块黑面包。早上吃一块，中午就不敢吃第二块，否则就没有晚餐吃，难熬漫漫长夜。所以基本上是不吃早饭，一天两顿。中午开饭有一个汤，清汤内有几片土豆、白菜或萝卜，有时加一点咸鱼。刘少奇和同学们都是能吃饭的二十来岁小伙子，是长身体时期，长久营养不良，身体明显消瘦下去，健康状况越来越糟。教室在四层楼上，爬楼梯特别费劲，挪到教室人都软了。同学们的穿戴，衣帽鞋袜，大都是欧洲工人阶级捐的，发给大家，顾不上尺寸长短，是否适体。冬天到来，多发一套薄麻布黄衣装，一件军大衣和一根束腰皮带。站岗放哨时穿这些衣服，晚上睡觉还离不了这些衣服，得同一条毯子一起盖上身，无时无刻不是“全副武装”。宿舍不宽敞，四十多人共住一大间加一小间平房。尽管住得已够拥挤，夜里仍然寒气袭人。大家尽量挨着，互相取点暖和。刘少奇他们大多是南方人，像这样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从未承受过。

艰苦的日子何时了？有少数同学经不住考验，思想发生动摇，后悔起来。这些同学原来只听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很想看看到底什么样子。一到这里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好，对许多现象看不惯。“革命还革出那么多叫花子来了？”他们嘀嘀咕咕，暴露出不切实际的、脆弱的小资产阶级情绪。刘少奇却始终表现得很坚定。他认为艰苦的生活可以锤炼人的意志，激发人们的革命事业心。他记得孟子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①] 一个革命者，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重任，就必须提高自己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意志和注意修养的自觉性。他循循善诱地鼓励同学们很好团结互助，克服眼前的严重困难，坚持下去。刘少奇自己，更是鞭策自励，如饥似渴地发奋学习，研求马列主义真理如何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打翻旧世界，建立新的神州。

1921 年冬，为了更好地组织学员们在东方大学的学习和政治思想教育，刘少奇与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一起，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少奇任中共旅俄支部委员，担任第一任干事长（即支部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刘少奇负起了学员中的党的工作。

1922 年元旦，东方大学组织新年联欢晚会，要求在校学习的每个民族和各国学生，都要出一个节目。中国班便排练了一出罢工故事独幕戏，以中国的封建军阀和资本家如何镇压工人运动，工人如何英勇反抗为情节。刘少奇扮演工人，是主角。彭述之扮演了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吴佩孚。萧劲光等也参加了演出，有演军阀的，有演资本家或群众的，搞得很热闹。这个演出，也许是促使刘少奇志愿从事工人运动的一次契机。他在 1 月的一次填表中，在愿意做何种工作的一栏里，表示愿意做工人运动的工作。

刘少奇坚定地相信，“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决心要以“无穷的希望”来参加推进这

[①] 《孟子·告子下》。

一历史发展的进程，“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最黑暗的家庭奋斗出来，到中国这样沉寂的社会里面，干这种改造社会的事业。”①

三 在安源工人运动中

安源地火

1922 年，根据组织决定，由刘少奇带领一些难以在莫斯科艰苦条件下继续学习的同学回国。

踏上祖国的土地，同当年出国去留学时一样激动。上海黄浦江头的波浪在起伏，夏初的江风在习习吹拂，船舶下水花飞溅。所有这一切，都使刘少奇心旷神怡。他先在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工作，不久奉调湖南，参加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的斗争，从此开始了工人运动工作。特别在安源的工人斗争中，与早在安源进行开辟工作的李立三一起，树下了历史丰碑。

安源在江西省西部萍乡县境，邻近湖南省，是全国有名的重要煤矿区之一。这个矿区兴于 19 世纪末，是清末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招商局督办盛宣怀，在奏请清廷批准，集资收买地方小煤矿后建立起来的。先是官办，后改为官督商办，在安源设立“萍乡煤矿局”。因矿址在安源，所以称为安源煤矿。 1902 年，经营不景气，迫于资金缺乏，向德商礼和洋行借了巨款，交换的条件是同意让德国为矿山提供所需全部机器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 1904 年，日本政府也乘汉阳铁厂（是盛宣怀从张之洞手里接办的）和安源煤矿筹款困难之机，向盛宣怀发放巨额贷款，分别用于汉阳铁厂和安源煤矿。日本便凭债主权力，对安源煤矿进行渗透和控制，直到排挤德国势力大部，取得垄断地位。为了解决煤炭运输问题。1899 年至 1905 年，用了六年时间，建成九十公里长的株萍铁路。安源的煤主要在这条铁路线上外运，安源矿局和株萍路局便被通称为“安源路矿”。1908 年，盛宣怀将萍乡煤矿、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合并，称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工矿企业，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盛宣怀自任总经理。因德、日都有巨额债权，公司实权操在日人手里，工程技术大权则为德人执掌。整个企业管理，实行封建把头制。

1922 年前后，安源煤矿拥有一万二千多工人，株萍铁路上还有一千多工人。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势力的几重大山下，安源路矿工人们受尽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过着极其悲惨的贫困生活。刘少奇说起它，曾无限感慨地叹道：人活在世上，过这样的日子，真是连做奴隶、当牛马都不如！

我们可以从刘少奇等所写的材料中看到当时的情景：

煤矿工人的工资制度，除了窿外的一部分机械工人和窿内的杂工，是实行计日工资的，其他窿内工人都实行封建包工制。像窿内采煤工，每人每日的工资是五十七枚铜元（合银洋零点二七元），但经工头克扣后，实际只得二十六七枚，被工头剥削去一半多。工头还通过吃尾子（工资在元以后的几角几分余数不发）、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在一只牛身上尽量剥皮。因而工头的月收入，有的可达七八百银元，有的甚至上千银元，比工人的收入多成百倍，差别悬殊。

矿局和工头，为了获取更高利润，实行两班倒强劳动制度。每班井下工作十二小时，有的打连班，甚至几天不出井。许多矿井是直井，采煤全凭人一根扁担两只筐，肩挑上来。有些巷道狭小，大人不方便，基本上使用重工

挑煤。每担重百多斤，像爬楼梯一样，分段往上担，作传送作业。低矮的地方，连童工的腰也直不起，只能跪着移动。这种情况被称为“挑拜席”。因为是传送作业，如有一人稍有停歇，被监工发现便是一顿鞭打脚踢。矿井里阴暗潮湿，通风极差，空气十分混浊。每班十二小时出来。腿似灌铅，腰像断了，头昏目眩，一时受不得阳光刺激。

矿局对于工人的生活健康全然不顾，窿工食宿地方共有四区，房屋百来间，每间二十平方米左右要住四十八人，有的竟要住到五十人以上，拥挤不堪。吃的东西更加粗陋无比。洗澡池脏得像泥沟，世间绝无仅有。诸如此类，全不是人所受得了的。至于什么工人游艺，工人教育设备，都一无所有。医院有一所，但从不认真给工人看病。医生看病时态度恶劣，如狼似虎，不是什么慈善天使。

煤矿上的设备很差，冒顶、倒塌、穿水、起火和瓦斯爆炸等事故，司空见惯。据有关统计，安源煤矿创办后二十年里，每产一万吨煤，就意味着有四五个工人的死亡。1922 年，安源煤矿的煤炭年产量达到八十二万吨多，也就是说，仅这一年里，就有三四百工人死于事故。而死亡一个工人，矿局只给“安葬费”十六元。当时一匹马的价格是六十元。所以，矿井发生事故，救马忙于救人，惨绝人衰。如果因工致残，那就只好去沿街乞讨，死后抛尸野外。

这里是无法无天的天地，劳动工人全无人身保障，受尽百般污辱。矿局职员，自矿长以至各下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任性而行，肆无忌惮，谁都可以对工人或骂或打。工人对于他们的无理命令，不能稍有违抗。一不如意，即滥用私刑，让工人跪火炉，跪壁块，背铁球，举篾枷，抽马鞭等，或送警察所拘留、拷打。

株萍铁路，工人的劳动条件好一点，但其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也都同矿上差不多；黑幕少一点，但平时的无理压迫，也不稍减于矿上；工人教育及卫生等各种设施，亦均付阙如。

压迫愈深，反抗愈强。安源工人富有革命传统。辛亥革命前， 1906 年 12 月同盟会领导的湘赣边界萍浏醴起义，就有安源工人参加。他们英勇无比，莫不死战，在历史上写下了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第一次参加武装起义的革命篇章。这里的路矿工人，诚如刘少奇等所说：“性质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能服从”。加上工人人数有一万多，集聚一起，声息相通，团结性非常强。而另一方面，工作既然这样苦，压迫既然这样重，待遇既然这样暴虐，剥削既然这样深，所以只要有人出头，喊出“组织团体、解除压迫、改良待遇、减少剥削”等口号，即“万众景从，群焉归附”，[①]奋力而起。

正因为有这样基础，所以李立三、刘少奇先后来到了安源，立刻就把路矿工人给发动起来了。

李立三原是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因得罪了法国当局，于 1921 年秋被强迫遣送回国。回国后，被党中央派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对他表示极大欢迎，说明湘区的党正根据“一大”决议，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安源是目标之一。党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些联系，希望他继续去做开拓工作。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的反动统治极端残暴和黑暗，因此首先要想法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

[①]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争取公开活动，才能站稳脚跟，逐渐和工人接近，发现优秀分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目前最好的合法形式是搞平民教育。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六如在长沙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可请他办一个给萍乡县知事的公函。李立三按照毛泽东所说，以教员身份来到安源，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和国民学校。萍乡县知事对李立三的“增加知识、发扬德性”的办学宗旨很欣赏，批准了李立三的办学呈文。李立三得到合法身份，便在安源新菜场五福巷内租下房屋，挂出平民小学牌子，作为活动据点，加紧结识工人，进行工作，形成第一批积极分子。接着吸收八名先进觉悟工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又积极慎重地从团员和先进工人中发展了六名中共党员。 1922 年 2 月，安源路局的火车房内，秘密举行了第一次党员会议，建立了以李立三为书记的安源党支部。这是中国煤矿工人中最早的党支部，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最早的党支部。

党团组织的成立，为安源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在党团员的积极工作和带动下，李立三着手组织工人俱乐部。他按规定向县衙门提交了立案呈文。呈文把“联络感情，涵养德性，团结互助，共谋幸福”写作俱乐部宗旨。由于这个宗旨并不违背官厅要求，县里找不到藉口，只得批准。1922 年 5 月 1 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牌子在牛角坡五十二号挂起，并隆重地召开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俱乐部成立大会。

工人俱乐部成立，使煎熬在社会最底层的安源产业工人迅速集结到一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阶级力量。路矿当局为之忐忑不安，一面采取笼络手段，企图从中破坏，一面进行威胁，诬称工人俱乐部是“乱党机关”，扬言要以武力查封。有着党的领导和已经具有一定阶级觉悟的工人，毫不动摇。路矿当局软硬兼施的做法，只能引起广大工人群众的对抗意识。由于路矿当局拖欠工人工资数月不发，市场物价飞涨，工人生活每况愈下，更加困苦不堪，十里矿区怨声载道，工人们要行动起来，已呈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汉冶萍公司的另一部分，汉阳铁厂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反对武力封闭工人俱乐部而发动的罢工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消息传来，安源工人再也按捺不住，群起要求自己的俱乐部也举行罢工斗争，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李立三随即组织党团员，在俱乐部内外进行讲演，宣传全国各地工人斗争胜利的消息，并明确宣布安源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轻工人的压迫和痛苦”。加入工人俱乐部的工人越来越多，俱乐部迅速壮大。党团组织也相应得到扩大。到 9 月间，俱乐部成员发展到七百人；青年团员发展到九十多人；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还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工人监察队。发动工人大罢工的形势和基础，基本造成。

为此，李立三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认为在安源举行大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作了认真研究，并要李立三先参加和帮助长沙泥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9 月 5 日，李立三和刘少奇都作为“来宾”，出席了“长沙泥木工会”成立大会。两人一见如故，紧紧握手。

罢工风雷

安源路矿当局趁李立三不在安源的机会，对俱乐部搞了一连串破坏活动，阴谋搞垮它。他们先是利用赣西镇守使萧安国换防抵萍乡之机，大肆恐吓，放出风声说，如果俱乐部的领导人不快点离开安源，“必有杀身之祸”。俱乐部临时负责人蒋先云和朱少连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声明：秉正大光明宗旨，作正大光明事业，死也不怕！路矿当局吓人战术失灵，便向萍乡县驻军和知事告刁状，诉说工人俱乐部如何危险，要他们正式告示，“训令俱乐部自行停闭”。工人们得到消息后，更加认清路矿当局的真面目和险恶用心，激起极大愤慨，要求罢工斗争的呼声更加坚决了，安源地火喷薄欲出。

在这重要时刻，毛泽东亲自来到安源了解情况，及时听取蒋先云、朱少连等的汇报后，也认为发动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对领导罢工斗争的策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派人要李立三急速回安源领导罢工斗争，自己因事就回长沙去了。

9 月 9 日，李立三一回俱乐部，针对路矿当局的恐吓，也立即公开表示“誓死不离安源”，坚决与安源工人同战斗，共生死。工人们受到很大鼓舞。安源路矿的大罢工，只等俱乐部一声令下。

毛泽东回到长沙，为使安源罢工的胜利更有把握，决定再增派一个得力人员去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工人大罢工。经过再三思考和研究，他认为留苏归国不久的刘少奇，正是合适人选。

刘少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湘区党组织的安排。他没有耽搁，花了昂贵代价才买到一张可以立即上路去株洲的汽车票，在株洲爬上株萍铁路的火车，于 9 月 11 日赶到安源。

刘少奇即与李立三共商对策，并深入到工人中了解情况，发动群众。

这时粤汉铁路武长段罢工风潮再起。路矿当局不由得非常恐慌，害怕工人发生强烈的连锁反应。不得已，反要求俱乐部不要公布萍乡县里封闭俱乐部的训令。俱乐部因此向路矿当局提出三项条件：

（一）请矿长会同株萍铁路管理局局长陈请行政官厅，明白出示保护俱乐部，严禁造谣。

（二）俱乐部所设互济、游艺、学校等项，现每月开支预计约二百元，请路矿两局按月各津贴一百元。

（三）请于七日内将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清。

并明确限定路矿当局要在 9 月 12 日午前作出完全答复，以息众愤。否则工人们就要作“最后之对付”。俱乐部向全体部员下达的通知中说，路矿当局“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

路矿当局两次回话，都是吞吞吐吐，缺乏诚意，拖延应付。

13 日，刘少奇与李立三和工人代表，遂共同作出罢工决定。

为了更好地领导这次罢工，刘少奇和李立三一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把各种问题都想到。他们先后紧急召开党支部会议和工人代表会议，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检查了罢工准备，交代了注意事项。

在党组织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刘少奇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大罢工的具体形势和应采取的策略。指出当时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给了安源工人以很大鼓舞，现在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决心很大。（二）俱乐部已在工人中树立威信，言听计从，只要俱乐部一发

动，绝大多数工人都会参加罢工。（三）路矿当局是害怕工人罢工的。他们的后台是帝国主义，他们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如果工人一罢工，煤挖不出来，运不出去，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就不好交差。刘少奇的中肯分析，有力地统一了党内思想，坚定了全体党员发动工人罢工的决心。

俱乐部曾经对一万多工人能否在罢工中齐心协力，能否维持罢工的秩序表示担心。经过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俱乐部领导人的陈述利害和启发，在工人代表会议上，各处工人代表一致担保，表示自己那里的工人能够齐心协力，能够维持好罢工中的秩序，在罢工期间，工人们将更加文明，更加有纪律，一定听从俱乐部的指挥和调动。

经工人代表回去做好工作后，又召开了工人群众大会。刘少奇、李立三都作了鼓动性的讲话，说明罢工意义和目的，所要注意的事项，要求工人们加强团结，作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刘少奇指出，要取得罢工的胜利，光凭革命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革命的坚固团结和严密秩序。搞这样一次有一万多工人参加的罢工，不仅在安源是第一次，而且在整个湘赣地区都是前所未有的。应该力争成功，不能失败。在大罢工中能否有秩序，维持秩序，则是关系到成败的重要问题。

在安源举行这样一次大规模的罢工，的确应该想得多一点，周到一点，必须做好种种准备工作，哪一方面都不能疏忽大意。安源素有“小上海”之称，社会成分相当复杂，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社会秩序本来就很混乱，弄不好，哪一个方面都可能来影响罢工秩序。特别是帮会组织在安源较多，其中以红帮会势力为最大，他们在安源开设赌场、妓院、鸦片馆等，也都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既剥削工人，又毒害工人，把安源搞得乌烟瘴气，这些帮会组织的能量很大，破坏力极强，不妥善处理，显然有害。但是这些帮会的成员大都工人出身，是因“讲义气、互助互济”而参加帮会组织的。这样，很多工人是帮会分子，不少工头也是帮会分子，甚至是帮会的头头。刘少奇对这些组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帮会组织也有两面性，有破坏性的一面、反动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可以利用的一面，只要做好争取工作，是可以为我们利用，为我们服务的，至少可以不成为罢工的阻碍力量，影响罢工秩序。因此刘少奇布置专人去做了争取红帮会的工作。李立三还提了一只公鸡和两瓶酒，亲自去做红帮头子的工作，喝鸡血酒。红帮头子拍胸脯保证配合俱乐部的罢工行动。红帮会的工作做好了，其他帮会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这样不仅防止了帮会头子的破坏，而且保证了罢工期间的良好社会秩序。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9 月 13 日午夜，俱乐部正式向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发出罢工号召，发表罢工宣言，提出十七条要求。 14 日凌晨，各处汽笛一起长鸣，发出罢工信号，安源路矿一万三千多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煤矿停止挖煤，窿内工人高举斧子、手镐等，高呼“罢工！罢工！”涌出窿外，用树枝等杂物将矿井封堵，并有专人把守，竖起大旗一面，上书“罢工”两字。开往株洲的火车停开，僵卧在铁轨上。除关系全矿安全和生活的八方井锅炉房和电机仍在照常工作外，全路矿同时瘫痪，洗煤台、修理厂、制造处等单位的机器完全停止转动。到处都张贴着醒目的俱乐部布告，写着“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话。

俱乐部监察队威严得很。在监察队长周怀德带领下，臂佩红袖章，手持指挥旗和防卫器具，分成小分队，各处放哨巡逻，整肃秩序，担负保卫。没有俱乐部通行证，任何人不得在矿区内通行。工人举动“极为文明”，社会

“秩序井然”。俱乐部不仅是矿区工人罢工的司令部，而且成了矿区真正的权力机关。

刘少奇等对此情况曾作了如下记载：“矿山工人，分子甚为复杂。在一小市镇内，万余人举行罢工，无一人不为秩序吃虑。罢工后，商家大起恐慌，以为抢劫会即刻实现，天尚未黑，即纷纷闭市，市面自八九时后，除工人监察队及警兵外，便没有人行走。乃这次罢工秩序之好，初非意料所及。此时俱乐部命令之严，远过军令。平时街上赌钱及窿工食宿处之赌博皆在所不免，而于罢工期间内，赌博乃绝迹；即非工人之在街市赌钱者，见俱乐部监察队旗帜一挥，便都四散。平时星期日街上工人拥挤不开，独这几日内，工人皆归住房不出。各工作处之监守员监守极严，无论何人皆不准入内，即有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之特别徽章的人及兵士都不准通行，惟有俱乐部的条子方可。故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部均到俱乐部请发徽章，这时候的俱乐部真是唯一的独裁政府呀！”[①]刘少奇兴高采烈的情绪溢于字里行间。这可是他参与领导创造的工人运动的杰作呀！

[①]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哀兵必胜

罢工前夕，毛泽东曾对这次罢工的斗争策略提出建议，说“哀兵必胜”，罢工的口号等一定要“哀而动人”。刘少奇和李立三积极地贯彻了这一意图，发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的罢工号召。罢工宣言的笔调极其凄惋感人：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作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

接着，罢工宣言根据工人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情况，严正地提出了十七项复工条件：

（一）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

（三）从本月起路矿两局每月例假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

（四）以后工人例假、病假、婚丧假，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

（五）每年十二月须发给夹薪。

（六）工人因公殒命者。路矿两局须给以天字号棺木并工资三年，一次发给。

（七）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营养终身，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

（八）路矿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给。

（九）罢工期间工钱，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十）路矿两局须指拨火车房后之木围及南区警察所前之大坪为建筑工会之基地，并共拨一万元为建筑费，每月两局各津贴二百元为工会常月费，从本月起实行。

（十一）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二）窿工全体工人须加工资五成。

（十三）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四）窿工食宿处须切实改良，每房至多不得过三十八人。

（十五）洗煤台须照从前办法，每日改作三班，每班八小时，工资须照现在长班发给，不得减少。

（十六）制造处、机器厂将包工改为点工。

（十七）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

在俱乐部作出罢工决定时，成立了罢工指挥部，李立三担任罢工总指挥，刘少奇担任与路矿当局谈判的全权代表。因李立三在安源人都认识，怕易被人暗算，俱乐部决定李立三住在秘密地方进行秘密策应。初来乍到还不为人所熟悉的刘少奇，则氏驻俱乐部对外应付一切。罢工后，俱乐部同时函告路矿。两局，称：“如欲调商，即请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俱乐部还致函萍乡县署和赣西镇守使署，申明罢工原委。

为了防备敌人的破坏和镇压，俱乐部采取了各项应变措施。除了组织监察队维护矿区秩序、担任保卫外，还建立了侦察队，及时探察各处消息。并确定了各工作处的联络员，组成联络网，保证联系，互通声气。此外还清理好文件，作了万一需要时的转移准备。为取得全国工人的声援，刘少奇他们还把罢工宣言向外广泛散发。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消息，震动全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来声援电文，说：“我们接阅你们的罢工宣言，我们知道你们已经鼓着你们的阶级斗争的勇气和惨无人道的资本家、官僚、军阀宣战了。我们非常佩服你们的奋斗精神与作战的力量。”“我们诚诚恳恳地愿意你们坚持到底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全国各地许多工人团体组织，也纷纷来电来函表示支持。湖南、上海、北京等地报刊，《大公报》、《通俗日报》、《申报》、《民国日报》、《晨报》、《时事新报》等，都接二连三地报道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消息，许多报刊发表评论，称颂备至。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斗争的决心。

路矿当局却极度恐慌，急急地密谋行动，妄图“将此掀天风潮消灭于无形”。在罢工发生的当天清晨，路矿两局就向赣西镇守使署、萍乡县署和上海总公司分别告急，要求军政当权者即采取措施，派兵保护路矿，对罢工工人进行弹压，要求总公司火速回应对策。同时勾结煤矿总监工王鸿卿策划破坏罢工的阴谋。

王鸿卿鬼鬼祟祟召集全体工头会议，要他们四出活动，先找有亲戚朋友关系的工人游说，进行威胁利诱，收买一些动摇的人来复工。这些人畏畏缩缩前来，即被严密防卫的监察队一一挡了回去。

此计不成，路矿当局又听取王鸿卿献策，悬赏六百大洋，密遣杀手行刺李立三，想使罢工群龙无首而溃散。工人们听到这一消息，更加怒不可遏，誓称如果俱乐部主任李立三遭毒手，他们就要使路矿当局的全体职员没有一个活着出去的。工人监察队也对李立三加强了防护，左右不离人，使刺客根本不能下手。

最后路矿当局只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赣西镇守使署的武力上，疏通镇守使萧安国将安源路矿划为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9 月 14 日下午，以“每人两元一天”的花销，请来李鸿程旅数百名士兵，荷枪实弹，进占了俱乐部和各个重要工作处。 15 日，数千愤怒的工人冒死冲入俱乐部，守兵着慌，便由后门山背鼠窜而跑。同时，刘少奇还在士兵中进行教育工作，工人们也跟着向士兵作宣传，述说工人所受的痛苦情况，工人和当兵的大家都是穷苦人，不能自己人对自己人，为别人卖命，工人罢工也应得到当兵的支持。结果不少士兵也被说动了心，对罢工同情起来。

路矿当局由于破坏罢工的阴谋“屡战败北”，被迫挽请商会出面，约请俱乐部代表谈判。

罢工开始时，9 月 14 日上午，就曾有商会代表谢岚航、地方绅士陈盛芳来俱乐部，自愿担任调解人。刘少奇即要他们将俱乐部的十七项条件带给路矿两局，要路矿当局识时务，尽早答复。晚上，路矿当局来信，诡称各项要求都可承认，只是现时做不到，要先开工，再慢慢磋商。这就把工人先上工作为谈判条件。这一要求，被刘少奇坚决拒绝，严词驳回。刘少奇针锋相对指出，工人所希望的就是要解决目前生活问题，如果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入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这是万不能解决问题的。15 日，路矿两局约请李立三到商会谈判，但重弹先开工、后商谈条件的老调，使谈判仍无进展。

16 日，路矿当局变换手法，运动绅商学界写信，劝俱乐部作先开工后谈判的让步。刘少奇等强硬他说：不承认俱乐部所提条件便没有谈判余地。调解人一看没有转圜余地，不得不知难而退。

为了取得社会各界进一步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在刘少奇等的指导下，俱乐部发表了第二次罢工宣言，继续“哀而动人”地写道：

“各界的父老兄弟：米也贵了，布也贵了，我们多数工友——窿工，还只有二十个铜子一天，买了衣来便没有饭吃，做了饭来便没有衣穿，若是有父母妻子一家八口的那就只有饿死的一条路子！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做工，所以要加工钱，我们不能赤着身体做工，所以要加工钱。路矿两局只要将那纸烟酒席费节省一点下来都够我们要加的工钱，但我们停工已是几天了，他们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我们从前过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简直是牛马奴隶的生活，天天在黑暗地底做了十几点钟的工，还要受人家的打骂，遭人家的侮辱，我们决不愿再过这种非人的生活了，所以要改良待遇。现在我们停工几天了，路矿两局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路上走吗？

“路矿两局要强迫我们去死，我们自然是非死不可，现在两万多工人都快要死了！亲爱的父老兄弟们！你们能忍心见死不救吗？

“我们要求路矿两局的条件是救死的唯一法子，不达到我们的要求，便没有生路，我们也只好以死待之。

“各界的父老兄弟们！我们两万多人快要死了！你们能忍心见死不救吗？”

路矿当局再要拖延，不谈判是不行了。9 月 16 日，路矿当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直接派人到俱乐部，请俱乐部代表到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

刘少奇应约赴矿局公事房谈判。萍矿矿长李镜澄、副矿长舒修泰，充当调停人的豪绅文仲伯、贾肠谷，戒严司令李鸿程都已坐在那里。

谈判一开始，刘少奇和李鸿程两人首先短兵相接。李鸿程依仗手中武力，摆出一副不善的架势。

刘少奇哪怕他这一套，也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从容不迫地申明罢工理由，强硬表示，不先行磋商条件，就绝对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请路矿两局爽爽快快，再不要拖延，再不要存别的想法，要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来。

李鸿程没说几句活，就图穷匕现，凶相毕露。他威吓说，工人罢工，这

是作乱，是犯法的，如果还要坚持下去，就将刘少奇“先行正法”。

刘少奇毫不为动，凛然回答：罢工是一万多工人的行动，罢工条件是一万多工人的要求，决不是谈判代表一个人的行动和要求，你就是把代表“砍成肉泥”也无济于事。一万多工人是决不会罢休的。

李鸿程又一横说：对一万多工人也有法子制裁，这里有许多兵呢。

“就请你下令制裁去！”刘少奇不容李鸿程再强横，愤怒地说。

谈判僵住了。这时候，几千工人正在外面声援自己的代表，把公事房层层围困，围得水泄不通，只见人头汹涌，举臂如林，阵阵发喊，吼声如雷，惊天动地一般。工人们声言谁敢动他们的刘代表一根毫毛，就要把路矿两局打他个片甲不留，片瓦不存，同归于尽。工人们高呼：请刘少奇出来，不要在这里谈判，要谈判到俱乐部去谈判。

面对这种情况，不仅充当调停人的豪绅文仲伯、贾肠谷吓得面如土色，坐在那里如坐针毡，极为不安；就是矿长李镜澄和副矿长舒修泰也都慌了神，心急气短起来。显然再要强硬下去不是个事了。李鸿程和两位矿长都软了态度，“唯唯要求而已”，表示可以谈判条件，请刘代表先回去，下午再来商量。

刘少奇再一次严正申明，要他们不要再耍什么手腕，如果还是那样，下午就不必谈，如以为用别的方法可解决问题的话，就请现在把他这位代表给砍了。说完，刘少奇昂然起身，在工人们簇拥下回到俱乐部。

当下，李鸿程也即给俱乐部写了一封信，信中代表驻军表示道歉，并愿意作为中间人进行调解，从速解决问题。

这次交锋，广大工人群众受到极大鼓舞，对刘少奇的坚决勇敢的斗争精神非常敬佩，称他“一身是胆”。

但是，在谈判桌上，依然有一场硬仗。谈判在不断的讨价还价中进行，双方争论得舌敝唇焦。经过刘少奇、李立三的坚决斗争，在有理有利的情况下，俱乐部方面也作出适当让步，给对方一个下台的台阶。9 月 17 日深夜，双方终于达成十三条协议。

路矿代表像斗败了的公鸡，无可奈何地在他们向总公司送呈的电文中说：“对于十三条如若不答复，则决裂，决裂以后，路矿产业也不能保，……与其坚持，造成产业破坏，毋宁示弱以保产业。”

路矿两局如此呈文，固然为了好交帐，但也决非是危言耸听。在谈判中因路矿当局一再讨价还价，致使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监察队工人等得不耐烦，曾冲进锅炉房，发出警告，如再不接受条件，就将锅炉房、电机房炉火熄灭。同时，电机处及八方井打风机、打水机三处，也由于“烧炭告罄”，有马上停转、矿井被水淹没的危险。对于这种情况，路矿两局是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俱乐部方面，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也是决不愿意看到的。在罢工中，关于锅炉房和电机处照常工作的问题，是俱乐部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作出的决定。刘少奇曾经指出其中的利害：锅炉房乃供给窿内打水机、打风机之电，若停止工作一小时，全矿即将完全被水淹没；无风全窿即将着火。这一部工作乃萍矿最险要的工作，所以不能停工。电机除供给电车（用电）外，尚供给安源全市电灯及窿工食宿处之饮水用电所需，若停止工作，则全市黑暗，且万余工人无水可饮，故亦不能停止工作。俱乐部作出这样有理有利有节的决定，不仅是争取罢工斗争的胜利所必要的，也是基于对全体工人群众、对全社会负责的态度。

9 月 18 日，双方代表（俱乐部代表李立三，萍矿总局代表舒修泰，株萍路局代表李义藩），在路局机务处正式签定协议。内容如下：

（一）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三）以后工人例假等日，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

（四）每年十二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

（五）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半，在百五十元以下者，给百五十元，一次发给。

（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为限。

（七）路矿两局存饷分五个月发清，自十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局八月份饷，须于本月二十日发给。

（八）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九）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从本月起实行。

（十）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一）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日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递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

（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从这十三条协议看，原来十七条的要求绝大部分得到实现。它标志着安源路矿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刘少奇等的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的结果。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在评价这次罢工胜利时，满腔热情地说：安源路矿“在罢工中表示群众高度的热忱与勇气，经过五日，终使路局屈服，承认工人十三条件，最主要的是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及增加工资，完全胜利”。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极左观点，对刘少奇在安源这段时期的革命斗争情况进行攻击，认为没有使罢工斗争坚持

到路矿当局答应全部条件，是个极大的右倾错误，是对工人阶级利益的叛卖。

刘少奇看到这种大字报和批判文章后，气愤地说：“具体的历史事实是否不掉的！”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进行斗争？”夫人王光美曾试探着和刘少奇探讨，“能不能坚持罢工直到路矿当局答应全部条件为止？”

“太冒险。”刘少奇向王光美分析说，“毁了机器房，水淹了矿井，几年不能开工，一万多工人怎么办？几万人的吃、穿、生活怎么办？”刘少奇说：“在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以后，罢工高潮时，经过谈判，路矿当局满足了工人的大多数要求，取得了胜利。既争取了安源工人的眼前利益，又代表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安源大罢工效果是好的，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提高了工人的觉悟和政治地位，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力量，鼓舞了全国的广大工人。”

①

“要按历史的客观条件评价历史事件！”刘少奇以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严正态度回答了一场反历史主义的暄嚣。

---

① 参见王光美 1980 年 1 月 25 日给《工人日报》社和《中国青年》杂志社的信；《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雄壮的凯歌声

安源罢工胜利结束。一万多欢腾若狂的路矿工人，于 9 月 18 日下午，在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会场中间搭了演讲台，台前飘扬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大旗。当数百名工人举着旗帜，簇拥刘少奇、李立三等进入会场时，掌声雷动，无数工人执帽欢呼跳跃，热烈欢迎。刘少奇和李立三在工人们的热烈掌声中都讲了话。

庆祝会发表了复工宣言。它欢呼：“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是露布安源黑幕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我们现在要祝工人万岁！工人俱乐部万岁！”

宣言指出，这次罢工所获得的胜利虽然很少，但这是第一次胜利，以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只要我们自己的团体俱乐部存在，我们的痛苦在这次不能解决的，在以后的一次次胜利中再解决。“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

庆祝大会后，举行了游行。刘少奇、李立三等前导，群众队伍浩浩荡荡后随，旗帜蔽天，迎风翻飞。游行队伍走遍安源的新街和旧街。然后回俱乐部，照了相。相机拍下了群众的欢乐节日，拍下了历史的珍贵时刻。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发来函电，高度赞扬说，安源路矿工人“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对于诸工友这次的大胜利，敝部是很佩服的欣喜的，敢向诸工友前庆祝胜利”。并明确指出：“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的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热切希望安源路矿工人在今后“一方面要发展诸君已经学会了的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好打倒资本阶级；一方面要设法练习诸工友的管理能力，好待社会革命后，管理一切的产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诸工友的真正胜利”[①]。

由于刘少奇在领导和指挥罢工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无比机智勇敢，以及正确运用斗争策略的才能，使他深得工人群众的信任、爱戴和拥护，名震安源。工人们曾在歌谣中热烈颂扬他和李立三。这时候，刘少奇仅仅二十四岁。

安源罢工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②]，这的确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所罕见的。工人俱乐部因此旗帜大张，安源万余工人争先恐后纷纷加入。

为了使俱乐部成为“坚固的团体”， 1922 年 10 月，俱乐部进行改组，实行代表会议制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选出俱乐部总主任李立三，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外主任刘少奇，窿内主任余江涛，及“总代表”四十五人，“百代表”一百四十人，“十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二人，委任文书、会计、庶务、教育、宣传、互济、游艺、交际等股的股长和委员三十多人。

其组织结构为，每十个俱乐部工人组成一个基层组织，称“十人团”；每团选“十代表”一人；每十团选“百代表”一人；矿里的每个工作处选“总代表”一人。总代表会议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每月开常会两次，再有要

[①]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庆祝安源罢工胜利函》（1922 年 9 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事即开临时会。“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复议机关，每月开常会一次，报告俱乐部一月中的经过，或审议最高代表会议提交的复决案件。工作处全体“十代表”会议也是每月一次，由该处总代表报告俱乐部每月大事，讨论该工作处的问题，并由讲演股负责讲演。俱乐部全体部员大会每年定期于5月1日召开一次。如有临时要事，即召集临时大会，但只作简单报告。俱乐部四个主任组成俱乐部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构。主任团下设干事会，为俱乐部干事机关。后来又组成经济委员会、裁判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和工人消费合作社并为最高代表会议的直辖机关。工人监察队后来扩大成立为经常性的纠察团，有二百多人，团长是周怀德，副团长是周子南。这些组织，明显地带有苏维埃的色彩。从此，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更加严密、健全和有力量，成为全国工会组织中最坚强的工会之一。

关于安源俱乐部工人组织在全国矿工组织中的突出情况，我们可以从后来邓中夏在1924年11月第2期《中国工人》上发表的《我们的力量》一文中所提到的数字得到比较：“中国矿山虽多，惟有全部组织的，只江西安源及湖南之水口山二处。安源组织有一万二千余人；水口山原组织三千余人，惟去年遭赵恒惕惨案后，归于停顿了。其余只山东之淄博，直隶之开滦，湖北之大冶，河南之焦作，颇有一部分之组织。淄博约为六千人，开滦约为四千人，大冶约为一千人，焦作约为二百人。合计全国矿工组织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人。”这就是说，当时安源俱乐部有组织的矿工，将近占到了全国有组织矿工总数的46%。这里还没有把附入于安源俱乐部的株萍路有组织的铁路工人一千多人算在内。

安源罢工的胜利也推动了两湖地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1922年11月，中共安源党组织根据中共湘区党委的指示，先后派出俱乐部文书股长蒋先云、交际股长谢怀德等，到萍乡湘东永和煤矿和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开展工人运动，发动和领导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1922年12月，汉阳钢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的工人联合起来，建立了汉冶萍总工会。同时成立的还有粤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南工团联合会。安源工人俱乐部分别参加了这三个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刘少奇先后被选为汉冶萍总工会的执行委员和会长。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参加了这三个工人阶级的革命团体之后，局面大大打开，使得有组织的工人斗争由矿内向矿外发展开去，初步实现了不分省别县界的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大联合的斗争日益成熟起来。对此，刘少奇等曾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充满信心地说：“产业的发达，资本主义自己之措施，已经付与工人以团结的机会及自己解放的力量。工人苟运用得法，则在长途的阶级斗争中，雄壮的凯旋声将永远为工人所歌唱。”“历史的大轮盘已经载着吾人向全体人类解放的方向前进，已经叫工人起来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并要为全人类——谋幸福，试问谁有力量能将这大轮盘阻住使之后退呢？‘反拨适助前进’，这是物理学的公例。”“我们今后不仅应为我们自己的团结，为我们万余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更应为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苦朋友努力奋斗！”[①]

俱乐部的发展，妨碍着专事鱼肉工人的一班工头们的强霸行为，使他们

[①]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不能任意欺压和剥削工人，勾结舞弊，为所欲为。但他们不甘心，千方百计地破坏和低毁俱乐部。1922 年 11 月间，他们蓄意挑拨一些落后工人捣乱，将生产中发生的一些事故推到俱乐部和参加俱乐部工人的身上；并联络一部分还没有参加俱乐部的工人和与他们有亲密关系的工人，仿效俱乐部做法，准备组织一个游乐部，与俱乐部唱对台戏。

工头们反而引火烧身，激起广大工人群众对他们的坚决斗争。当时工头们自以为得计，天天开会讨论，策划算计工人俱乐部。有次开会竟临时主张刺杀李立三。阴谋不密，为俱乐部工人获悉。工人们群情激昂，誓予严厉对待，将数名嫌疑工头拿送司法科，拘押起来，质问他们是否要破坏俱乐部，是否要谋害俱乐部主任李立三？

这几个工头哪敢承认，申辩他们开会只是为了组织团体，讨论参加俱乐部和议定各工作处的包工办法如何改变为分帐（合作）等。

刘少奇等将计就计，指导着俱乐部工人顺水推舟：你们既有这样想法，那好，就这样来做。在俱乐部的主持下，把煤矿的包工制改为合作制，由俱乐部来议定合作章程。大家都得按照章程的条规来办，再不许工头们胡作非为。“于是破天荒改包工为合作的办法，在萍矿乃告成功”[①]，废除了在安源煤矿已经实行二十多年，使广大工人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可恶的封建包工制。

刘少奇后来评论说：“此次罢工的意义，对于安源工人直接的利益，工人‘阶级的觉悟’，及中国劳工解放运动前途发生的影响，至为巨大，而意义在安源之明而易见者，厥为打破‘包工制度’。前此工头与职员之虐待工人、压迫工人、剥削工人，以及工头职员彼此勾结弄弊之种种黑幕至此已扫除无余。万余工友在安源做了二十余年牛马的工作，过了二十余年的非人生活，忽然得此出头的一日，真似出于烈焰之中而入于清凉之世。”[①]

安源工人俱乐部改组后，为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工人的文化知识和政治认识，还创办了《安源旬刊》。这使安源工人更有了说话的地方。纵观刘少奇后来的革命活动中，每到一个地方就很重视办报办刊，掌握宣传喉舌，可说从此始。

为抵制奸商、资本家和工头的重利盘剥，减轻工人的负担，俱乐部还筹组了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并于 1923 年 2 月正式成立。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中国工人的第一个经济组织。它由工人自己来管理，经理等职员都是通过社员的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个消费合作社的创办，不仅减轻广大工人群众长期来所遭受的中间剥削，也大大地方便了群众生活，因而深受欢迎。尽管投机奸商对它十分嫉恨，进行多方阻碍和破坏，但由于它真正地植根在工人群众之中，还是越办越红火，表现出顽强生命力。刘少奇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一贯重视合作社工作，对合作社的理论与实践有深入的研究和贡献。如果要追溯渊源，安源时期的他便有这方面的思想和经历。

安源罢工后取得这么多深入的胜利，刘少奇等花了足够的心血。但在刘少奇的思想中，是决不以此为满足的。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步骤，首先要“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第二步就要“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然后“在

[①]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①]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因而刘少奇在一年后《对俱乐部工作的回顾》中，殷切指出：“工人以罢工手段要求普遍增加工资和减少工头职员无理的压迫和剥削，并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乃是一种手段，即是利用群众的‘利害’心理，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这种经济的奋斗，在工人将来全部的利益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得要做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才能使工人目见利害的关系团结起来，才能训练工人的奋斗能力及方法。这是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①]

[①] 见刘少奇：《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1923 年 8 月 20 日），编入《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2 月出版。

志同道合

在安源共同的战斗生活，伴随爱情发生。1923 年 4 月，刘少奇与志同道合的何宝珍结为伉俪。

何宝珍（又作葆珍、葆真等），湖南道县人。因家境清寒，十来岁就被父母亲送与一家蒋姓地主的女佣做童养媳，一起受雇于蒋家。地主女儿上学，她作陪读。结果刻苦而聪慧的陪读者，却比小主人还学得好。在县立国民女子小学堂里，何宝珍得到了该校老师的深切同情和喜爱，将她收录为正式学生，与小主人同班。 1918 年春天，在一些正直教师的帮助下，何宝珍跟蒋姓地主及其女佣脱离关系，获得自由，考进衡阳县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女师，她除了学习，还要在寒暑假中做些校务杂事，以挣些经济收入维持学习生活。艰苦的生活反而促使其更加勤奋，她成绩优异，经常名列前茅。

1919 年，“五四”运动波及衡阳。何宝珍首先响应省学联的罢课号召，将省学联罢课宣言摘抄在黑板上。在她的鼓动和带领下，全班学生剪辫子，梳短发，每人手拿一面写着“反对二十一条”等口号的三角小旗，不顾学校方面阻挡、封闭大门，纷纷翻出墙头，参加了全市反帝爱国运动大会和示威游行。接着，学校罢课，何宝珍积极参加学生讲演团，深入大街小巷、沿河码头、市郊农村，演出新剧，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她主演了《哀台湾》、《孔雀东南飞》等时事活报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和反动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抨击和反对封建礼教。她又参加国货维持会的各种活动，宣传爱国主义，抵制和焚毁日货，要求大家购买国货。何宝珍成了女师进步学生爱国活动的积极分子，全校学生公推她为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代表。

“五四”运动后，邓中夏、何叔衡、恽代英、毛泽东等，先后到衡阳省立第三男、女师范等校作社会调查，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指导和组织青年运动，开展建党建团活动。何宝珍的思想，因此而跃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在衡阳地下党负责人张秋人的教育、培养下，她于 1922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女师团组织的负责人。这年，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掀起高潮。为配合长沙、安源、水口山等地的工人斗争，何宝珍根据衡阳党组织的指示，积极组织女师的学生运动，声援各地工人罢工。

女师校长欧阳骏，是守旧的人物，多次传叫何宝珍等到校长办公室，进行严厉训斥。何宝珍根本不理，率领进步同学相机反击，在群众中揭露校方的专横腐败，校务无能，贪污学生校服、伙食杂费等劣迹，出女校校长的丑。欧阳骏对何宝珍恨得咬牙切齿，勾结县衙，串通道县蒋姓地主在衡阳求学的儿子，声称何宝珍是蒋家人，“她在外犯事，蒋家有权处置”，竟蛮横无理地把何宝珍禁闭起来，等待蒋家到校接人。地下党负责人张秋人和各校进步师生，设法帮助何宝珍出逃。女师校方便公开开除了她的学籍。何宝珍带着张秋人给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介绍信，投奔长沙，以亲友名义住在清水塘毛泽东家。

毛泽东和何叔衡等，特别关怀何宝珍。毛泽东还给她取名“何葆贞”。1923 年春，何宝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安源大罢工胜利展开之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决定增加一位女同志去安源加强工运工作。何宝珍在毛泽东那里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何宝珍在路矿子弟学校和补习学校任教，在工人夜校初级班兼课，还兼俱乐部书报科委员。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何宝珍工作得相当出色。在教学实

践中，她讲授《工人读本》、《工人补习教科书》等教材，经常运用参观图像、通俗讲演、化装演说、工人辩论会、研究讨论会等各种教学方法，向工人灌输文化和政治知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深受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和尊重。

刘少奇和何宝珍，早就在毛泽东家里见面相识，互相有一点了解。现在在安源朝夕相处，更加增进了了解。刘少奇十分同情何宝珍的苦难身世，赞成她不畏惧恶势力，奋不顾身追求自由、追求解放、追求革命的精神，喜欢她聪明、能干、刻苦、努力和非凡女性的性格和作为。何宝珍知道刘少奇也是从黑暗的社会和封建的家庭中冲杀出来的，并且在列宁主义的故乡留过学，是一位有文化知识、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有为青年，刘少奇在安源罢工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更使她倾倒。在工运事业的共同斗争中，两颗年轻人的心接近了，对未来理想的追求更使他们难分难舍。

何宝珍与刘少奇结婚后便跟着刘少奇走南闯北，他们同甘共苦、患难相依，为革命事业共同奋斗。

刘少奇调离安源后，她于 1925 年即随刘少奇到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参加了方兴未艾的五卅运动。

1926 年，何宝珍随刘少奇到广州，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斗争。

同年 10 月，同刘少奇一起到武汉，接受党组织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做收发文件的管理工作，还经常参加慰问伤病员和救济妇女儿童等活动。在武汉期间，党内许多同志得到过她无微不至的照顾。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先后介绍一些党团员与她共事，她总是努力帮助他们解决食宿困难，帮助他们熟悉工作环境和业务。当时，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与省总工会其他三位同志，一起挤住在汉口尚德里四号一幢小楼里，开会、听汇报、接待来访、分派内外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何宝珍兼理一切家务，提供一日三餐，使大家温饱相安，亲密无间。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形势恶化，她根据组织要求，想方设法将同志转移，或掩护起来，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大革命失败后，何宝珍随同刘少奇辗转庐山、上海、天津、东北等地，最后又到了上海，从事党、工会、妇女和群众的工作，任过交通、教员、联络，住过机关、店铺、工厂。为了党的事业和同志安全，她不顾个人安危，忘我工作，出没在最危险的地方。

1932 年冬，刘少奇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党决定何宝珍继续留沪，担任全国互济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负责同赤色国际互济总会的联系，为难友们聘请律师，营救被捕同志等。她改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四处活动，来往奔波。

何宝珍的频繁活动，终于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前来逮捕她的敌人快进门时，她忙把小儿子毛毛（刘允若）托给了邻居，然后从容应付眼前发生的一切。敌人如狼似虎，翻箱倒柜，最后把她带走了。

何宝珍在与刘少奇一起生活的年月里，生有两男一女，刘允斌、刘允若和刘爱琴。为革命，何宝珍一次次忍受与幼儿幼女离散的痛苦。在安源，她和刘少奇就把不满周岁的刘允斌送到湖南宁乡老家去扶养。

何宝珍被捕后，敌人对她几次拷打，没有审出什么结果，便把她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连续审讯，依然没有弄清她的身份。敌人胡乱判了她 15 年徒刑，关押到南京市模范监狱服刊。她与钱瑛、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等一

起，组织难友，与敌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狱中斗争。她那机智、勇敢，善于应变的巧妙斗争，不仅使大家在精神上得到鼓舞，而且也很好地掩护了自己和难友，支持和帮助了同志。狱中最大的一次斗争是支持遭受迫害的国际友人牛兰夫妇。牛兰是职工国际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著名的共产主义战士。夫妇俩是于 1931 年在上海公共租界遭英国巡捕逮捕后被交与国民党法院的。国民党高等法院悍然判处牛兰夫妇死刑，继又减为无期徒刑。他们一直被关在南京第一模范监狱。何宝珍等决定，以要求改善政治犯生活待遇为由，间接声援牛兰夫妇。在监狱当局拒绝后，何宝珍等进行了不妥协的绝食斗争。监狱当局深怕饿死人，承担不起责任，最后被迫答应所有条件，并将牛兰夫妇送进医院治疗。绝食斗争取得胜利。

1934 年，一个互济会干部被捕入狱，在审讯中供出何宝珍。敌人就对何宝珍施以酷刑，要她招认一切。何宝珍咬紧牙关，誓死不屈。她对敌人只留下这样的话：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革命者是杀不绝的！

这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何宝珍在雨花台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1932 年冬，何宝珍与刘少奇的依依分别，竟成了永诀。

刘少奇痛悼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弯弓待发

新婚后，在何宝珍的悉心照料下，刘少奇以更充沛精力投入对安源工人运动的指导。这时正是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的腥风血雨时期。

1923 年 2 月 7 日，北洋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举起屠刀，对京汉铁路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中国工人运动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惨案。从此，北洋军阀的统治更加黑暗、残酷。工会被一律查封，到处都在流血和呻吟，中国的工人运动和煤矿工人运动遭受极大挫折，暂时转入低潮。

安源的情况却同全国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对此，邓中夏曾惊叹：“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原因，邓中夏分析说，“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使得赵恒惕对于工人不能不稍为和缓，所以‘二七’失败后，各地工会（广东除外）都遭封禁，而湖南却一时尚能支持。”[1]邓中夏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在“二七”事变后，专门去安源对俱乐部作出了方针性的指导，而刘少奇则坚决地实行了毛泽东的办法。由于刘少奇的领导正确和得法，广大工人紧紧团结在俱乐部的指挥之下。正如后来刘少奇在总结这段工作时所写的《“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一文中说的：安源路矿工会（俱乐部）所以“还能打破一切障碍发展自如”，“不过就是工友能够齐心、奋斗与看清环境取决阶级斗争的手段而已。”

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发生后，对安源并不是没有影响的。首先路矿当局的态度要起变化，他们会在这个事变中得到鼓舞，企图在一个早上反扑过来。汉冶萍公司的资本家，他们的嗅觉当然更加灵敏。他们以为盼到了机会，便同北洋军阀政府勾结起来，企图借用反动武力来封闭安源路矿工人俱余部，除掉他们日夜为之不宁的心中块垒。

正在这种风云变幻之际，毛泽东于 1923 年 4 月来到安源，同刘少奇等进行研究和商讨，召开了俱乐部的工人积极分子会议，专门对二七惨案后的斗争作出部署。毛泽东指出，在全国形势很严峻的时刻，要努力作好“弯弓待发”之势，就是说要把工作集中在准备将来的斗争上，大家更要从全局着想，在俱乐部的指挥下，加强团结，积蓄力量，把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以迎接更艰巨的斗争。

当时李立三已去武汉任区委书记，着手筹备成立汉冶萍总工会的工作。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职务便由刘少奇代理。刘少奇一肩挑起了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担子。他和陈潭秋、朱少连等，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弯弓待发”的策略，采取守势，不骄傲，不盲动，不冒险，巩固内部，坚守阵地，“拿拢”地方绅商，巧妙地、适当地、有限度地进行斗争，引导安源工人运动在全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能继续向前发展，度过许多危险，取得有限度的斗争胜利。路矿当局也因此不敢贸然作封闭工人俱乐部之举。他们知道这样做不一定有什么好果子吃，无疑地要遭到工人们的反抗，到时候矿山能否保住也就难说。与其冒矿山被毁的危险，还不如先让俱乐部存在着，大家相安着一点为好，虽说俱乐部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但那也是以后的事。

1923 年，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节来临。这也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

---

[1] 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09 页。

一周年的纪念日。为了庆祝工人阶级自己的节日，也为了显示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力量，显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真正存在和不可摧毁，刘少奇精心地组织并主持召开了有全体工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热情讲话。他赞扬工人不畏强暴，不怕压，奋力保护俱乐部的革命精神；勉励大家团结在自己的组织周围，齐心协力，继续努力奋斗。工人们欢呼响应，会场热火朝天，又是一个“红五月”气氛。会后举行了游行。刘少奇和朱少连在他们合写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中对此写道：工人一路喊着“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俱乐部成立万岁”等口号，“旗帜掀天，呼声雷动，颇极一时之盛。”“工人更知自己力量之浩大，精神为之大振。”面对这种情景，路矿当局为自己没有轻举妄动而庆幸。

二七大罢工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全党懂得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单凭党领导工人阶级作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广大的同盟军，要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千万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取得胜利。

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以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陈独秀的报告着重说明了中共中央于 1922 年 8 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所决定的关于“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报告在对全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也指出了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的问题。大会在充分肯定工人运动中，通过《劳动运动议决案》。并指出，“中国目下劳动运动方取守势，党的活动须多于工会活动，恢复工会口号须在被封工会各工友中宣传，引起压迫下之工人作政治的斗争。”大会发表的宣言公开申明：“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的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痛苦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刘少奇于 1924 年在安源加入中国国民党。

党的“三大”的主要精神，使刘少奇坚信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他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中更似鱼得水了。

1923 年 6 月，萍矿总局为在工人中制造矛盾，制造分裂，瓦解工人团结，搞了个小动作。他们不与工人俱乐部商量，由矿局机电总监私自给六名工人增加了工资。结果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竟因此引起一场广大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风潮。面对工人们的强烈要求，路矿当局一时束手无策，不得不挽请工人俱乐部来出面解决。刘少奇等代表工人俱乐部与萍矿总局谈判。他们先来了个下马威，严肃指出，这件事情完全是由矿局职员自己惹出来的，工人俱乐部在“事前并未与闻”，俱乐部不能来解决，“仍请矿局负责解决”。这就难坏了一筹莫展的萍矿总局，只差低声下气了，一再说好话，恳求俱乐部无论如何要来出面帮助解决问题。刘少奇掌握住了斗争分寸，适可而止，他清醒地知道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面，篷不能扯得太足，僵持下去激化起来，工人一旦因此采取罢工或其他危险手段，资本家就

可能狗急跳墙，勾结军阀下毒手，以此借口屠杀工人，这对安源工人和整个革命事业损失就大了，将会大伤元气。经过刘少奇十来天繁忙地在工人中间做必要的工作，和向萍矿总局作软硬兼施的周旋，终于在 1923 年 7 月 11 日，由他代表工人俱乐部，与萍矿总局的代表一起在续订的七项条件上签字。双方都作出了一定让步和妥协。

萍矿总局方面答应四条：（一）凡工薪每日在一元以上的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加工资的，照原薪增加 5%；（二）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一千元（包括原来的二百元津贴在内），从本年度 7 月起付给；（三）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必须通知俱乐部；（四）矿局对于学徒工，每年须考查他们的成绩一次（这是为了能让学徒工及时提升工资和转正出师）。

工人俱乐部方面答应三条：（一）俱乐部对于矿局的生产应竭力维持，按照工人现有人数，使每日平均生产额达到二千三百吨以上煤炭数目；（二）矿局所订规则，工人和代表都要共同遵守，如有违犯，照章办理；　（三）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接洽，不得动辄摘要挟和罢工等行动，如有发生，应由俱乐部负责。

从这些协议来看，工人方面得到的是进一步的切实利益；矿局方面得到的主要是允诺和维持生产。

工人俱乐部取得了又一次胜利。但是刘少奇没有陶醉在自己的工作成绩上面，而是更加兢兢业业，谨慎从事。并且不断回过头来检查走过的路、做过的事，纠正缺点，发扬成绩。

他在 8 月 20 日为庆祝安源大罢工胜利一周年而写的《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去年 9 月的安源罢工取得了成功，但也存在着某些缺点错误，为了不使以前的成功遭致失败，应当赶紧引导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当道路前进。刘少奇列举了主任团和各主任，包括自己的不足，列举了主任团下属各股，以及代表和部员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在自我批评中说：“刘少奇：作事精神不好，过于审慎，平时工友的交际和谈话都表现一种不愿意的懒散态度，作事也不大加整理，到后来对俱乐部事务不十分负责，以致引起工友的误会，这都是他的过错。”

据安源老工人回忆，刘少奇谦虚精神很突出，一贯严于解剖自己。他对己严，对人宽；对亲者严，对疏者宽；对领导机关严，对下级及群众宽。刘少奇代表他自己及俱乐部领导所作的自我批评，完全体现了这样的精神。

刘少奇在《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中，也着重地批评了那种“排外”的、帮派的、地域的、有界限的狭隘观念。他说：“我们工人的组合，是一个极大的组合，全世界都要联成一气，并要组织的和军队一样，才能与那些坚固组织的资本阶级奋斗。”他特别地强调，不能事事冒险直冲，使全部劳动运动受打击。他指出：安源俱乐部的力量虽然很大，但是还要依靠同外面各地工友的联络，互相紧密地支持和援助，才能立住脚跟。有些事情，应该要看外面的形势如何、全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怎样来办，不能只看安源工友的力量可以办到，就不顾一切地做起来。这种盲目奋斗的幼稚病，在有些工友的身上犯得很深。一遇什么事情，动不动就要罢工，在现在还要减少工作时间等。以为罢工是随便可以进行的，还有的甚至拿罢工来对待俱乐部。

他还教育大家不能把眼睛光盯在增加工资上，一定要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和真实的目的。“工人组织团体的目的，极为远大，将来还是要管理世界

一切的。增加工资，不过为争得目前很小的利益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团体的一种手段，绝对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我们俱乐部第一步替大家做的事，固说是加工资，但是俱乐部绝对不是只加点工资就完了的，而且工资是绝对不能常增加的。安源的工友有好些认俱乐部增加工人工资的手段，就是俱乐部的目的，以为工资既已加了，就是目的达到了，俱乐部就抛到侧面去了；或者总望俱乐部怎样第二次普遍加我们的工钱；或者又要求普遍加工钱，这都是认俱乐部以加工资为职志的错误。还有些只知道加几个钱，其余一切什么‘联合’、‘训练’、‘阶级斗争’等……都不关他的事，概不过问。这种错误的观念，实大足以妨阻团体前途远大的发展。”

刘少奇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俱乐部的工人应该很好地参加生产和遵守厂规，不能依仗俱乐部而随心所欲。他指出，我们有痛苦，所以要增加工资和减少压迫，但我们不能吃了饭不做工。要做工，就不能不有一种系统和秩序，工厂也要有正当的厂规。“有些工友以为厂规是资本家订的，不管他正当与否，故意不守；工头职员在工作上正当的指挥，也故意不听，于是工头职员也落得不去干涉大家不负责指挥。工友见工头职员不负责，以为没有人管他了，也效尤对工作上不负责偷懒起来，如是使出产及工人秩序均受很大影响。这种错误我们也是有的，我们应当守正当的厂规，我们应该自治，保持自己的秩序，不要人家说我们的坏话。”刘少奇切诫游手好闲的不良习惯和染上嫖赌等的堕落行为。

刘少奇要求大家一定要很好维护俱乐部的声誉。他指出，俱乐部在可能的范围内，是应该全力来保护工友的权利和利益的，“但我们俱乐部总不应该庇护工人不正当的过犯，或助长工人欺凌外人的威风，我们工友在去年以来有些以为‘现在我们有了俱乐部保护，闯出祸来有俱乐部乘肩’，于是就只凭自己的气愤，一意横行。这是何等的错误？如打张万发铺店，与军警盘查所发生殴打的冲突，以及各个人在外面闹出各种不正当的乱子等，都是绝不应该的事实。当工人还没有能力支配社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极端明了，不要闹出这种问题，弄得外面的人，个个痛恨俱乐部，使自己生命一样的团体受危险。”

刘少奇还指出：“俱乐部在现在社会之下，为自己立脚起见，不得不与环境稍加妥协，故他——俱乐部——在现社会的地位只是一个正式‘公团’，他的职权只能行使在他的范围以内。他绝对不是一个‘衙门’，不能受理或干涉社会上的一切事情。有些工友误认俱乐部是‘青天衙门’，什么事情都拉扯到俱乐部来办，范围以外的事情，都去干涉，呈文禀牒纷纷往俱乐部呈递。这种错误的认识，望各工友明了改掉。”

刘少奇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热望，在后面说道，人做事都会犯错误，做事越多错误就越多。因此我们绝对不要害怕有错误，也绝对不要隐瞒自己的错误。错一事，长一智。错误越多，经验越多，以后就可以不再错了。“‘往者已矣，来犹可追’。我们应该虚张胸怀，把我们一年来所做出的这些历史上错误的经验，一点点都灌了进去，努力革除，才不致辜负这一年的劳苦，才有心发展将来的事业。”“我诚意希望之将来的俱乐部，当从大家的齐心努力中得来。此时我的热潮已禁不住不断的祷祝！”

就在这 8 月里，安源工人俱乐部根据情况需要进行了领导机构的改造，刘少奇当选为俱乐部总主任，朱少连任路局主任，陆沉任窿外主任，朱锦堂任窿内主任，胡立生、黄静源、刘义任分别担任紫家冲、株洲、湘东分部办

事员。并在新选出的俱乐部干事会作出主任团的分工，总主任刘少奇担任对外一切交涉及内部整理、训练等项工作。领导班子和组织上的进一步健全，给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持续向前发展提供了保证。

1923 年 9 月 18 日，是安源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大罢工胜利一周年的日子。这天，在刘少奇等的组织和主持下，俱乐部举行集会纪念，发表宣言。宣言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非解除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两重压迫，殊不足以言解放”，明白地提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上的要求和目的。会后，工人们再次举行大游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革命团体向安源俱乐部纷纷发来贺电和贺信，称赞安源工人俱乐部是“照耀于黑暗社会中的——明星”，“确是劳动界的一根柱石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贺说：“去年今日，诸君奋斗的精神，已增了中国劳动运动历史的光荣不少，在这一年中，诸君又用全力于建设方面，以巩固工会的基础，这样，诸君向资产阶级作战的道路，算是一步没有走错。”对安源工人俱乐部作“向资产阶级作战的道路，算是一步没有走错”的评价，这在全国工人运动中是绝无仅有的，评价的确很高。

第二次大罢工

为了实现中共“三大”确定的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方针， 1923 年 11 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劳动运动问题，通过了《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议决案》根据自“二七”工潮以后，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工人组织大部分被破坏，党的“三大”所议决的建立全国总工会及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时都不容易着手的实际情况，确定以最重要的产业工人，如铁路、海员、矿工为中心，集中力量对各个组织加以切实整顿。指出：应“以奉天、直隶、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包括在内）为主要区域。”《议决案》还制定了整顿这三个产业工人组织的具体步骤和计划。这就正确解决了铁路、煤矿工人运动在低潮形势下，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的重大策略问题，并为铁路、煤矿工人运动规定了组织整顿的方针任务。

事实上，安源路矿，在刘少奇的正确指导下，对各个组织的整顿问题，在 1923 年 8 月间就开始进行了。例如刘少奇把监察队改为纠察团，给它明确的任务，扩大组织，加强俱乐部主任团对纠察团的领导。刘少奇还通过党的组织，派党员到矿警队中去工作，以维护矿工利益。特别是在俱乐部中进一步健全代表会议制度。不仅对俱乐部的主要领导机构进行了改选，对俱乐部的各级代表及负责人也都进行了改选。

刘少奇还在他所写的《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中，对俱乐部的将来问题提出了三项要做的具体工作：（一）努力建设与整顿内部，以稳固并扩大安源团体的组织；（二）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三）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水平并训练工人做事的能力。

刘少奇在 10 月与俱乐部文书股长李求实一起撰写的《俱乐部组织概况》一文中特别强调，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和军队一般，才能完成它的使命，才能达到它真实意义的目的，即使它成为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使它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的作战机关——营垒，使它能够去加深工人的“阶级觉悟，训育工人抵抗的能力与产业管理的知识”。文章认为，通过一年的实践，深感到俱乐部所采取的组织原则是对的。它说：考察世界各国完善的工会组织法，都有两点共同原则：（一）由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二）采用民主的集权制。俄国工会的“可罗波”，法国工团的“新提加”，都是工会中极小的基本组织。工会是一种极大的群众组织，若无此种极小的基本组织深入群众内部，则必无法指挥群众的行动。群众的行动只是盲目的，极无系统的，而且群众运动的热度是不能持久的。若无此种小的基本组织，则运动过后，群众气冷，即成一盘散沙，无法使之维持永久。又当资本家压力极重不能自由集会的时候，必须此种极小的基本组织来作秘密的运动，否则工会一经封闭，群众的团结也必随之而涣散，再无法收拾了。所以此种小的基本组织，于工会的生命及其前途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工会组织采用民主的集权制，在历史上实有很多的事实告诉我们了。我们只有采用资本阶级的组织法——民主的集权制——极严密地组织自己的团体，才能与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厮拼，才能有战胜的一日。

由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是以极严密的组织法组织起来的，它就能按形

势的变化进退自如，一旦情况许可，它就要把“弯弓待发”的箭射出去。

到 1924 年，工人运动的形势渐渐改观。1923 年底，李大钊抵广州，帮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改组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1924 年 1 月，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共产党人起草的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奠定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宣言强调指出：国民革命必须依靠全国农工的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在大会通过的政纲中明确提出制定劳动法、改良劳动者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等的内容。在国民党的二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三名是中共党员，即李大钊、谭平山和于树德等；在十七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有七名是中共党员，即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林伯渠、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等。为了开展工人运动，国民党各级党部设立工人部，大多由共产党员领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可以公开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的气候和便利条件，促进了工人运动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到 1924 年 10 月，形势进一步转好。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翻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皖系军阀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冯玉祥将所部改为国民军，进驻察哈尔、河北、河南等省，提出“爱国爱民，民主自由”口号，表示倾向革命，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业。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利用时机，通过冯玉祥国民军关系，救出“二七”以来被捕工人领袖，使全国工人运动走向复兴。

在此形势下，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更得以持续高涨。 1924 年底至 1925 年初，刘少奇领导安源煤矿工人，进行了要求矿局发清拖欠工资、反对矿局取消年终夹薪的斗争。

由于汉冶萍公司的管理不善，其生产和财务状况日趋恶化，到 1924 年濒临破产边缘。惶急的安源煤矿当局，不从发展生产的根本问题上找出路，竟想把它的经济危机转嫁到广大工人头上。他们从 1924 年 7 月起，开始拖欠工人工资，直到当年 12 月，问题仍然不得解决。情况如当时长沙《大公报》报道：“自本年江浙战争发生后，萍矿工食即因汇兑不通，停欠未发，至今已有五、六月未发过全月工食，纵发亦不过每人给矿票一、二元。因此一般工人生活异常痛苦，枵腹时虞。且矿票较光洋每元须低水一、二百文，工人工食受此钱水损失，亦复不少。”[①]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工人俱乐部多次向矿局交涉，组织工人向矿局索取拖欠的工资。

矿局也曾答应在 1924 年 12 月 29 日先发工资半月，但到时又没有实现诺言。处于极端生活困苦中的工人再也不能忍耐。 12 月 30 日，部分工人趁矿长召集各工作处负责人开会机会，围住会场，务求真正解决。不多久，聚集起来的工人增至一两千人，情势汹汹。矿长舒修泰为解燃眉，应承在 12 月 31 日一定给每个工人先发矿票三元，明年 1 月 5 日再筹发半个月的欠资。

拿着了三元矿票，工人们刚刚平静。可到了 1 月 5 日，矿局依然说话不算数，而且表现得更加无理，不但不发答应的半个月工资之数，还声明因公司亏损严重，要取消原来矿局与俱乐部签订的十三条协约中的关于年终发夹薪的规定，共计款项约五万元。对于矿局的这种无理决定，工人们认为这是

[①]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43 页。

矿局蓄意破坏条约，欺人太甚。于是四处大哗，群情激愤，个个摩拳擦掌，“大有暴动之势”。[①]

这时候，刘少奇因工作需要，就要调离安源。这样，俱乐部总主任由陆沉担任，窿外主任由黄静源担任，路局主任和窿内主任仍是朱少连和朱锦堂。面对矿局置广大工人于饥寒交迫而不顾，屡次食言，根本不讲信用的行径，刘少奇同俱乐部的几个主任商量后，决定暂不离开安源，继续领导工人斗争，不获胜利不罢休。

为了争取社会舆论和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1 月 7 日，俱乐部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揭露矿局拖欠工人工资和要取消年终夹薪的恶劣做法，安源煤矿工人已因此而群起斗争，非达到目的不止，请求各界给予正义声援。同时呈文提请赣西镇守使和萍乡县政府转令矿局方面照发所欠工资和年终夹薪，“以免酿起风潮”。当晚，刘少奇召集各工作处工人十代表会议，决定先以“和平态度向矿局围索”[②]，进行适当斗争。次日，俱乐部继而向社会发出《请看萍矿取消工人年终夹饷之理由》和《萍矿工人同萍矿算算帐》的传单。传单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笔法，逐条驳斥了矿局关于要取消年终夹薪的所谓“理由”，深切地陈述了工人的痛苦生活，揭露了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剥削工人的非常手段。这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反响。

1 月 9 日，矿局被迫同意在阴历年内发给年终夹薪，并委托绅商正式向工人俱乐部答复，暂时平息了事态。

不料矿局方面又是故伎重演，搞的是缓兵之计。当俱乐部代表于 1 月 11 日要求矿局必须在 1 月 15 日发给工人年终夹薪半个月时，矿局方面竟又变卦，支吾其词，推说前日绅商答复，年内尽先发给年终夹薪一事，他们并不知道，实是无稽之谈。这样的事必须等待公司的回电，公司说有则有，说无则无。俱乐部代表一听这等说法，当即表示极大愤慨，严厉斥责矿局方面未免欺人太甚。刘少奇等迅速作出反应，认为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即在 1925 年 1 月 15 日，果断发出罢工号召。

当天，各处工作多半停业。三四千工人将矿长、矿师、公事房团团围住，痛斥矿局不守信用，现非得要矿局于即日将夹薪发清不可。工人俱乐部遣人四出张贴布告、传单，并派纠察团把守各进出口，凡是没有俱乐部部员证的，都不得随便通行，“交通一时为之断绝”。安源各处，只见工人纠察团的巡逻，全矿职员都被工人所包围，消息不能互通。

矿长舒修泰内外交困、黔驴技穷，狼狈不堪。这时，一批矿警前来保护矿长，却使事情更加闹糟。工人们一齐大哗，声言“你们军警如来干涉我们工人要饷，你们打死我们的人，我们就连同全矿大小职员死在一块”。

舒修泰万般无奈，垂头丧气，神形俱疲，最后只好同意发清全部欠资和年终夹薪。舒修泰等在 1 月 20 日致汉冶萍公司经理的电文中，汇报当时情景说：“日前数千工人围索欠薪加饷，两昼一夜，……加以唾骂。泰等忍辱受饿，一步未离。稍一不慎，巨祸立见。嗣由各商罗掘数万发给，始得解围。”[①]

这次罢工的胜利，不仅保卫了 1922 年 9 月罢工的胜利成果，不许矿局方

[①]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44、434 页。

[②]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44、434 页。

[①]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49 页。

面借故废约，并再次显示了在工人俱乐部领导下的安源工人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这也使临行的刘少奇感到无比欣慰。

四　中国工运领袖

全总领袖

刘少奇胜利地领导了安源工人的年关斗争之后，即按原计划，在 1925 年一、二月间离开安源，赴广州参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和领导工作。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四个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和广东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的。刘少奇是以汉冶萍总工会会长的身份来参加这次领导工作的。会议准备在 1925 年 5 月 1 日召开。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 1922 年 5 月在广州召开。此次大会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国工会办事处）根据中共“一大”的精神，为迎接第一次劳动运动高潮而发起的。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确定党在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建立和健全工会组织，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合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强调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应警惕勿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手中的玩物。为了公开地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中共“一大”开过不多日子，1921 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在上海成立。张特立（即张国焘）任主任。同时在北京建立了北方分部，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分部，在济南建立了山东分部，在广州建立了广东分部，在汉口建立了武汉分部。

1922 年 5 月 1 日，即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主要讨论了工人参加民主革命，成立全国总工会等问题。通过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和“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议案，决定“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实际上表明了它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大会结束后，1922 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往北京，由邓中夏接替主任。在上海也建立了分部。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准备在 1925 年 5 月 1 日召开，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时间整整相隔三年。这次大会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第一次劳动大会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加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讨论今后工人运动的策略、目前进行的具体方针和谋求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以迎接第二次劳动运动高潮的到来。

三年来工人运动的形势，正如邓中夏所说，“不幸（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九个月后，京汉‘二七’惨案发生，而劳动运动为之一落，全国工人阶级几乎全取纯粹的退守态度。随后虽随时因利乘便，企图改守为攻，究因外界的强暴压迫太甚，终未能恢复旧观。”直至 1924 年“北京政变以后，直系军阀势力颠覆，新兴的军阀还在相持之中；帝国主义因政权之变化，而相互间发生冲突的现象。在这时，劳动运动确已进入一个复兴的时期，又有开始第二次高潮的可能。现在上海纱厂罢工、胶济路罢工、北京印刷罢工、武汉人力车夫罢工和烟草工人罢工，以及北方铁路工会之恢复，南方海员新斗争的准备等，都是这第二次高潮潮信的预告。所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集

之不容缓，已是明明白白的不用说了。”[①]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也是受中共“四大”的直接促进。

为了迎接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问题，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要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在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也才能得到胜利。这个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进行斗争，才能避免孤军奋战的局面。大会在通过的《关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当前职工运动已由“二七”惨案后的退守形势转为复兴趋势。党在这种形势底下，应广泛成立工人组织，把职工运动和民族运动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才能得到保证，职工运动才能发展。大会制定了职工运动的具体计划，对矿工运动提出“不能随便放弃”，在大会后“当着手进行”。并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工农部内，设立职工运动委员会。大会首次正式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意义重大，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促进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推动了 1925 年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全国反帝大浪潮。

为了鼓励中国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共中央在 1925 年 4 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前夕，给大会发去贺信。信中说：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宰制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全世界的弱小民族，中国人就是被他们宰制的民族之一。可是帝国主义的末运到了，此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都不约而同的向帝国主义举起反叛之旗，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这个全世界的大运动之一。

“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中，我们须要知道中国的各社会阶级对于这革命的关系是怎样。贩卖国家剥削平民的军阀及大商买办绅士阶级，不用说都是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串通一气，与国民革命力敌的。被压迫而濒于破产的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虽然不满现状而有革命的要求。可是他们的政治观念都是模糊的，他们战斗力也涣散薄弱，因此还不能够加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有明了的政治观念，有集合的战斗力，在国民运动中，能够加敌人以最后致命的打击者，只有工农联合的力量。

“正因为工农阶级有这样的力量，我们的敌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大商买办绅士阶级——欲消灭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首先要消灭中国工人农民的势力；他们不但用政权、法庭、军队、警察，在外面压迫工人农民的势力发展；他们并且要雇用一班工贼，在内部破坏工人农民的团结，阻挠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工人农民同情的援助；他们尤其要严禁工人农民有自己的政党之组织，因为工农联合起来，又有了自己的政党，那便更增加革命运动的力量。

“亲爱的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同志！你们所代表的力量是伟大的，你们所负的责任也是重大的，你们的敌人虽然众多而且强有力，只要你们团结起来不断的奋斗，不但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终于属于你们，全世界工农专政的胜

[①] 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贡献于第二 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原载《中国工人》第 5 期，1925 年 5 月出版，编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版，第 27 页。

利也必属于你们。祝你们团结！祝你们奋斗！”[①]

中共中央的这封贺信，从内容来看，实际也是对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指导信。

1925 年 5 月 1 日，经过刘少奇等紧张的筹备工作，根据党的“四大”的精神，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历时七天，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工人阶级与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三十多个决议案。其中许多是刘少奇执笔起草和主持起草的。这些决议案的主要思想：

（一）强调无产阶级要为自己阶级的目的而参加国民革命即中国的民族革命，是为了要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的压迫，应实现自己的领导和建立工农联盟。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利害关系，可说是天然的同盟者。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 80%，其数量远超过工人数百倍以上，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无产阶级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无产阶级要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二）提出工人阶级政治斗争具体目标，要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和普选等。认为自由是工人的第二生命，是工人阶级所急切需要而不可少的东西，简直和菽粟水火一般。同时又指出，按照各地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反对一切虐待、改善女工童工生活、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取消包工制等的经济斗争目标，仍然不能忽视，因为它反映了当时工人运动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八小时工作制是经济斗争的第一要事。因为每一部分劳动条件的改善，都可增加工人阶级的力量，促进工人为最后的目的而斗争，并促进资本主义的崩溃，及劳动解放的实现。还强调，一个经济斗争，同时也是政治斗争，千万不可专为经济斗争的狭隘意义所囿，而忘记了政治斗争。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绝对的关联，如果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绝对没有解决的可能，必须把经济斗争接连着政治斗争才有意义。

（三）规定工会的阶级性质和组织形式。对于工人的组织问题，指出，资本家是最少数，工人是最大多数，但是我们工人向资本家反抗奋斗，往往是我们工人失败，资本家胜利，固然还有旁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人没有组织，或者组织不好。虽然也有没有组织偶然战胜资本家的，但确系侥幸得来，不足为法；因为虽然有时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会吓得资本家手足无措，不得不退让屈服，但这以之吓“暴出河”的资本家有时或能生效，若以之吓“老精怪”的资本家那就碰上钉子要倒霉了。上海洋资本家开设的工厂，所有罢工，十次有九次失败，就是因此。所以我们人数虽众，我们如不紧紧的组织起来，组织得像军队一样，那末向资本家作战，是没有用处的。所以组织问题是我们当前的第一个重要问题。还指出，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工作的内容是阶级的，工会的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工会组织必须有坚决的阶级行动。应使所有的工人加入工会，但雇主、高等职员及包工

[①] 原载《向导周报》第 112 期，1925 年 4 月 26 日出版，编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版，第 54 页。

头等与工人利益相反的分子不能入会。工会的组织形式，由于中国土地广阔，各处经济发达的情形不一样，各省政治的环境不一致，很难有统一的工会组织形式。根据中国情况，工会的组织形式可以有两种：一是产业工会。像铁路、海员、矿山、纺织及其他新式产业中，都应绝对地采取这样的产业组织。这种工会的好处，在于每个产业机关都是整个的奋斗单位，一旦发生劳资冲突，便有很快的坚决行动。二是职业工会。它是按照工人的职业组织的。像小铁矿厂、理发店、裁缝店、泥水作等小工厂及手工业，都可采取这种形式。至于行会组织，务要设法使它改进到新式工会的形式。因为行会组织只会将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分裂和消耗。

（四）提出无产阶级应进行国际联合的必要，主张加入赤色职工国际。

（五）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

（六）铲除工贼等。[①]

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与苏兆征、廖仲恺、邓培、王一飞等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在大会前的预备会上，刘少奇代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处，简要报告了会议报到人数及所代表的团体、经费情况、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的安排等，并提出，为便利大会召开，应分区推出代表，组成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5 月 3 日，他又代表劳动大会筹备处，报告了筹备处成立经过情形以及经费的筹措办法、支出概数等。同日，刘少奇与苏兆征、邓培等十二人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席名义致电赤色职工国际，说：“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代表共二百八十五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于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正式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参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5 月 5 日，刘少奇又作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议案》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根据时代特点，对中国民族革命中各阶级的地位所作出的重要分析，与毛泽东所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主要观点相合。

5 月 7 日，中国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刘少奇和林伟民、苏兆征、邓中夏等二十五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同日，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林伟民被选为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等被选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当总工会的章程通过和执行委员会选出时，“全国总工会万岁”，“工人阶级大团结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大会宣言号召：“全国工人须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一致团结，提携着贫农，联合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奋斗。”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工人运动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大意义。“这次大会，对于中国革命与工人阶级解放的出路有深刻的认识：在政治上，极力主张参加国民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为解放的初步，并主张与农民有亲密的联合。同时在经济上，规定每星期五十四小时工作制，及以物价为比例的工资制，主张改善童工女工之劳动条件。”[①]大会的重大影响，在大会闭幕后不久便表现出来，席卷全国的革命大风暴“五卅”运动爆发。

中华全国总工会，会所设在广州，并决定在上海设办事处。刘少奇等认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加强对这里工人运动的发动、组织和领导，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会闭幕不久，刘少奇即

[①] 参见《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文件》和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党史资料》，1954 年第 4 期第 8 页。

赴上海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

从此，刘少奇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在“五卅运动”中

1925年5月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群众为中坚的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一个伟大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一可歌可泣的斗争中，牺牲了许多生命，涌现了不少英雄烈士，并唤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觉悟。中国工人阶级，也在这一前仆后继、再接再厉的斗争中，丰富了斗争经验，扩大了自己的组织力量，增强了自身的阶级意识和自信心。“五卅运动”的影响，由上海而至全国，由城市而及乡村。

这一运动的前奏，起于该年2月在刘华领导下发生的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直接的导火线是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方为了取缔工会、镇压罢工，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上海日本纱厂两万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上海文治大学、上海大学学生起来援助工人的反帝斗争。租界巡捕逮捕学生数人。帝国主义者竟欲妄加“扰乱治安”的罪名，准备在5月30日对被捕学生进行公开审讯。同时，帝国主义者又决定6月2日通过工部局提出损害中国主权、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所谓“四提案”，即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及欺骗社会舆论的所谓取缔童工法案，这就更加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极大愤怒。热烈的爱国情感和行动到处在迸发。

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已具有更尖锐的政治性质，应把这一斗争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并使工人阶级成为反帝斗争的中坚力量，决定发动群众于30日到上海租界进行反帝示威。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二千多人，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和进行讲演，揭露顾正红被杀、学生被捕情况和“四提案”的殖民性质，提出“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爱国斗争口号。

刘少奇是“五卅运动”爆发前夕来到上海的，他刚到就马上参加和领导了“五卅运动”，利用一切方法去动员群众，拿被打伤者的血衣及被打死的工人照片，到一些学校去做鼓动工作。单在闸北区，刘少奇就组织了三十多个讲演队，他还亲自到北站附近的广场上向集合的学生分配任务。

英国巡捕对学生大肆逮捕，仅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被关押的学生就有一百多人。近万名愤怒群众，聚集老闸捕房门口要求放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丧心病狂的英国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向徒手的群众开枪围捕，当场打死爱国学生五人、爱国市民十一人，重伤十五人，逮捕五十三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把斗争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各阶层人民中去，并号召上海人民举行“三罢”斗争，罢工、罢课、罢市。

31日晚，在蔡和森、瞿秋白、刘少奇、李立三、刘华等领导下，上海有组织的二十多万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选举李立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科主任（掌管秘书、庶务等事）。6月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发表宣言和告全体工友书，宣布要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而举行总同盟罢工。不仅工人，上海的学生和商人，也热烈响应这一号召。

中国共产党也于6月5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

大屠杀告全国民众》，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敢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要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坚持到底的来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斗争；务使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统治不断的动摇，务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而在这个斗争中务必提高并普遍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与组织，成为各阶级分别的与联合的民众政治势力。”这一号召，也直接地有力地推动了上海的反帝浪潮。

从 6 月 1 日开始，到 6 月 18 日，在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中，罢工人数达二十多万。参加罢工的绝大多数是英、日帝国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包括电灯、电话、电车、自来水、纱厂、船厂、印刷厂、洋行、海员、码头工人，以至清道夫。工人阶级的大罢工，推动了上海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反帝斗争。五万多学生参加了罢课，绝大部分商人投入罢布，甚至公共租界的华捕也有半数举行罢岗。刘少奇曾对当时的情况有过这样描述：“此时上海工厂无人做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同时上海学生亦一律罢课，即各教会学校也都加入。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①]

为把反帝运动不仅在上海很快推起来，并迅速扩展到全国去，6 月 1 日晚，中共中央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全市反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实行指挥和各种联络工作。

6 月 7 日，上海总工会即出面号召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成立以工人为主体，联合各界反帝力量的“工商学联合会”。并提出与帝国主义作交涉的十七项条件，其主要内容是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英国驻扎中国的海陆军，中国人在租界内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中国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的自由，要求惩凶、赔款、道歉，还有撤销“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四提案各项。

6 月 11 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以实现十七项条件为主要内容的市民反帝大会。刘少奇组织并参加了这次大会。

“东山崩裂，洛钟响应”。刘少奇等领导的“五卅运动”，推动了全国反帝运动的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从 6 月 2 日起，到 8 月间，北京、天津、唐山、沈阳、哈尔滨、安东、开封、郑州、焦作、济南、青岛、安庆、芜湖、南京、镇江、杭州、宁波、福州、厦门、武汉、长沙、水口山、南昌、九江、广州、汕头、江门、香港、重庆、成都，以至山西、陕西、绥远、云南、广西等地，先后约有一千七百多万人民群众汇入反帝洪流，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和游行示威。镇江、唐山、郑州还召开了数万人的大会；南京、长沙召开了十万人的大会；北京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五万人，第二次二十五万人，第三次达三十万人。群众性的抵制英货、日货运动遍及各地，“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军队”、“收回租界”等口号深入人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

在指导“五卅”运动中，刘少奇以其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坚持认为，工人罢工须有良好组织，否则一经外来压迫，即自行涣散。他要上海二十万

[①] 刘少奇：《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1926 年 5 月。

罢工工友一定要严密组织起来，不管其他各界的情况如何、行动如何，工人阶级要能独立地坚持罢工到底。

面对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激烈反抗，帝国主义者为了他们的在华统治地位和利益，一方面继续采取武力压迫的政策，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一次又一次的血案；一方面也感到单纯的枪炮政策已不像过去那样灵了，需要改变一点手法，实行诱和压兼施的收买政策，以便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在反帝斗争中软下来、退出来，使中国的军阀与买办阶级尽快出来破坏与压迫群众的这场反帝斗争。帝国主义者的这一手也慢慢地起了作用。

随着“五卅”反帝运动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暴露出它固有的动摇性来，运动愈深入，时间愈长，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就越严重。

面对这种情况，无产阶级怎么办？刘少奇坚持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领导几十万工人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动摇性作了坚决斗争，以免它来影响这场空前未有的反帝大斗争。

当时，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在买办资产阶级分子虞洽卿的左右下，从他们的阶级私利出发，把原来提出的十七项条件降为十三项，删去了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以及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自由等重要反帝内容。帝国主义一方面提出进行“司法调查”和召开“关税会议”来诱惑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又以停止借款、通汇，停止运输和电力供应相威胁。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提出“友谊协商”、“缩小范围”，对帝国主义表现出妥协。

针对这种情况，李立三和刘少奇等领导上海总工会，于 6 月 13 日召开各工会代表会议，否定了上海总商会的做法，并提出抗议。

6 月 19 日，总商会又作出单独停止罢市，要在 6 月下旬实现开市的决议。民族资产阶级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分子接受了这一意见。“五卅”运动中建立起来反帝爱国的联合统一战线，开始遭到破坏。

李立三、刘少奇领导上海的工人进一步开展了反对总商会单独开市的斗争。6 月 26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上海总工会代表会议，提出依靠自己力量，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继续坚持反帝斗争的一系列问题，要求大会进行讨论。大会最后作出了商界开市，工界决不依赖，工界要坚持斗争到底等的七项决议。

为了使上海工人的罢工得到国际方面的支持，刘少奇于 6 月 23 日致电赤色职工国际及苏、捷、英、法、日等国的三十六个工人团体，呼吁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并与李立三一起于 6 月 26 日致电英国工团，表示欢迎派人来沪调查“五卅”惨案真相。8 月 1 日，他在接待全俄职业联合会代表的讲话中，一方面表示欢迎他们的到来，一方面向他们介绍说，这次运动，实际是为谋求民族解放的运动，参加者有商人、学生、工人，尤以工人为主力军。

刘少奇在领导“五卅运动”中，不仅有坚定的立场，而且注意斗争的灵活性。当奉系军阀进入上海镇压民众运动的时候，开始因慑于当时声势浩大的反帝浪潮，也曾不得不故作姿态，捐款给上海学生联合会，表示是来防御外敌的，接着就逐渐露出马脚，他们从 7 月下旬起，逐个封闭了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等民众团体。上海数十万工人的罢工苦斗，不仅因支持两个月以上而日益感到救济金的缺乏，而且日益受奉系军阀的各方面沉重摧残而很难支持下去。而且在资产阶级停止罢市后不久，接着便是暑期学生纷纷离校，回家度假，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力量大为减弱，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势日渐不利。鉴于这种情况。8 月上旬，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革命实力，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有组织、有条件地复工的指示。刘少奇在领导上海总工会的工作中积极贯彻了中央的这一指示。上海总工会当即发表宣言，正式提出九条复工条件：（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堂；（二）租界内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三）租界华人须与外国人有同等参政权利；（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五）工人一体复工，不得开除罢工工人；（六）发给罢工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工资 50%；（七）增加工资 65%，工资一律发大洋；（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的工作条件；（九）给死伤的学生和工人以赔偿。

在 8 月下旬到 9 月中旬期间，刘少奇各处奔走，分别召开华商纱厂、日商纱厂、英商纱厂的工人代表会议，努力做关于复工的耐心说服教育工作，反复阐述实行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以及领导者不仅要有革命的坚定性，还必须学会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转变党的斗争策略。所以要这样做，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继续进行以后的斗争。他还针对工人中有对复工条件提得过高的问题，指出，与其提出厉害的条件，不得解决，受到各方面的压迫而失败，倒不如先提出较小的条件以得胜利。刘少奇还同各厂的工人代表一起，仔细地研究了每一个工厂的复工条件。经过刘少奇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在上海总工会的统率和指挥下，中共中央向上海工人阶级提出的有组织、有条件复工的要求，基本胜利实现。事实证明，这样做有利于保存革命实力、巩固已有胜利，有利于为进行长期斗争作必要准备。

在“五卅运动”中，由于刘少奇等的杰出领导，上海总工会起到了重大作用，对此，邓中夏曾作了这样的记载：“上海工人在此次运动中，组织了一个上海总工会；河南工人组织河南全省总工会；济南工人组织济南总工会；天津工人组织天津总工会；就是历为帝王之都专制压迫成为惯性的北京工人也组织了北京总工会。这些地方的总组织，从前都没有，都是在‘五卅’后才产生的。其中尤以上海总工会为最有成绩。上海从前招牌工会倒不下二三十，实际上有工人群众的只有一个海员工会，一个印刷工会，五个纱厂工会，两三个地方主义的联合会，和一个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南洋职工同志会与资本家合组，严格说起来，算不得纯正的工会。那时上海有组织的工人不过二万人。‘五卅’后，工会增加至七十余个，有组织工人实数增加至二十万余人，同性质的产业工会还组织联合会，如纱厂总工会、铁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之类。这些工会统统在上海总工会统率和指导之下。”[①]正因为这样，敌人对上海总工会就特别地记恨。

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和反革命的两股势力的较量不可能通过“一决雌雄”立分胜负，何况当时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白色恐怖开始笼罩上海，反动派加紧了对上海总工会的种种破坏。他们不惜运用流氓手段，把罪恶的魔爪直接伸向上海总工会。

8 月 12 日，工贼周仲华纠集打手一百多人，携带手枪、铁棒等凶器，冲进上海总工会大打出手，企图突然袭击李立三、刘少奇等总工会负责人，把在场的工作干部打伤了 8 人。

敌人的可耻行径，吓不住刘少奇等，在稍事整理后，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于次日都照常在总工会办公。8 月 24 日，刘少奇应淞沪戒严司令部邀请，前

[①] 邓中夏：《“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原载《人民周刊》第 1 期、第 3 期，1926 年 2 月 7 日、2 月 24 日出版；编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往戒严司令部，谈判工人罢工及流氓捣毁上海总工会问题。并陪同上海地方检察厅派出的检察官，勘查上海总工会被毁情况，要求检察厅依法究办。工人群众对刘少奇等的这种公而忘私的大无畏精神，十分感动，深受教育，各工会组织都派来代表进行慰问。

9 月 7 日，英国巡捕又打伤了在爱多亚路示威游行的工人。这一天是辛丑条约二十四周年国耻纪念日。它因“五卅”反帝斗争的影响而更加敏感，使中国人民深切地感觉到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残暴侵略。这一天，虽然组织者曾因故临时变更行动日期，但仍然有“不期而会”者二十多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上海的工人阶级，更在其中表现出了足以使敌人栗栗危惧的力量和团结。所以，灭绝人性的帝国主义者，竟又不顾一切地采取凶残的武力手段。

刘少奇即于第二天主持上海总工会所属各工会代表大会，报告了英帝国主义继续逞凶施暴的犯罪事实。会议决定：由上海总工会派代表与社会各人民团体组织联络，请求一致援助；由上海总工会联合各人民团体，派代表向官厅请愿，要求提出严重交涉；坚持并争取扩大英商工厂的罢工，不达胜利目的不止；所有已复工的工友，每人每月捐出一天的工资，帮助英商工厂的罢工工友。

9 月 10 日，刘少奇又主持召开英商工厂工人代表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9 月 7 日英国巡捕又在爱多亚路枪杀我工人，因此，尽管华商工厂和日商工厂的工人都已复工，英商工厂的工人罢工一定还要坚持下去。

“九七”事件以后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国的统治阶级也就靠着帝国主义的淫威来加紧压迫革命，军阀官厅禁止一切集会，禁止罢工，解散工会，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使得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斗争运动在上海受到严重的挫折。9 月 18 日，淞沪戒严司令部及淞沪警察厅，奉北京政府（奉系军阀政府）命令，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逮捕总工会职员刘贯之、杨剑虹，通缉总工会领导人。并限令上海总工会所属一百二十多个分会，即日自行解散。

这时刘少奇又领导产业工会进行了反封闭斗争。上海总工会为此致电北京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及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指出，上海总工会是上海二十万爱国工人的组织，成立已经四个月，参加爱国运动，维持罢工秩序，严守法律，绝无轨外行动。现当外交垂危，正赖民气为后盾，可上海地方当局的长官们，竟无端加以摧残，让二十万工人失去维系，给地方治安留下隐忧，且予爱国运动以重大打击，使外强得以乘机施逞。因而要求主持公道，予以实力援助。刘少奇还召集秘密会议，讨论了对于上海总工会被封，刘贯之、杨剑虹被捕及工人被开除等事的抗议办法。

不停顿的连续战斗生活，严重损害了刘少奇的健康。在上海总工会没有被封闭前，刘少奇早已积劳成疾，诸病缠身。上海总工会被封后，他为此四处奔走，抱病工作。还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种事情。焦烦的事务，使他日夜不得休息，病势日益加重。 1925 年 11 月，迫不得已，由何宝珍护送回湘休养。

要暂时离开自己曾经日夜战斗的熟悉地方，刘少奇不由地对伟大的上海工人阶级和对孕育工人阶级巨大力量的上海，产生出恋恋之念，并对上海的反帝爱国斗争运动的前途怀着深深的担忧和希望，交织参半，思绪万千。

雄威不可犯

刘少奇和何宝珍回到湖南后，住在长沙北门潮宗街文化书社党的秘密联络点。

哪知来到长沙，如进虎穴，即被湖南反动当局的鹰犬盯上。12 月 16 日，刘少奇被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赵恒惕的省会戒严司令部的密缉队在文化书社二楼书房逮捕，收押盐运街盐道衙门监狱。

刘少奇被捕后，湖南党组织立即进行营救。为防止敌人马上暗害，和尽快动员社会舆论起来声援，何叔衡、萧述凡等，首先想办法将刘少奇被捕的消息向社会上公开。刘少奇被捕第二天，长沙的《大公报》就在报端披露道：“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患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昨日下午一时，刘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名，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知。”“闻刘系宁乡人，曾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年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中之领袖云。”这就使赵恒惕不可能突然加害刘少奇。

接着，全国许多报刊和省内外群众团体，纷纷表态和致函、致电湖南省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刘少奇。如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出版的《工人之路特号》，在 1925 年 12 月 25 日第 182 期上发表消息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在第二次劳动大会后，即回上海组织上海办事处。五卅惨案发生，刘君日夕奔走，尽力尤多。近因积劳成疾，回原籍湖南养病，不知如何被赵恒惕忽派人加以拘捕。现上海办事处已来电乞救。”全港罢工委员会还发表通电说：“愤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同志，自五卅惨案发生以来，本其爱国热忱，四出运动罢工，……借以唤醒国人之觉悟，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奔走数月，积劳成疾，近返湖南养病，竟被万恶军阀赵恒惕扣留”，“深望各界同胞一致奋起，实力援助，敝会同人愿为后盾，务须达到恢复刘同志之自由为目的。”通电载于 1926 年 1 月 20 日《工人之路特号》的第 207 期上。

中华全国总工会也驰电赵恒惕，并在《工人之路》等刊物上公布电文说：“长沙赵省长鉴：敝会副委员长少奇君，此次回湘养病，闻被贵处误加拘捕，乞即查明释放。”

由于刘少奇是跨党的国民党员，我党还利用国民党出面营救。1926 年 1 月 1 日至 19 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后即致电赵恒惕说：“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刘少奇同志，因回湘养病，突被先生饬戒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劳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逮捕。兹经本大会一致议决，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查照。”该电于 1926 年 1 月 30 日《工人之路特号》第 217 期也公开刊出，语气具有明显责备。

这时，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与中国济难会湖南省总会也互相联合，召集了湖南的各群众团体的代表会议，决定发出救援刘少奇的呼吁书，并联合各团体向省政府保释刘少奇。刘少奇的母校宁乡玉潭学校的校友联合会以及宁乡全县的各公法团体，都联名来保释刘少奇。一时间，赵恒惕真成了众矢之的，有一天他竟收到四十多份向他提出抗议、谴责和要求立即释放刘少奇的函电。刘少奇的英名却随之四播而更加响了。

根据党的指示，何宝珍也加紧四出奔走，上下营救。她从花明楼老家找

来刘少奇的二哥刘云庭。因刘云庭曾是湘军中的一名军官，在长沙有一些关系。何宝珍和刘云庭，同何叔衡、萧述凡、姜梦周等（何、萧、姜等既都是共产党员，又都是宁乡县人）利用宁乡关系，进行各方面的疏通，商请了宁乡籍的省参议员朱剑凡、胡良翰，省参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等宁乡的头面人物，出面来保释刘少奇。何宝珍和刘云庭，还找了宁乡籍的两个上层实力人物。一个是据说与刘家还有一点亲戚关系的老同盟会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湖南籍国会议员周震麟。周与赵恒惕也有点转转弯弯的亲戚关系，即派了亲侄子周学存面送自己的亲笔信函，向赵恒惕说情。另一个是身任师长的鲁涤平，也许是刘少奇母亲（鲁氏）家的关系，据说与刘家也有戚谊，而刘云庭是他的旧部，还有上下级情分，鲁因此也拍了电报给赵恒惕转圈。何宝珍还请了刘少奇的少年挚友洪赓飏出来斡旋。洪的祖、父辈都是清代的高级官吏，他家的门生故吏遍及三湘。洪本人又曾留学东瀛，从日本回国后又一直宦途顺当，任过县长和洪江榷税局局长，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洪与赵恒惕家既有世交旧谊，现在又是湖南全省禁烟总局的局长，被称作赵恒惕的“财神爷”，其经管的烟税和罚金，大都提供为赵恒惕的嫡系主力湘军第三师叶开鑫部的费用。所以洪赓飏跟赵恒惕及其得力干将叶开鑫部，都有几分交情。洪在长沙的几家名菜馆，如“萧湘”、“天乐居”等地方，先后设宴招待叶开鑫（湘军第三师师长兼戒严司令部总指挥）、贺耀祖（湘军第二师师长）等宁乡籍实权人物，并给他们各各送上一份厚礼打点。叶、贺等终也以同乡身份，联名上书赵恒惕，为刘少奇交相作保。[①]

事情闹到这般地步，为赵恒惕等始料所不及。专横的赵恒惕慑于舆论的强大压力，碍于各方的面子，不得不于 1926 年 1 月 16 日，批准释放刘少奇，还假惺惺送了一部“四书”，但要刘少奇即速离开湖南。 1926 年 2 月 20 日第 237 期的《工人之路特号》对此曾报道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前因养病回湖南，被军阀赵恒惕无端捕去，加以囚禁，全国各工会闻讯之下，纷纷电赵恒惕请即释放刘君，湘赵因慑于群众力量，遂（于）元月十六释放刘君。”对于送“四书”一事， 1926 年 2 月 29 日第 246 期《工人之路特号》的报道中讽刺说，这是赵恒惕“最滑稽”的事情。

赵恒惕做出这样的反反复复滑稽事，实际上是他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日子并不好过的表现。赵恒惕的根底是谭延闿。谭延闿集湖南督军、湘军总司令、湖南省省长于一身的时候，赵恒惕是谭手下的湘军总指挥， 1920 年 6 月间，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成功地发动了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把盘据湖南而深为湖南人民不满的皖系军阀张敬尧赶走了。于是一度失意的官僚政客谭延闿再度上浮，湖南即完全落入本省军阀谭延闿和赵恒惕的统治之下。但是驱张以后，湖南的军事实力已操纵在湘军总指挥赵恒惕手里。赵后来便利用反谭势力以自重，把谭挤走，继任了湘军总司令和湖南省长之职。赵还利用湖南人民渴望脱离南北军阀的纷争，保持一个相对安定的心理，接过谭延闿的“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以“地方自治”为名，对南北两方保持中立，实际实行首鼠两端的政策，并以此巩固自己的军阀专制。所谓“地方自治”只不过是一种骗局。随着赵恒惕的军阀专制越来越残暴，湖南人民对赵恒惕的统治越来越不能忍耐。赵恒惕逮捕刘少奇，只不过是其

[①] 参见周德民、蒋缇荣：《刘少奇在长沙出狱及“杀人灭口”冤案始末》；载于《湖南党史月刊》1987 年第 7 期。

军阀本性的再次暴露而已，所以也只能使赵恒惕更加丑名远扬，平添湖南人民对他的严重不满。多行不义必自毙。　1926 年初，湖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吴（佩革）驱赵（恒惕）运动。历史发生相像的演变，赵手下的湘军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的唐生智，长久来也据地自雄，这时想利用时机取代赵恒惕，也加入了驱赵行列。所以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实际上已是岌岌可危，他的日子的确屈指可数了。在迫不得已释放刘少奇个把月之后，在倾向国民革命的唐生智逼进长沙的情况下，赵恒惕只好宣布下野，在 3 月 12 日通电辞职。唐生智于 25 日在长沙就代省长职。

刘少奇出狱后，稍事整顿，旋于 1926 年 2 月间到达广州，省港备工会纷纷派出代表前来慰问。3 月 3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了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对刘少奇的到穗表示热烈欢迎。3 月 4 日出版的第 249 期《工人之路特号》报道说：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邓中夏在会上发表欢迎演说，高度评价了刘少奇为工人阶级所进行的英勇斗争。邓中夏指出，刘少奇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奋力最勇敢的一位战士。他以前在湖南帮助工人组织工会，曾率领安源工友罢工，提出条件十三条使资本家屈服，得到胜利。以后还组织了汉冶萍总工会，是全国工会组织最好的工会。去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他是主席之一，极为努力，各种议案多是他起草的。但他身体孱弱，当时已经生病了。大会闭幕后去上海，适逢五卅惨案发生，他和李立三等几位同志领导上海二十多万工友与帝国主义奋斗。我们知道上海地方因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最厉害，工人组织在以前极为幼稚。惨案发生后，他能将幼稚的工人组织强健起来，与帝国主义作强硬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就因为这样，以致积劳成疾，不得已回家调治，到长沙时为赵恒惕所捕。经各方努力，全国人民群众的一致电援，赵军阀知民气不可欺，才把他释放。听了邓中夏热情洋溢的报告，会场上顿时响起一片经久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历史就是这样向刘少奇作出报答的！

在省港大罢工中

在 1926 年 3 月 3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激动不已的刘少奇也讲了话，对工友及各界的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他又对在继续进行中的反帝爱国斗争进行了有力的鼓动。他在分析了国内情况，特别是上海、广州等地工人运动的形势后，着重指出了当时省港大罢工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港英当局要想解决省港罢工问题，必须答应我们工人的一定条件，签订条约；

第二，为了有利于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罢工的工人一定要严守秘密；

第三，我们要打破帝国主义的阴谋，不能让它得逞；

第四，我们工人阶级内部应该团结得像铁一样，那末将来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刘少奇的讲话给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省港大罢工的工人们以强大鼓舞。

刘少奇来到广州后，因林伟民病重，就代理了林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职务。他在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的一项重大任务，便是立即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及广州和各地的工人运动。

省港大罢工是为支援上海的工人运动，为争取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而举行的反帝大罢工。“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立即派苏兆征、邓中夏等去香港，李森、刘尔崧等到广州沙面祖界，分头发动工人罢工以响应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 1925 年 6 月 19 日，香港十万多工人起来罢工。海员、电车、印刷等工人首先发难，洋务、装卸、煤炭工人继起，机器、船坞等工人殿后，前后约十五天时间，完全罢尽。声明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解决“五卅”惨案的十七项条件。并提出自身的要求六项，要香港政府给予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和居住自由。香港当局以宣布戒严、禁止粮食出口、封锁以政府的力量援助香港工人的抗英罢工运动的广东革命政府等办法，来对付香港工人的罢工行动。广大工人群众“激于民族义愤，万死不辞，蜂拥离港”，从火车、轮船、前山、江门、三水河口分道返省去广州，坚决与英帝国主义者作不妥协的斗争。

6 月 23 日，在苏兆征、邓中夏、周恩来、陈延年等的带领下，广州的工人、学生、黄埔学生军等各界，以及广州四郊的农民和一部分从香港来的工人，举行了约十万人的反帝游行大示威。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疯狂的英帝国主义竟开枪射击，甚至还在军舰上发炮轰击，当场死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多人，轻伤不计其数。继“五卅”惨案，不到一个月，帝国主义又在广州制造了沙基惨案。英帝国主义再次犯下的这一罪行，立即把广州和香港两地广大群众的怒火燃烧了起来。香港的罢工人数一下激增到二十五万，并有十二万人陆续回广州。

在这种情势底下，中共两广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为进一步加强省港大罢工的领导，选举产生了罢工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的议事机关和执行机关，苏兆征和邓中夏被选为正副委员长。罢工委员会出版了机关报《工人之路》，举办了工人食堂、宿舍、学校、医院等福利设施，设置了法制局、会审处和两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工人武装纠察队到各港口码头驻防，严密封锁香港，厉行抵制英货，截留出口粮食，扣押走私货物，查处帝国主义走狗。

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为了支持罢工和巩固广东革命局面，宣布对香港实行封锁，同英国经济绝交。罢工和封锁的结果，使香港成为了“臭港”、“饿港”和“死港”，工厂停工，航行停顿，商店停业，学校停课，公用事业瘫痪，一切重要命脉都停止了跳动。邓中夏对它曾作这样生动的具体描写：罢工后，“街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楼居者以纸裹粪，抛掷街中，加以炎日蒸炙，臭气熏天，故群呼香港为‘臭港’。交通既绝，内地肉食蔬菜，无从运至，猪肉（每斤）涨至一元余，鸡蛋（每斤）涨至五角多，牛肉几乎绝迹，街市等于虚设，故又呼香港为‘饿港’。轮船阻滞，船坞停废，商店歇业，银行挤兑，一时社会秩序纷纷大乱，孤悬海中，呼救不至，故香港又变为‘死港’。”[①]这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了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据说，英国在中国的贸易衰落，其每月入口商品仅及平常时候20%。英国一百年来所经营的最繁华的香港几成荒岛。它使伦敦邮报发出哀叹，说“一九二五年英国尊严之堕落，实为中英通商二百年来所未有”[②]

刘少奇来到广州的时候，如火如荼的省港大罢工正处在重要关键时刻。为进一步开展广州、香港的工人运动，夺取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刘少奇以极大精力投入了力谋工人阶级内部团结，有计划、有步骤实现统一香港、广州各工会组织的工作。

刘少奇深知工人大联合的极端重要性。但这又是一件极其复杂和麻烦的事，必须要有顽强的楔而不舍的精神去对待它。刘少奇针对当时广州，香港各工会之间存在着组织涣散、派系林立、各自为政、行动不统一等现象，做了大量细致的组织工作。当时，广州和香港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发展很快，但是由于一些工会领导人对组织统一的工会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同一地区同种工作性质的工人群众，没有能组织在统一的工会里。香港的工会组织，大大小小就有一百多个，分别为工团总会派、华工总会派和无所属派等三大派系所掌握。这些工会，大部分属于行会性质，属于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性质的很少，大都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所操纵。广州的工会组织情况也差不多，大大小小的工会有二百多个，分属于广东总会派、机器工会派和广州工人代表会三大派系。广东总会派和机器工会派是受国民党右派、资本家及其代表控制的，只广州工人代表会是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下的革命工会组织。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发挥和斗争的胜利开展，决定着许多问题的盲目性，和各行其是。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促进各工会组织的联合，凝聚工人阶级的战斗力，统一工人阶级的意志和行动，刘少奇深入细致地调查和研究了广州、香港两地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出现各工会组织不统一的复杂原因，提出了促进工会联合的具体措施和相应办法。他不仅与各派工会的领导人真诚地亲切谈话，同他们讨论问题，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做工作，说明工会组织大联合的重大意义，帮助他们消除狭隘的甚至封建的门户之见和行帮思想，以及各工会组织之间长期积存的误会和隔阂；并主持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工人座谈会，互相交流思想，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引导工人群众加强团结，共同战斗。上上下下地进行苦口婆心的指导，要求工人阶级按照各行业、各系统成立新的产业工会或

[①] 参见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原载《香港罢工概况》，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编，1926年8月出版；编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②] 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

职业工会。在刘少奇的启发、引导、教育和帮助下，广州、香港各行业各系统的工人很快行动起来，重新组织，加紧联合。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街市业工人联合会等等，相继成立。广州的各派系工会组织也逐步按行业、按系统归于统一。

在各派系工会组织初步按产业组织系统实现统一的基础上，刘少奇又加紧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始组织香港和广州工会的领导机关。4 月上旬，刘少奇出席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致词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庆祝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世界革命的高潮中联合一致以取得胜利，你们以后的责任，是应该怎样整理自己的内部，巩固这个战线，延长这个战线于全中国全世界。

刘少奇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召开了香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提出了筹委会的组织法和负责人名单，着手建立香港总工会。香港总工会即于 4 月 15 日宣布成立。刘少奇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全国职工运动的报告。报告指出：

（一）一年来职工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五卅”反帝运动中，三个月内统计全国参加罢工人数达五十万以上。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已日趋发展，在职工运动最盛时期，全国工会会员已达一百万人。

（三）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本有与工人阶级合作的可能，但一旦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时，或要求其经济利益时，资产阶级就马上站到反动地位上去了。

（四）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大会通过了香港总工会统一的决议案，于是香港工会的统一运动初步告成。

4 月下旬，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全国总工会、广东省农民协会等各团体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召开的欢迎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代表的集会，将写着“革命前线大炮台”的光荣旗帜授予香港总工会。

广州的各派工会也于 4 月间成立了统一机构广州工人代表会，有二百多个工会加入进来，有组织的工人近二十万。刘少奇在成立大会上也作了报告。广州的工会统一运动至此也初步告成。另外，广东各县的工会也成立了统一机构。

广州、香港各工会组织的联合统一，壮大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力量和声势，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主力军作用。

在罢工斗争深入进行、工会组织统一运动的基础上，为加强罢工队伍的建设工作，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于 1926 年 4 月共同成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拟出大规模的宣传教育训练计划。先后创办了一所劳动学院、十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八所罢工工人子弟学校、一所劳动妇女学校等，以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培训罢工工人积极分子和工会骨干，以至罢工工人的子弟等。此外，还对罢工工人纠察队专门进行了一系列严密的培训工作。

在劳动学院，邓中夏担任了院长，刘少奇、萧楚女、邓中夏、黄平等担任了教授。第一届录取正取生二百五十六名，备取生四十名，旁听生一百八十名，于 6 月底正式开课。刘少奇在开学典礼上致词说，劳动学院所学的，就是做工会领袖应有的知识。要从中学得许多对敌斗争的战术，应付事变的

办法，能够有把握地去克服困难和争取胜利。他还谈了学习方法，要大家在比较中学，把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同教员的讲解加以对照，以察觉过去的错误和教训，求得今后有用的知识。他希望大家要把劳动学院当作一个大火炉，把自己当作一块铁，投到炉中去锻炼成一个坚强不屈、能担当伟大事业的革命家。

刘少奇在劳动学院专讲《工会组织法》。他力求深入浅出地阐明列宁主义关于工会是一个阶级的组织，训练教育的组织，工人阶级的学校的思想；他循循善诱地逐章逐节讲述工会组织原理和组织方法的一系列问题，常伴以香港、广州各工会的实例和材料佐证，使大家感到亲切易懂。萧楚女讲授《中国政治状况》，邓中夏讲授《省港罢工》，黄平讲授《世界工运》。他们的讲课都很受工人欢迎，《工人之路》当时报道说：劳动学院“教授皆为各界领袖，富于革命理论与经验，如邓中夏先生所授的《省港罢工》，刘少奇先生所授的《工会组织法》，冯菊坡先生所授的《广东工会问题》等课，均为省港工会领袖人才所急需的实际理论。教授时又不辞劳瘁，讲述设问，极其周详。学员听讲兴味非常浓厚。此可见该院成绩如何也！”

刘少奇还很注意在青年、妇女、学生、农民、商民、华侨和外国友人等各界各阶层中做鼓动工作。

1926 年 3 月上旬，他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广州各界群众纪念“三八”妇女节的集会，并在会上讲话。

3 月下旬，他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广东省教育会召开的香港青工大会，并发表讲话。讲话着重揭露帝国主义如何企图瓦解工人的罢工组织，如何涣散工人斗志的阴谋等。

4 月 16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二次筹备会议，会议议决了廖仲恺部长纪念碑案等九项议案。

4 月 19 日，他主持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广东省农会联席会议，会议议决联合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和工农联欢会。

4 月 20 日，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广州工人代表会协商，提议邀请省港罢工委员会、学生会等各界团体，包括不在中共影响下的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共同筹备组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示威游行。

5 月 17 日，他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接待来访的英国前工党议员迈朗，在欢迎词中表示了对迈朗先生必能携带英国工人久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经验来指导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欢迎盛情。

以上这些频繁的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各个方面对罢工斗争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重大支持，使罢工工人深受鼓舞，继续深入地把罢工斗争坚持下去。

正是在刘少奇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省港大罢工得以坚持一年又四个月之久，直到 1926 年 10 月才宣告结束。这是世界无产阶级罢工斗争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成功范例，证明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它的重大作用，正如当时中共中央所估计：“粤港工人罢工的结果，曾经赞助国民党肃清了广东内部的反动势力，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并统一了广东全省。香港对广东的政治和经济侵略势力及其本身的经济地位，都被削弱。罢工工友自身亦已获得最宝贵的奋斗经验，组织的力量因而日见加厚。”[①]这也就无疑地对革命势力的准备北伐奠定了基础。

[①] 《中国共产党致粤港罢工工人书》，载于《向导》第 167 期，1926 年 8 月 15 日出版。

迎接北伐

革命形势在发展，革命阵线的内部矛盾也在发展。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表现为其主要领导人并不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有领导革命的力量。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究竟比工人雄厚，似乎只有资产阶级才是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处处主张向国民党右派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系统总结工人运动经验，以制定无产阶级的、真正合乎实际的革命政策和策略，便成了当务之急。

在 1926 年 4 月里,刘少奇有很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主持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作。

为检阅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奋斗的经验，确定今后行动方针，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刘少奇担任筹委，主持整个筹备工作。

4 月 29 日，刘少奇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预备会议，在会上提出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三项议程：(一) 总结一年来工人运动的经验；(二) 确定工人运动方针；（三）改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刘少奇被推选为大会临时主席兼秘书长，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为更好促进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刘少奇亲自同一些黄色工会的领导人恳谈，争取他们都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委会还拟订了宣传大纲，派出讲演队，到各工会宣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意义。同时邀请各界领袖莅会演说，被邀者有毛泽东等。为大会的召开制造声势，刘少奇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全国职工运动的形势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主要议程，要求他们对大会多多作出重要的宣传报道。

1926 年 5 月 1 日至 12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五百零二人，代表全国六百九十九个工人团体一百二十四万多工会会员（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有工会会员二十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有工会会员五十四万）。其中会员人数在二十万以上的工会有二个，一千至三千的有九十四个，五千到一万的有三十七个，一万至五万的有十六个。代表职业以运输业为最多，其次为食品、纺纱、织造、建筑、煤矿、印刷、手工业等。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还有毛泽东等出席了大会。刘少奇担任大会秘书长。

在大会上，刘少奇作了《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肯定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成绩和意义；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一年来、特别是 1925 年“ 五卅运动 ”以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实践和经验，职工运动的发展和趋势；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所发挥的伟大作用，职工运动已有长足的发展。报告强调，工会为工人群众的经济组织，所以必须公开。现在中国的工会尚不能够得到法律保障和社会承认，中国工人阶级为要发展中国的职工运动，必须积极地公开地开展争取工会条例的运动，即使不能争得颁布，也可藉此引导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一年来的职工运动，固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但其中处处都可看到工人的经济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劳动条件的恶劣，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今后的职工运动的方针，还应加强各种经济斗争，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的利益。

报告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在“五卅运动”中政治态度的比较和分析，雄辩地排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可能性，再次明确地提出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刘少奇首先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指出，中国近代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下，特别黑暗，中国工人阶级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创办工厂、开采矿山、修筑铁路而诞生，它一开始就在经济上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工人工作时间之长、生活待遇之差、劳动条件之恶劣，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工人和农民一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经济地位极其低下。在政治上，工人阶级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工人的行动被严重限制，自由被取消，稍有举动就可能被逮捕和屠杀。反动统治阶级到处制造惨案，随意逮捕和屠杀工人运动的领袖，查封工会，破坏工人运动。各地惨杀均因镇压罢工而起，惨杀结果以工人死伤为最多。一年来，职工运动均被军阀压迫和摧残，尤其在“五卅运动”时，奉直军阀摧残工人阶级更为惨酷。反动统治阶级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政治上压迫工人，在经济上剥削工人，已经使工人阶级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中国工人阶级所处的这种政治、经济地位，表明他们是中国近代社会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阶级之一。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状况，以及以往的工人运动，充分说明了这一历史事实。

刘少奇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对待革命的政治态度。他说，中国工人阶级的这种极其低下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便决定了他们倡导、支持革命，积极参加革命的政治态度。工人阶级生活在贫困之中，所以特别能吃苦耐劳，任何艰苦的斗争，都能够坚持到底；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克服，表现得特别能战斗。同时，工人阶级比较集中，且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因此特别富有组织纪律性，易于形成革命的战斗集体。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些特点，是他们对待革命积极、坚决的政治态度的体现。因此刘少奇进而断言：过去一年的奋斗事实，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永远是群众的敌人，是国民革命的对象；中国资产阶级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可能，但它终究是妥协的、不彻底的，工人阶级应与之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但要防备它骗卖自己；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工人阶级应切实与之建立联合战线，并应促进它左倾，以补救它游移保守的根性，而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以实力援助农民的一切奋斗，并在确定自己的奋斗方式时顾及农民利益。

刘少奇的报告铮铮有理，深入浅出地宣传了党的路线。工农之间天然联盟等的思想，不仅有力地武装了与会的工人干部，也有力地影响了同时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广东农民大会。两会多次举行联席会议，通过工农大联合等决议，并共派代表前往广州国民政府吁请出师北伐。这就为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在工农中间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刘少奇的这些结论和方针，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的，被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证明完全正确。大会一致通过刘少奇的报告，完全赞同他对职工运动的分析和方针，并对中华全国总工会一年来的工作表示满意。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职工运动的总策略、组织问题及其运用的方法、经济斗争的最近目标及其步骤、罢工的战术、工农关系、宣传教育问题、女工童工问题、劳动法大纲（附工会条例）、失业问题、合作社问题等一系

列决议案，为工人阶级制定了明确的政治与经济的战斗纲领。大会的决议和宣言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扩大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团结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与革命军队和学商各界建立联合战线，扩大民族革命势力，督促和援助广东国民政府北伐。

大会向国民政府提交了北伐请愿书，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从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直到鸭绿江边、松花江畔，为迎接和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作好准备，并积极参加北伐战争。后来北伐军出发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所组织的由工人参加的随军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达三千多人。

大会最后选举刘少奇、苏兆征、李立三、邓中夏、林伟民等三十四人为第二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第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与苏兆征、邓中夏、李 立三等八人被选举为常务委员，苏兆征为委员长，刘少奇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部部长，李立三为组织部长，邓中夏为宣传部长。

对于这次大会的意义，当时就有评论说：“ 实际上，这次劳动大会不止于是个例会，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经过自‘ 五卅 ’以来一次长期大战斗后的会议；亦是‘ 五卅运动 ’的长期潮流，即省港罢工尚在激荡不已为‘ 五卅运动，最后砥柱时之会议；亦是帝国主义、军阀、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等联合战线成立，向革命势力进攻时之会议。所以这次大会的成绩，实际是数十万参加战斗的工人阶级，根据经验，结算成绩之总合。中国自有劳动运动以来，这次劳动大会在工人阶级本身的历史里，要算最重要最有意义了。 ”[①]

6 月上旬，广州国民政府召开会议，颁布北伐动员令，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指挥各军。叶挺独立团作北伐先遣队。7 月 1 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发表《北伐宣言》。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国民革命军分三路进军，大举北伐。7 月 12 日，北伐军进入长沙，震湘逼鄂。

但是，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右派以北伐为名，要求工人牺牲利益，停止一切罢工行动，企图限制工人革命。7 月 25 日，刘少奇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发表宣言，声明决不能借口北伐而牺牲工人的利益。指出：“ 国民革命军要得到民众对于北伐的赞助，要巩固国民革命的基础。在北伐的时期，尤其应该拥护人民一切的利益与自由，不能借口于北伐军事行动的便利，来牺牲民众的利益，禁止民众的自由，授反革命派以挑拨和煽动的机会。 ”

8 月 20 日，是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反革命派谋害遇难一周年的日子。刘少奇因此撰写了《廖仲恺先生与工农政策》的悼念文章，发表在 9 月 26 日《工人之路》第 412 期上。廖仲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他积极协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 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任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部长、军需总监等职。 1925 年 8 月 20 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刘少奇所写的悼念文章，一开头便强调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要社会各阶级民众一致来参加，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才可能成功，但中国

[①]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原载于《向导周报》第 155 期，1926 年 5 月 30 日出版；编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工农阶级，是社会各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中之主要力量。担负中国国民革命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一定不要忽视这个主要力量。孙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周年，其所以尚未成功的缘故，就是没有得到占国民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积极参加。要得到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来参加革命，为革命拼命，必定要使这个革命与工农群众发生切身利害关系，真确地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真确地谋得工农的解放。这样，自然可以得到工农群众对于革命的热烈参加，革命成功的希望自然不远。在这里，刘少奇实际上已提出民主革命要实现以工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思想。

刘少奇在文章中还指出，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才有了积极的工农政策，制定了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的政纲，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引导大多数工农参加革命，国民革命的势力，才一天一天发展，一天一天巩固。廖仲恺先生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依照孙中山手定的工农政策，积极帮助工农组织的发展，并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曾得到极大成效，统一了广东，稳固了国民革命的基础。廖仲恺是首先执行工农政策的一个人，极力扶助工农运动的奋进，虽然经过很多困难，受了很多诬蔑，但仍然行之不止。他确实了解中国国民革命的进程及工农群众所占的位置。“廖先生所以伟大，廖先生之所以为国民党的模范党员，实即以此！”

刘少奇的犀利笔锋，与其说是赞扬廖仲恺，毋宁说是在忠告国民党要以廖仲恺为楷模，坚定地执行孙中山所制定的扶助农工的政策，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这对当时正在进行北伐战争的国民政府是一个极重要的督促。

奔赴武汉

北伐战争所面对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支：一是据有河南、湖北、湖南各省和直隶南部的吴佩孚，兵力二十万。二是据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的孙传芳，兵力也有二十万。三是据有东北和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地的张作霖，兵力约三十五万。从兵力来讲，北洋军阀大大超过了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开始时，共八个军，约十万之众。但是由于工农群众的奋起参加革命，使得北伐军如有神助一般，得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推进。在北伐的主要战场两湖方面，进展益加神速。

1926 年 7 月上旬，北伐军攻占株洲、醴陵等地，长沙守敌闻风而逃。拥有几十万会员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工人维持城市秩序，收缴枪械，迎接北伐军，并发动全省工人为北伐军带路、送信、运输、抬担架、送饭和慰劳。在湖南的醴陵、长沙、平江、岳州等地进行的几次战斗中，工农群众直接参加战斗。7 日中旬，北伐军进入长沙。8 月下旬，叶挺独立团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出敌不意，攻占鄂南的两个战略要地，汀泗桥和贺胜桥，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9 月初，北伐军总攻武汉三镇。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响应，铁路工人组织破坏队，牵制敌军行动。湖北的工农群众也不仅为北伐军当向导、传情报、搭桥梁、运给养，而且拿起武器，参加战斗。9 月 6 日北伐军攻克汉阳，7 日占领汉口。吴佩孚仓皇逃往郑州。 10 月 10 日，对武昌总攻，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内，北伐军攻克武昌。

在革命的中心势必要作向北转移的情况下，9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成立了办事处，直接指挥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湖南、河南等省工运工作。办事处主任为李立三，秘书长为刘少奇。10 月，北伐军胜利占领武昌不久，刘少奇就奔赴革命旗帜高扬的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移武汉作准备。

刘少奇来到武汉后，席不暇暖，就深入到各工会和各工厂、矿区，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工人生活状况和工会组织建设。他曾冒着严寒到湖北应城矿区考察，了解到那里的矿工的劳动二十四小时一班，所得工钱却极少。一下矿坑，十天至五六个月不得出来。他看到有好几个月没有出矿洞的四百多矿工，从洞里爬出来时，头发差不多有两寸长，行路是肢着的，那境况着实凄惨可怕。刘少奇说：“从这里看来，可知中国工人的生活是如何的痛苦！”他认定，“我们中国工人在这种生活状况下，这种痛苦是帝国主义所给的，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造成中国的内乱，并屠杀工人，资本家如此地加重工人的剥削。我们为谋改良我们的生活，为谋解除我们的痛苦，唯有向帝国主义进攻，唯有打倒帝国主义”。[①]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矛头直指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受到威胁，他们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极端地仇视，气急败坏地采用各种阴谋手段来进行干涉和破坏。1926 年 11 月 26 日，英帝国主义驻汉口的领事带头起事，纠合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驻汉口的领事，竟对工人的反帝宣传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所谓“抗议”，要求马上取缔武汉的工人运动。

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的态度，要想使中国人民再忍受，那是不可能的了。

[①] 参见 1927 年 5 月 23 日《汉口民国日报》。

在刘少奇、李立三的领导下，武汉各界，于 12 月 26 日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了有二十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强烈抗议英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和干涉中国革命的反动行径，要求武汉国民政府立即收回英租界。大会发表的宣言称：“全国各团体公鉴：英帝国主义者，利用不平等条约在华取得之特殊势力，妨害中国独立运动。最近在上海擅封《民国日报名》，在天津擅封国民党部，逮捕国民党员，尤为勾结反动军阀，干涉中国内政之明证。本日汉口农工商全体市民，一致决议，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祖界。”[①]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刘少奇一到武汉，便立即在这里领导筹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亲自讲授《工会组织法》、《工会经济问题》等课程。中共的许多重要领导人，董必武、恽代英、陈潭秋、李立三、林育南等都在该所担任教职。开办一个月之后，工人运动讲习所便向湖北全省各基层工会输送了两百多名工运干部。

为了开好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总结实践经验，在 1926 年隆冬的日子里，不辞辛苦，在住处汉口友益街尚德里 4 号，接连几个白天和晚上，加紧编写出了《工会代表会》、《工会基本组织》和《工会经济问题》三本理论专著。它们及时而科学地解决了北伐军攻克武汉、南昌等地后，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工人运动高涨形势下的新课题。

单以两湖和江西来看： 1926 年 8 月间北伐军占领湖南全境后，湖南省总工会于 9 月宣告成立。至 11 月底，湖南工会会员由二万增至十四万，工会组织由十二个县发展到四十八个县。至 12 月底，湖南各地工会和产业工会，发展到五十二个，会员近三十三万。湖北省的总工会是在北伐军攻克武昌的那天,即 1926 年 10 月 10 日宣告成立的。武汉工会组织的发展情况更加猛烈。在北伐军光复武汉之前，湖北全省只有十三个工会，约五万会员，到 12 月底便发展到有三百个工会以上，会员达三十万。江西的工人运动的发展虽比不上两湖，但也够快的。 1926 年 11 月，江西省总工会筹备处在南昌成立，随之在南昌成立了七十多个行业工会，发展了四万多会员。到 12 月下旬正式建立江西省总工会时，全省已有二十多个县、市的总工会（筹备处），工会会员发展到十万左右。

时间如此之短，发展如此之快，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正因为这样，难免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出现组织的涣散及基层组织的不健全、不严密，严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混进一些坏人、流氓、工贼等，操纵和把持工会的权力，甚至组织假工会，进行或明或暗的破坏等；以及由于不少工会干部缺乏理论知识和斗争经验，在工人运动中搞自发的严重“左，，倾行动，影响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在工会组织的经费管理上发生贪污浪费而影响工会组织的威信等。

工人运动发展的这种客观进程，迫切要求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以加强工会组织的自身建设，提高工会战斗力；整顿组织，纯洁队伍；克服“左”的倾向，端正行动方向；完善工会经济管理制度，树立工会组织的威信等。

刘少奇的三篇著作，正是这样作出集中指导的。《工会代表会》这篇，是当时加强工会建设的总纲。刘少奇指出：工会是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奋斗；同时又一定要是民主的集中，才能容

[①] 载 1927 年 1 月 10 日《汉口民国日报》。

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致为少数入所包办，变成专制。所谓民主集权制，就是工会的权力集中在大多数人的会议上，不是集中在个人身上，工会的代表会是集中工会一切权力的机关，实行一切权力归于代表会。代表会是任何工会不可缺少的组织。没有代表会，工会就危险，有了代表会，工会就坚固。刘少奇还结合武汉工运情况提出：现在武汉的工会，没有代表会的很多，望各工会赶快按照规定，把代表会组织起来。已有代表会的工会，望切实整理，使代表会真正能够行使职权，按期开会。[①]

《工会基本组织》这篇，是工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刘少奇强调“工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的思想，提出了这样的组织系统：在执行委员会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群众中的支部基本组织。刘少奇认为，工会的群众很多，若无支部等基本组织，而仅有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和工会的招牌，那会员愈多，愈加散漫。这样的工会，是不能奋斗的，执行委员会是无法统率群众的。而有了好的支部和小组，工会的基础就有了保障，工会的行动就非常敏捷便利。[②]

《工会经济问题》这篇，是工会建设中的又一重要内容。刘少奇指出：经费问题，是工会中时常发生的大问题，可以使工会分裂，可以使工会塌台，可以使工会不信仰他们的领袖及工友。所有的工友，尤其是在工会的办事人，应该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求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预防这个问题的发生。同时强调了他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重要观点：领袖是为群众谋利益的，牺牲自己，努力奋斗，是应该的。做事比一切人多，拿钱比一切人少，这才是工人的真正领袖。[③]

刘少奇的这三篇著作，在我国工会建设史上，第一次这样完整、明确地阐述了当时工会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以及组织形式、经费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是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工人运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当时湖北全省的产业工人和职业工人按照上述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组织起来。在湖北省总工会所属下面，各行业有各行业的总工会；各行业总工会所属下面成立若干分会；分会里头还成立若干支部或支会，各支部有支部长，各支会有委员。据次年 6 月的调查统计，单武汉三镇这样成立起来的产业工会和职业工会共有一百六十五个，分会九十三个，支部二千三百九十个，工会会员的总数达三十三万余人。连同各县、市组织的工会合计在内，全省有组织的工人达五十一万余人。他们选出自己的优秀代表组成各级工人代表会，共推选出工人代表四千五百十六人，法定经常代表二百二十人。所以，当时湖北省总工会的组织系统像军队一样，上有司令部，下有营连排等下级组织，层层节制，指挥灵便。

在这里，充分表现了刘少奇的组织才能。

[①] 参见《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改编后题目为《工会工作中的三个问题》。

[②] 参见《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改编后题目为《工会工作中的三个问题》。

[③] 参见《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改编后题目为《工会工作中的三个问题》。

除旧布新

进入 1927 年，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呈现了一片除旧布新的气象，新旧之间的复杂斗争也更趋深刻和白热化。

1 月 1 日，刘少奇出席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会场设在汉口华商总会，到会代表五百八十八人，代表着三百四十一个工会，三十万会员。会议一直开了十日。在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大会提出了“接受过去的斗争经验；审查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巩固工会群众基础”的会议宗旨。大会开得很成功。

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两次报告。1 月 3 日，作了组织问题报告，指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要求各级工会给以正确的指导。报告说，武汉各工会及省总工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工会在群众中建立巩固基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个工会要有一个真正代表工人的代表会，要有很严密的基本组织。现在武汉工会的组织还未十分统一，并有一种零乱的状态。今后应赶快组织各产业总工会；把在产业和职业上性质相近的工会组织合并起来，并使每一个工会都加入到性质相近的总工会中去；对于不合组织法的各工会要加以改组。1 月 9 日，刘少奇作了修改工会章程的报告。

大会在一开头就发表通电，宣布“拥护国民政府，保障北伐胜利，反抗英帝国主义勾结奉军南下，肃清反革命派，巩固农工商学国民革命之联合战线，及统一工会组织，改善工人生活”的主张，领导全省工人群众，联合各界同胞，共同奋斗，以求实现。愿更加努力成为国民革命及阶级解放的前驱。大会通过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湖北省总工会章程》、《组织问题决议案》等 27 个文件和决议案，把发展全省工会组织，统一工会运动、整顿工会组织作为工会的首要任务。其中许多议案是由刘少奇起草的。最后，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等三十五人被选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另有候补执行委员九人；向忠发为省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为外交主任，林育南为宣传主任，项英为组织主任，刘少奇为秘书长。

大会期间，英帝国主义者在武汉制造了“一·三”惨案。刘少奇便又参与领导了这时武汉工人收回汉口英祖界的斗争。

北伐军在长江中游一带的胜利，使得帝国主义者寝食不安，感到了它在华的反动统治和非法权益受到了严重威胁。手伸得最长的老牌英帝国主义者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恫吓并杀害中国人民。1926 年 9 月 5 日，北伐军进击汉阳和汉口时，英舰突然袭击川军杨森部，枪杀士兵一百多名；同时炮击万县城，毁坏民房、商店一千多家，毙伤无辜民众一千多人，制造了“万县惨案”。正与武昌守敌隔江相峙的汉口人民，奋起声援万县、重庆人民的反英斗争。 10 月 5 日，汉口各界万余人集会，追悼“万县惨案”死难同胞，并举行示威游行。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头的这一天，武汉三十余万人举行“双十”节纪念大会，会上再次声讨英帝国主义炮击万县的野蛮罪行。英帝国主义曾经把直系军阀吴佩孚当作自己的工具。在北伐军围攻、占领汉阳、汉口时，它不仅发炮轰击北伐军为敌助战，并以军舰护送企图登上汉阳江岸的北洋军。它还向武昌守敌运送高射炮，援助北洋军阀陈嘉谟、刘玉春来对付北伐军的飞机。 12 月初，英水兵还曾在汉口作登陆之举。12 月 26 日，英国“亚细亚”油轮在黄冈团风江面蓄意肇事，撞沉我“神龟”号油轮，使四百人丧生。当天，武汉三十万人民举行反英大会，对英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

干涉中国革命的种种暴行提出严重抗议。 1927 年元旦，武汉人民既庆祝元旦佳节，又庆祝北代胜利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到武汉，还庆祝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及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武汉充满喜庆气氛。1 月 3 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江汉关码头前面、靠近英租界的广场上举行演讲，英水兵竟出来干涉。人民群众认为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演讲，外国人无权干涉，因此群起沦理，众情忿激，人越聚越多。这时英租界当局竟调动大批水兵上岸弹压、驱赶。英水兵蜂拥冲入人群，野蛮施暴，刺死中国海员和码头工人数人，刺伤其他听讲群众数百人之多，制造了 1927 年新年的第一件惨案——汉口的“一·三”惨案。国人为之震惊。

武汉人民群众更一时大愤，聚集江汉关前，强烈抗议英军的血腥暴行。刘少奇闻变，亲临现场，实地了解情况。

第二天，1 月 4 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出《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提出六项强硬要求：

（一）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

（二）在英租界未收回前，英租界当局应即撤销电网、沙包及各军事上的准备，并绝对不得在租界内干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讲演等自由；

（三）立即撤退在华军舰，以后租界内永远不得有外国武装军警驻扎，由国民政府公安局派警驻扎租界；

（四）赔偿死伤损失；

（五）英政府向我国民政府道歉，并担保以后不得有此等事件发生；

（六）将凶手即移送我国民政府惩办。

为实现上述要求，通电还提出五条相应办法：（一）立即实行抵制英货，对英经济绝交；（二）立即封锁英租界，实行对英总罢工；（三）请政府立即严重交涉，本代表大会率三十万工友誓为后盾；（四）请农工商学联合会，立即召集代表大会及市民大会，群起共同奋斗；（五）全省各工会全体工友，完全听从省总工会命令一致行动。通电严正声称，“为争得生存，为要求自由，本代表大会誓领导我全省有组织之三十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奋斗到底！”

同日，刘少奇代表湖北全省总工会，参加了包括湖北全省总工会、湖北全省农民协会、湖北全省学生联合会等二百多个团体的代表五百多人出席的武汉各界紧急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根据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电内容，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八项要求，并一起决定要在。月 5 日举行追悼死难同胞的反英示威大会。大会还提出了限英政府在七十二小时内应对八项要求作出圆满答复，否则武汉人民将自动封锁英租界、实行对英总罢工。这次紧急会议还要求武汉国民政府，立即收回英租界、收回海关、取消英轮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撤销英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等。紧急会议决定组织武汉市民对英委员会，推定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农工商学联合会等十五个团体的代表为委员，由他们将大会所提的各项要求直接向政府提出。武汉国民政府接到后，表示完全接受，一定“为人民报仇雪耻”。当即，武汉国民政府根据武汉民意，向英驻汉领事馆提出严重交涉，但英帝国主义错误估计形势，蛮横地拒绝了武汉人民所提出的各项要求。武汉人民遏止不住心头的冲天怒火，行动起来了。

联席会议一结束，省总工会即派出数百工人纠察队前往江汉关。刘少奇也不顾一天的疲劳和自己的安危，继往江汉关斗争一线，鼓励工人群众对英

租界当局的斗争。

1 月 5 日，刘少奇冒雨出席了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的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李立三担任了大会的总指挥。大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并正式通过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八项要求。大会上几十万群众情绪激昂，一个个义愤填膺，与英帝国主义誓不两立。大会一结束，以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工人为主体的武汉人民的游行队伍，如决堤大潮，汹涌冲入租界，把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巡捕像水漂垃圾似地驱走了。租界里的沙包、电网及各种军事设施全被一股脑儿摧毁，迫使英水兵退回军舰，一举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霸占有年的英租界。刘少奇即组织工人纠察队一起进入租界，执行巡逻，维持秩序。当日，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了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收租界内一切治安、行政。

英帝国主义者自然很不甘心。1 月 11 日，它的两艘军舰在武穴地区，开足马力并列上行，激起一丈多高浪头，撞沉我货船数百只，溺毙我同胞无数。之后，各帝国主义的军舰逐渐虞集长江，在汉口有英帝国主义的万吨军舰入泊，摆出一副随时有可能侵占临江各重要城市码头的架势。与此同时，它一面资助张作霖南下进攻北伐军，一面继续实行经济封锁。显然，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者是武汉革命政权所面临的主要敌人。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武汉人民的坚决斗争,终于迫使英国政府于 2 月 19 日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正式交回汉口租界。在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的影响下，九江工人和各界革命群众也挫败了英帝国主义的挑衅，英勇地收回了九江英租界，并由武汉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工人阶级和其他各界群众共同努力，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近百年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创举，是极其光辉的一页。

1 月 5 日晚上，为了庆祝武汉工人群众收回英租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在汉口江汉路“普海春”大酒店，举行招待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刘少奇应邀出席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惊动四座的演说。刘少奇指出，党部同志及工人，同站在革命战线上，所以我们要站住立脚点。立脚点是什么？就是解除一切束缚，完成革命。工人革命，有很光荣的历史，现在虽然解除了一部分的束缚，但是还有帝国主义者和未打倒的军阀仍然向我们进攻，我们还要准备头颅和血，往前奋斗。因此，切不要“抑制工人运动，致阻革命力量”。同时，要完成革命，必须先解除农民的束缚。农民的束缚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及一切封建势力的基础。“打破这个基础，农民就得解放，生产力就随之增进，工商利益俱可进步。到此，革命就能成功。我们应当联合力量，共谋此种共同利益。”[1]刘少奇再次呼吁国民党一定要重视工农运动，并充分地表达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的坚强意志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第二天《汉口民国日报》上评论说：“刘氏演说为最切实”。

由于革命重心已转到武汉，长江各省工人运动巨大地影响着时势，为指挥灵便，使工人阶级勇敢地参加革命，表现其伟大的中坚力量，以求“革命的速成与民族的阶级的永远解放”，2 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并发表了迁汉通电。会址设在汉口西成里华园旅社。当时已到武汉的全总执行委员有刘少奇、李立三、项英、朱少连、卞亚雄等十一人。执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员未到齐之前，先由刘少奇、李立三、

---

[1] 参见 1927 年 1 月 6 日《汉口民国日报》。

项英、朱少连和新选的委员申耀、邓少山组成临时全总常委会，负责日常工作。在执委的扩大会议上还讨论并通过了三十多个决议案，其中的《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提出了十六条行动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反对一切资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武装进攻；反对一切与帝国主义及军阀等妥协的倾向，彻底完成国民革命；反对代表封建势力的个人专政及军事独裁，拥护一切民主革命势力的斗争；拥护国民政府继续北伐，肃清一切军阀；拥护农民一切反封建势力及获得土地权的斗争；拥护政府颁布劳动保护法等。

为了欢迎中华全国总工会迁汉，刘少奇还主持起草了湖北省总工会告全体工人书。其中指出，全国总工会随革命环境的需要，而迁到湖北，这是与国民政府迁鄂的意义一样，表现革命的势力，已到中国的中心，革命势力已成为全国的中心势力了。全国总工会改迁到全国的中心地，自然，此后更能用力的指导全国工人运动，尤其亲切的指导我们湖北工人运动。

这时，上海工人为反对英帝国主义派兵来华和反抗北洋军阀的统治，从2月19日起举行了数十万人的总同盟大罢工的斗争,并很快发展为继上年10月武装起义之后的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和第一次起义一样，都因准备不足和时机不当，而被军阀孙传芳和英日帝国主义残酷地镇压了下去。

2月23日，刘少奇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在血花世界总理纪念堂，召开了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的声援上海工人总罢工的大会。大会决定：大会和各工会分别拍电一致声援；各工友每月捐出一部分工资给予援助；各工会和全体工友随时听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命令，准备最后行动。为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出兵干涉中国革命，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举行一小时的全国总罢工，以示抗议。

2月28日上午十时，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声号令下，举行了全国总罢工一小时。响应号召参加罢工者全国有七个省，二百余万工人。革命中心武汉，在罢工的时间里，“全市寂然无人，使人敬慕”[①]。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斗争，达到了空前的境况。

[①] 参见刘少奇：《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1927年6月23日）.载《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

五 逆流勇进

腥风血雨袭来

中国革命的发展，特别是工农革命势力的发展，不仅引起各帝国主义的不安，也引起了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右派的恐慌，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活动日益加紧。他首先在江西悄悄地干下反革命勾当。3 月里一个晴天霹雳：江西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驻扎在赣州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秘密杀害。

陈赞贤原是广东南雄总工会委员长，并兼县党部的常务委员。他是在 1926 年 7 月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刘少奇请命，被派往江西赣州的。陈赞贤是江西人，他对刘少奇说："现在国民政府北伐，江西的工人，没有很多组织，请全国总工会派我回江西，先到赣州去秘密组织。将来一方面在战争上可以帮助国民革命军，一方面在公开后工会就有了基础。"[①]刘少奇听后，对他能舍去现任委员长，去江西秘密工作，很是佩服，当即写了一张委任状给他。

当时，驻守在江西赣南的军阀部队有杨池生、杨如轩、赖世璜三个师。杨池生是赣南镇守使、滇军第一师师长，杨如轩也是滇军师长，他们坐镇赣州。而赖世璜是赣南地方势力，对"两杨"称霸赣南不满。他们相互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陈赞贤抓住赖世璜与"两杨"的矛盾，策动了赖世璜部的起义，赖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1926 年 9 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顺利地攻占了赣州城，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积极地响应了北伐军入赣。

为了加强党对赣州和赣南革命运动的领导， 1926 年 10 月，陈赞贤被任命为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赣南党务及十七县工农运动指导员，同时奉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命，筹建赣州总工会。11 月初，赣州总工会成立，陈赞贤任委员长。赣州工人运动和赣南的革命运动，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当北伐军干 11 月上旬打下南昌，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搬进南昌后，南昌逐渐成为蒋介石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与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革命阵营内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益尖锐和表面化起来。这种风云变幻的形势，使得时刻在寻找着机会的赣州的豪绅地主、反动资产阶级嚣张起来。他们推派代表，向南昌的蒋介石告状，极力诬蔑赣州的工人运动。蒋介石为了打击革命力量，巩固他的反革命地盘，一拍即合，即以这些造谣污蔑的东西为借口，下决心要首先扑灭他坐镇的地方赣州的工人运动。他调新编第一师"绥靖赣南"，并派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头目倪弼（第一师党代表）和 AB 团骨干分子郭巩去赣，勾结当地反革命势力，向革命大举进攻。首先解散了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而以郭巩为县长。接着向工会、农会各革命团体步步进逼，极力摧残工人运动。终于在 1927 年 3 月 6 日晚，将正在赣州总工会开会研究筹备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活动的陈赞贤捕杀，制造了震动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起点，是他反共反人民的第一枪。陈赞贤就是壮烈牺牲在蒋介石血腥屠刀下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

[①]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3 页。

刘少奇听到陈赞贤被杀害的消息，无比震惊、愤慨。中华全国总工会因此发出了“反对赣州驻军枪杀工人领袖”的通电。武汉举行了追悼陈赞贤烈士的四十万人大会。刘少奇沉痛撰文《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登载在1927年3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上，矛头直指蒋介石，进行尖锐抨击。文章说：在蒋总司令坐镇的江西，竟有国民革命军军官枪杀工会委员长之事，“值得国民政府及全国革命民众严重注意”。文章义正辞严要求：“蒋总司令如果没有改变他前此拥护民众利益的主张，断不能纵容一班反动派如此凶横残杀工人领袖，应该采取断然的手段，枪毙凶手，肃清一切反动派，保护真正工人的工会，并从忧抚恤死者。如其不然，那我们不能不怀疑现在总司令所坐镇的江西了。”一叶落而知秋，刘少奇锐眼透骨，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看得很真切。他在文章的结尾说，“全国革命团体及革命民众应该认为江西这事件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大家应一致起来奋斗，督促政府及党部肃清一切反动派，并竭力援助江西的革命民众，务必达到国民革命之完全成功。”[①]

当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在南昌兼任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的郭沫若，对发生这一惨案也十分愤慨，曾以政治部名义报请蒋介石对凶手倪粥“免职查办”。蒋介石虚与委蛇，表面上假作批准，暗底里不让电告赣州执行。郭沫若气愤之极，于3月31日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著名讨蒋檄文，回顾接连发生的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的惨案，断言“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号召“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

内忧和外祸连续地反复袭来。 1927年4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又来寻衅。他们在四名日本水兵于汉口乘坐人力车不付车费，并行凶杀死前来干涉的中国工人的情况下，又调动大批水兵屠杀闻讯赶来示威的群众，制造了“四·三”惨案。

第二天，刘少奇主持召开武汉各界团体的紧急联席会议，并在会上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愤怒揭露了惨案的经过，讲了对遇难人员的安置和对租界采取的办法。会议决定在全市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我同胞的运动。会议提出六点要求，请武汉国民政府进行交涉：（一）即刻撤退日本水兵；（二）收回日租界；（三）凶手交中国法庭严办；（四）日本政府正式向国民政府谢罪，并赔偿死伤损失；（五）日本不得因此事件封锁工厂，开除、辞退工人；（六）日本担保以后不得惨杀中国人民事件发生。

当晚，中华全国总工会又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紧急会议，刘少奇报告了武汉各界团体紧急联席会议开会情况。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工人阶级应即时与各界革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同胞之惨案；服从总工会的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决不上帝国主义者收买之反动派的圈套；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拥护武汉各界团体紧急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六点要求。

4月9日下午，刘少奇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的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号召大家坚持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斗争，反对妥协。

人民反帝、蒋介石却在紧锣密鼓继续搞他的反革命阴谋。赣州“三·六”惨案后，仅仅一个月多一点时间，急不可耐的蒋介石再一次用他自己的行动

[①]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6页。

撕下他革命的假面，应验了刘少奇关于赣州“三·六”惨案只不过“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的清醒预测。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洗上海，把众多的工人和共产党员推入血海。他先是指使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自租界分别四出，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双方发生激战。蒋介石调动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江”为由，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疯狂屠杀工人。拥有二千七百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被解除了武装，死伤三百多人。随后，反动军队又进行大逮捕和大屠杀，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落入蒋介石反动集团手中，如法炮制骇绝人寰的反革命大屠杀。

帝国主义者要破坏中国革命，单从外面使用压力是不够的，他们必然要在革命的阵营里寻找内部的蛀虫，拉出和培养一支反革命势力为他们所利用。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建立了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公然分庭抗礼。至此，蒋介石的真面目彻底暴露。这时候连国民党中的左派也都已把蒋介石的本质看清，称他是孙中山的叛徒，国民党的败类，人民大众的蟊贼。“四·一二”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发生大变化，表明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公开被收买，投入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又一次处在紧急关头。

对此，刘少奇曾在事变前的十多天，对国内外敌人的可能相互勾结的情况作过中肯分析，他在武汉印务工会的招待会上就指出，帝国主义者看到单纯用暴力手段不能征服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于是又加紧在革命阵营内扶植代理人的阴谋活动。“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方法，分硬软两种，硬即炮舰政策，软即办教堂、学校、报纸宣传等等，来麻醉离间中国人。”最近他们“极力奖励赣州、九江发生的反动行为，挑拨革命战线之分歧，实较炮舰政策为尤凶”[①]。事态的发展证明刘少奇的这些分析完全正确。

毛泽东、刘少奇等共产党人奋起挽救革命，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讨蒋运动。4 月 16 日，湖北省总工会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发表讨蒋通电，宣布蒋介石六大反革命罪状，彻底揭露蒋介石的滔天罪行，表示“谨率湖北全省四十余万有组织工人，誓死为诸同志后盾，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反革命派，打倒……新军阀蒋介石”[②]。继而又发表了讨蒋宣言，指出：“蒋介石明目张胆背叛革命，其罪大恶极实在是罄竹难尽。”宣言号召：“全湖北工人阶级当尽其力量，与革命同志一致行动，向敌进攻，以求打倒蒋介石。”4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号召广大群众起来打倒蒋介石。4 月 23 日，武汉举行三十万人反蒋大会。

[①] 参见《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27 日。

[②] 参见《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4 月 17 日。

紧急时期的三次大会

为了总结教训，指出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确定紧急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在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干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出席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于上年 11 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陈独秀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刘少奇和毛泽东等一起，坚决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这次会议，对怎样争夺领导权，如何改造武汉国民政府、改造武汉国民党，掌握政权、党权，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建立和扩大党绝对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重要问题，都没有提出切实的办法来。其实这些问题中，在党内已有一些人是有坚定认识的。

例如，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根本不认识这一问题，他从对中国革命诸基本问题的错误认识出发，不去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却把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恭让给资产阶级。毛泽东等人坚决主张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担当，认为这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刘少奇明确提出，“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①]并且说，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实现对工农运动的正确领导。他批评那些对工人运动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的错误论调，满腔热情地支持和高度赞扬了武汉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他在 3 月下旬武汉印务工会举行的招待会上说：“工人阶级，是实际奋斗之领导者”，它已经表现出了作革命领导者的“资格与精神”。汉口英租界的收回，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等等，都充分证明，工人阶级“可作领导革命的模范”[②]。我们的同志一定要站住立脚点，切不可跟着反动分子瞎说，妨害已经兴起和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应站在工人运动的前头，带领工人阶级去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解除一切束缚，完成革命”[③]。

无产阶级要不要领导农民，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这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又一严重问题。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既然不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就谈不上要让无产阶级去争取对农民运动的领导，而对工农运动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毛泽东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关键在于实现对农民的领导，与农民结成巩固联盟。刘少奇在 1927 年 1 月，在向湖北全省工人代表的讲话中指出：“欲完成革命，必须先解决农民的束缚。”[①]3 月 10 日，在欢迎

全省农民代表及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又用通俗的语言向农民代表宣传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出：工农的痛苦是一样的[②]，农民受地主压迫，工人受厂主压迫，农民要求耕地农有，工人要求工厂工有，工农应该联合起来，“以达到此目的”民由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宣传和教育，工农联盟的

[①]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版，第 33 页。

[②] 参见 1927 年 3 月 27 日《汉口民国日报》。

[③] 参见 1927 年 1 月 6 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 参见 1927 年 1 月 6 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 参见 1927 年 3 月 14 日《汉口民国日报》。

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工人和农民相互支援、团结合作，非常紧密。土豪劣绅在农村站不住脚，逃跑到城里避风，工人纠察队就把他捉了送回去。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反动势力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农民们也决不坐视，拿出数百万担大米支援城里的工人，等等。　1927 年的春夏，应该说是湖北省工农运动发展的鼎盛时期。全省产业、行业工会和地区工会组织达三百七十六个，工会会员有五十一万余人，占全省八十万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在五十四个县建立了农协组织，拥有三百余万农协会员，占全省三千四百万农民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可受农协指挥的群众约有五六百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建立，更加强了工会、农会组织的权威。湖北全省五十多万工会会员和三百多万农会会员的紧密联合，使长江两岸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呈摧枯拉朽之势，不可阻挡。本来是一片很好的形势，然而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机会主义没有掌握住这样的机会，而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

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仍然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负责全党的领导工作，致使中梁徒具，情况未能有根本改变，大革命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

在革命危急关头，刘少奇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敢于斗争、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他主张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政变，组织工人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抗议，保护工人武装，以反抗敌人的屠杀。同时，他还撰写文章，发表演说，无情地揭露敌人，唤起群众起来斗争。在刘少奇的领导下，5 月 12　R 湖北省总工会发出《省总工会保护工人武装》的通知；5 月 15 日又发表《巩固北伐武装工友宣传大纲》。宣传大纲明确指出，国内的大小军阀们，正在以帝国主义为他们的后台老板，大肆破坏革命，屠杀工人农民和革命党人，因此全体革命工友要一致武装起来。宣传大纲根据事实提出警告，要求接受教训。广东的工农为什么容易被军阀摧残，是因为从前的广东工农群众只有工会和农会的组织，而没有作武装的准备，所以一旦有事，就横遭杀戮。上海的工人为什么能被蒋介石压迫，也是因为武装准备太迟、太少的缘故。这样看起来，我们为什么还不起来要求武装呢？况且在敌人快到来打我们的时候。

“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局势在复杂的环境中瞬息万变，继续恶化，武汉逐渐不稳。5 月 17 日，武汉国民革命独立 14 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谋划拥蒋，率部叛变，进攻武汉，直抵纸坊。在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带领部队奋勇击退叛军的次日，5 月 21 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接着举起叛旗，捣毁湖南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农讲所、特别法庭等革命组织和机关，抢夺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枪支，释放全部被关押的土豪劣绅，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领袖，一夜之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一百多人，逮捕四十多人。这即“马日事变”。这一事变，打响了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6 月 10 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酝酿反共。会后，唐生智回师武汉，镇压工农运动。

在夏斗寅叛变后，武汉国民政府曾答应从汉阳兵工厂中提取两千支枪来发给武汉工人纠察队。而陈独秀为了表示自

己没有什么“阴谋”和对武汉国民政府的一片真诚，不同意工人纠察队接受这批枪。陈独秀对阶级敌人仍抱着幻想，不敢也不愿进行反击，一味退让。而刘少奇却不顾陈独秀的反对，他不遗余力，利用一切机会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反蒋动员。

5 月 19 日，刘少奇出席并主持在汉口召开的“讨夏斗寅大会”，与苏兆征、向忠发同为会议主席。大会后，湖北省总工会发出第 198 号通告，其中说：“各级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要立即担负起武汉三镇的城防守卫任务，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6 月 14 日，刘少奇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尖锐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号召工人群众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及摧残工农和工农运动。刘少奇大声疾呼，对于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等人的叛变行为，应一致反对，应“立即削平湖南叛乱”。在刘少奇的促进下，会议作出《武汉工人目前政治主张》的决议案，提出了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拿办许克祥并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明令保障工农组织的绝对自由；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实行讨伐蒋介石等八项主张。6 月 15 日，领导工农群众举行了大罢工和示威游行，武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了“打倒蒋介石”、“打倒许克祥”的标语。

正当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在革命危急关头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在汉口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性工人代表会议——太平洋劳动大会。

由于中国工人运动自“五卅运动”后在世界职工运动中的地位日益显要，赤色职工国际希望中国工人阶级担负起统一东方各国工会的大任，决定邀请各国的工会代表到中国开东方各国职工大会。英、美、法、苏等国的工会，纷纷派出代表，来中国考察工人运动情况，交流经验，并支持中国的革命。会址原定广州，后因李济深在广州叛变，改到汉口。1927 年 2 月，美国代表白劳德、法国代表多理越、英国代表汤姆等就以国际工人代表团名义到达广州，广泛开展活动。并干 3 月底到达武汉。3 月 31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普海春举行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等的大会。4 月 3 日，汉口又开了数十万人的群众欢迎大会，由刘少奇主持。大会通过了《致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公电》，说：“中国革命潮流的高涨，及中国工人阶级在此革命高潮中的积极奋斗，已经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根本发生动摇了。”[①]

5 月 20 日，太平洋劳动大会在汉口血花世界大舞台开幕。代表共三十三人：苏联代表五人，美国代表二人，日本代表六人，爪哇（印尼）代表二人，朝鲜、法国、英国代表各一人，中国代表有刘少奇、苏兆征、李立三、林育南等十五人。共代表一千四百五十万有组织的工人。还有一些国家和代表团因故被阻，未能出席。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有中国共产党代表瞿秋白，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公博、彭泽民，全国农民协会代表罗哲，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代表詹大悲，湖北省总工会代表向忠发，国民党省党部代表徐虔知等，以及各机关团体代表。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会议从 21 日起，开始商讨世界有关工运的重大问题，由各国代表相继作报告。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大会上作了讲演。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作了《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职工运动》的报告。大会开了七天，通过二十多个决议案。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中国工人阶级，自从被帝国主义侵略以后，几十年来，处在非人的生活状态之下。这种非人的生活，至现在始渐渐走向改善的道路”。在谈到中国工人的痛苦时，他还举了他在湖北应城看到的矿工情况。他强调，中国工人阶级要同世界无产阶级巩固地联合起来，只有这样，

[①] 参见 1927 年 4 月 4 日《汉口民国日报》。

“才能打破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联合进攻的危险”。[①]他痛斥帝国主义者正勾结中国军阀进攻工人阶级，表明中国工人阶级是不可侮的，决心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太平洋各国的无产阶级，誓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把国内的反革命镇压下去。

接着，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武汉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同中共五大、太平洋劳动大会，被称为紧急时期的三次重要大会。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章》，须每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原定 1927 年 5 月 1 日召开，后因集中力量以开好前面的两个重要会议，以及因筹备事繁，交通梗阻和各地反革命势力对工人领袖的捕杀等缘故，最后延期到省港大罢工两周年纪念日，6 月 19 日开幕， 28 日会议结束。

6 月 18 日，先在汉口举行预备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 25 人名单。刘少奇为主席团成员，还有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等。同时决定组成以李立三为主任的政治委员会，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大会宣言、政治决议；以龙大道为主任的经济委员会，负责起草经济斗争决议案；以邓中夏为主任的组织委员会和教育宣传委员会，负责起草组织、教育、宣传决议案；以刘少奇为主任的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各地产业工会决议。

第二天，大会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正式举行。刘少奇参加起草的主席团的开幕通电表明了大会的主旨：“际此反动势力汹涌之时，大会誓与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反对帝国主义者之武装干涉，反对反动派对于农工之屠杀及农工自由之限制，并绝对赞助农民获得土地之一切争斗，与工、农、小资产阶级结成革命同盟，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封建、买办大资产阶级等反动势力，完成国民革命，求得中国民族及被压迫阶级之解放。”[①]

到会的除国内各地工会代表四百多人外，还有英、美、法、苏、日、印度、爪哇等国的工人代表和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国民革命军及各机关、各团体所派的代表，共计三千多人。大会由主席团成员轮流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任总主席，组织部长李立三作政治报告，秘书长刘少奇作会务报告，罗佐夫斯基作世界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讲了话。汪精卫也作了军事政治情况报告。向大会致词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其瑗、共产党代表蔡和森、国民政府代表彭泽民、共青团代表徐玮、总政治部代表郭沫若等。

大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政治报告》、《组织报告》、《经济斗争》等十多个决议案。全体代表对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所作的会务报告，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刘少奇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届执委会，在一年来的工作中取得很大成绩，能够认清革命的环境和时机，对全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作出了适当的指导，如领导省港大罢工，领导工人参加北伐战争，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领导全国工人举行反帝爱国的一小时总罢工，领导各地工会通过斗争不断改善工人生活等。刘少奇指出，有组织的工人现在已有二百九十万，比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工人阶级的力量空

[①] 参见 1927 年 5 月 23 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 参见《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21 年 7 月—1927 年 7 月），第 391 页。

前强大。

大会还针对阶级敌人破坏联合战线、散布指责工农运动的流言蜚语，使城市中到处充满了“工农运动过火”的议论，在决议中指出：“国民革命是以群众的力量而摧毁封建制度的基础，因而在革命过程中，群众的激烈的革命行动，在客观上是必然要出现的。如果指责群众的革命行动为‘过火’，即无异是否认革命。”鉴于武汉国民政府对其统治的区域内所发生的屠杀工农领袖的事件，不作断然处理，决议强调：“为此，除了提醒全国工人阶级及全国人民对这些事件的重视，提出严正的抗议外，并要求国民政府对这些反革命分子以严厉的惩办。”[①]大会还发出声讨许克祥的通电。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候补常务委员。他同其他执行委员一起，继续领导全国工人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

与之相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在接二连三的事变面前显得惊慌失措，越走越远，生怕工农运动“惹事”，生怕国民党右派因此借口造谣，制造事端。为了表白中国共产党是愿意与国民党合作到底的，在 6 月 28 日紧急召开的中央常务会议上，决定解散由刘少奇和李立三等艰苦组织起来的湖北省总工会所属的五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枪支全部交出，甚至连童子军的棍棒、梭标也命令交出。这是中央的决定，刘少奇等人只好组织服从，湖北省总工会宣布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为了应付已经变化着的形势，对付日趋反动的汪精卫集团，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刘少奇等领导湖北省总工会继续坚持深入的工作，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巩固各级工会组织，发动群众有计划地将当时政治面貌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和工人领袖实行隐蔽、转移，把有些干部派到叶挺、贺龙的部队和中央军校，又调一些政治面貌未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周密安排湖北省总工会的秘密办公地点，使省总工会机关及时地转入地下活动。

[①] 参见《中国历次劳动大会文献》，第 204—205 页。

逆流勇进

武汉的炎热 7 月，日益煎熬人。险恶的形势，越趋严重和看得清楚。据 6 月的统计，湖北全省已有四千七百余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工农团体的干部牺牲，作为国民革命中心堡垒武汉，这时已成即将沉没的一叶孤舟，鉴于武汉国共合作最后难免分裂，把在武汉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分散到各地去的工作加紧进行，心力交瘁的刘少奇被安排到庐山养病。

7 月 15 日，汪精卫等人认为全面“分共”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反对，在他们的控制下，召开了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汪精卫大谈“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要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作出“应有处置的方法”。会议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不久，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表现出狰狞的反革命面目，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这样，从 1926 年 12 月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开始，到 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集团叛变为止，作为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仅仅存在了七个月的时间。

“七·一五”以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以党能够掌握的革命武装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委派临时中央常委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这次起义。刘少奇在庐山得到了聂荣臻关于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的通知。刘少奇对起义表示完全赞同。 10 月间，病情不见好转，中央决定他转移上海治疗，并继续他在 5 月底起担任的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七·一五”以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以纠正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确定新形势下的方针。中央紧急会议由瞿秋白主持筹备，8 月 7 日在汉口举行。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成立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工农武装革命的新阶段。面对大革命的惨重失败，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吓倒，重整队伍，拿起枪杆子。

但是，就在开始这种新的战斗，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同时，也产生了拚命主义，急躁的“左”倾盲动情绪。这种新的危险倾向，从“八七”会议时已经冒头，而且不幸地在 1927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取得支配地位。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会议错误认为，“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因此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硬是要求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革命低潮中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使党在实际工作中遭受更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必须重新检讨自己前进的策略。

1928 年 2 月，中共中央为准备召开六大，召集刘少奇、徐特立、罗章龙、江泽楷等座谈，征求党的策略大计。刘少奇坦诚表示，在“八七”会议后，中央对于实行暴动如何才能成功，“很不明了”。他指出，起义的暴动计划，应依照当时群众的力量来制定，应利用一切机会来集聚他们的力量，多给训练，使其在失败时能坚忍不拔。对中央提出的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

题，刘少奇不同意那种仍然一味认为革命形势是高涨的看法，主张要作具体分析。他认为，“依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依城市的看来是低落的趋势”。同时又说，目前乡村中农民的革命虽然是向上涨，还不是农民群众的有意识的行动，因而“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①]总之，刘少奇以其独到的见解，一方面委婉地指出实际上没有什么高涨的革命潮流存在，一方面据此提请中央要注意在城市和乡村中所发生的这种不平衡的特殊现象。他建议，到农村去搞暴动，并指出必须要做艰苦的争取农民群众的思想准备工作，努力使农民的暴动成为有意识的，而不是自发的。刘少奇的无比智慧给那黑沉沉的旧中国指出了继续前进的方向。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的势力，“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要团结无产阶级的群众，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准备武装暴动。大会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并着重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刘少奇没有能出席这次大会，但他被大会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革命的形势发生了转折，革命的方式自然也应相应转变。根据党的安排，在 1927 年的洗礼中益加坚强成熟、年届“而立”（三十岁）的刘少奇，自此以后便更艰辛地领导了白区党的工作和职工运动。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同“左”倾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使党在白区的工作路线彻底摆脱“左”倾影响，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很好地配合了党在乡村中的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一代伟人的青春岁月深深地刻划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①] 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88 年第 1 期，第 29 页。

结束语

每一个伟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每一个伟人又都是他自己适应和把握那个时代的要求而努力不己的结果。在人民的革命运动中自然要产生出自己的领袖来；但领袖决不是自封的。

从前面各章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少奇从青年时代起，就孜孜不倦地热烈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他心悦诚服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就一往直前，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的革命，中国的工人运动。以他的英勇，以他的才智，以他的坚定信念，成为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忠诚、最勇敢的战士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袖。透过刘少奇青年时代的战斗历程，我们不仅能领略一代伟人青年时代的生活、思想、智慧和情操，而且能从中得到关于人生、社会等的许多真谛的启示。刘少奇在青年时期就具备的那些难能可贵的崇高品格，使得他无论在革命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在革命受到挫折的时候，始终以其昂扬的革命精神保持着自己独有的风貌，始终是个头脑十分清醒的革命者，胜不骄、败不馁，坚持从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实事求是，再接再厉。在剧烈的左右冲撞中，不断地依照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党的重大历史使命，坚持或校正前进的方向。

正因为这样，历史在发展中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刘少奇，他一次次担负起重任，在党内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党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两位历史巨人——他和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紧密一致，他坚定地追随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中国共产党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后，随着中国革命获得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刘少奇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就不可动摇地确立了起来。

1931 年 1 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 1933 年春，在中央根据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1934 年 1 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 1935 年 11 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1936 年春赴华北后，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坚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 1938 年 11 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1942 年底到延安，不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45 年 6 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 年 8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离延安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解放战争时期，和朱德等一起转移到华北，进行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少奇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4 年 9 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1959 年 4 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在 1964 年 12 月 21 日至 1965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我们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名字，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息息相连。

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刘少奇虽然饱受中伤、污蔑，不幸过早逝世，但他的功德将永垂青史，昭示天地，与日月齐辉。

正如他自己生前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刘少奇青少年时期大事记
（1898—1928）

1898 年　诞　生

11 月 24 日（农历十月十一日） 诞生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一个世代农民的家庭。

1906 年　8 岁

开始受启蒙教育。先后在柘木冲、罗家塘、洪家大屋等地方上了六年私塾。

1913 年　15 岁

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玉潭学校），接受新式学堂的教育。读了三年。

1915 年　17 岁

参加宁乡县城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身挂“毋忘国耻”标语牌，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为了表示保卫中华民族的决心，将自己的字“渭璜”改为“卫黄”。

1916 年　18 岁

参加宁乡县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要求驱逐通电拥戴袁世凯称帝的湖南都督汤芗铭的运动。夏，从玉潭学校毕业，考入设立在长沙的宁乡驻省中学。继续投入湖南人民的驱汤斗争。

1917 年　19 岁

在军事救国思想影响下，转入谭延闿在长沙开办的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半年后因发生护法战事，讲武堂被毁，回家自学。

1919 年　21 岁

春 插入长沙私立育才高等中学毕业班继续学业。

夏 为“五四”运动大潮所吸引，在长沙和北京投入学生爱国运动。在北京，投考北京大学等校，都被录取。由于缴不起学费等原因，转又选择留法勤工俭学道路。

秋 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高等工艺班（即留法预备班）半工半读。在这里受到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倾向马克思主义和同情俄国的十月革命。

1920 年　22 岁

夏　在留法预备班毕业。由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衰落，又因发生直皖战争，阻留北京。

8 月下旬　返回长沙。经长沙俄罗斯研究会，还有船山学社负责人贺民范的介绍，到上海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作赴苏留学准备。

本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 年　23 岁

春　赴苏途中历经艰难。到莫斯科后，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不管学习生活怎样艰苦，如饥似渴研究马列主义真理如何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

冬　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旅俄支部委员。

1922 年　24 岁

春　根据组织决定回国。先到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后调湖南参加领导粤汉铁路工人运动。

9 月　接受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的安排，去江西安源煤矿，协同李立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经过英勇斗争，迫使路矿当局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使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刘少奇被誉为“一身是胆”。

10 月　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窿外主任。

12 月　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先后被选为执行委员和会长。

1923 年　25 岁

4 月　与一起在安源战斗的何宝珍结为伉俪。何宝珍在 1934 年牺牲后，刘少奇称她“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8 月　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

同朱少连合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个人撰写《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总结工人斗争经验，论述工人经济斗争与改造社会的关系，说明俱乐部奋斗成绩，指明保持以前的成功不使失败的工作方向。

10 月　与李求实合写《俱乐部组织概况》，指出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和军队一般。

1924 年　26 岁

6 月　撰写《救护汉冶萍公司》一文。

11 月　撰写《整顿萍矿意见书》，指出：煤铁事业，为一　切实业之基础，国家之盛衰，国民之生死均系之。汉冶萍存在与否既关系国民生死与国家兴亡，故凡中国国民皆应尽责救护。

12 月 领导安源煤矿工人进行了要求矿局发清拖欠工资、反对矿局取消年终夹薪的斗争，保卫了 1922 年 9 月大罢工的胜利成果。

1925 年　27 岁

1、2 月间 调离安源，赴广州参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和领导工作。

4 月 在《中国工人》第四期发表《“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总结安源工人运动经验，指出独有安源路矿工会在全国工人运动极消沉的时期里，偏偏还能打破一切障碍发展自如的胜利原因，在于安源工人的能够齐心，能够奋斗，又能够看清环境。

5 月 1 日至 7 日 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作《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经过的报告》。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副委员长。

随后，赴上海筹组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并参与领导五卅运动。

6 月 1 日 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刘少奇兼任总务科主任，掌管秘书、庶务等事。在上海总工会的号召下，上海人民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

下旬 致电赤色职工国际及苏、捷、英、法、日等国三十六个工人团体，呼吁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与李立三一起致电英国工团，表示欢迎其派人来沪调查五卅惨案真相。

8 月初 接待全俄职业联合代表，介绍五卅运动情况，指出它实际是谋求民族解放的运动。

8 月下旬 应邀前往淞沪戒严司令部，谈判工人罢工及上海总工会被流氓捣毁的问题。并陪同上海地方检察厅派出的检察官，勘查上海总工会被毁情况，要求依法查办。

9 月 8 日 主持上海总工会所属各工会代表大会，报告 9 月 7 日英国巡捕在爱多亚路向游行示威工人行凶的事件，决定请求各界一致援助，要求官厅提出严重交涉，坚持并争取扩大英商工厂的罢工。

9 月中旬 上海总工会遭反动军阀封闭后，领导上海各工会进行反封闭的斗争。

11 月 由于抱病工作，病势日趋严重，不得已由何宝珍护送回湖南休养。

12 月 16 日 在长沙被湖南省反动军阀赵恒惕逮捕。经全国各方纷纷救援，赵恒惕知民意不可欺，被迫于 1926 年 1 月 16 日批准释放。

1926 年　28 岁

2 月 赴广州。

3 月上旬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的盛大欢迎会。邓中夏在欢迎词中赞扬刘少奇是工人阶级最奋力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不久，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职务。此后，参与领导省港工人坚持反帝大罢工和支持北伐战争。

3 月下旬 先后出席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和广东省教育会召开的香港青工大会，并发表演说。

4 月上旬 出席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致词。主持召开香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着手建立香港总工会。4 月 15 日，香港总工会宣布成立。刘少奇在成立大会上作《全国职工运动》的报告。

5 月 1 日至 12 日 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的报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部部长。

8 月 20 日 纪念廖仲恺遇难一周年，撰写《廖仲恺先生与工农政策》一文，督促国民党要以廖仲恺为楷模，坚定执行孙中山所制定的扶助农工的政策，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10 月 到武汉。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武汉办事处秘书长，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移武汉作准备。

冬 在中共湖北区委推动下，湖北全省工人运动讲习所成立，刘少奇讲授《工会组织法》、《工会经济问题》等课。为开好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适应职工运动发展的需要，加紧编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基本组织》和《工会经济问题》三本理论专著。

1927 年　29 岁

1 月上旬 出席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组织问题报告和修改工会章程的报告，并被选为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会议期间，参与领导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

2 月中旬 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刘少奇主持起草《湖北省总工会告全体工人书》，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到湖北，与广州国民政府迁鄂的意义一样，表现革命的势力已到中国的中心，已成为全国的中心势力了。

2 月 23 日 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声援上海工人总罢工的大会。

3 月 17 日 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指出：在蒋总司令坐镇的江西，竟有国民革命军军官枪杀工会委员长之事，值得国民政府及全国革命民众严重注意。

3 月下旬 在印务工会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帝国主义者正加紧进行在中国的革命阵营内扶助代理人的阴谋活动，“实较炮舰政策为尤凶”。

4 月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湖北省总工会在刘少奇领导下，发表讨蒋通电，宣布蒋介石六大罪状。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 出席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5 月 12 日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湖北省总工会发出《省总工会保护工人武装》的通知。

5 月 19 日 就武汉国民革命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 5 月 17 日于宜昌阴谋拥蒋、率部叛变事件，在汉口主持召开“讨夏斗寅大会”。

5 月 20 日 在太平洋劳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说，痛斥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国内反动派进攻中国工人阶级，表明中国工人阶级不可侮，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6 月 14 日 在湖北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就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事件，大声疾呼应“立即削平湖南叛

乱”。

6 月 19 日至 29 日 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作《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7 月 离武汉到庐山休养。

10 月 转移上海治疗。并继续在 5 月底起担任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1928 年 30 岁

2 月 中共中央为准备召开六大，召集刘少奇等座谈，征求党的策略大计。刘少奇对中央提出的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表示不同意那种仍然一味认为革命形势是高涨的看法，主张要作具体分析，认为“依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依城市的看来是低落的趋势”。

3 月 赴天津、参加全国铁路工会、天津市总工会的领导，并指导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由刘少奇、陈潭秋等主持，负责处理顺直问题。

7 月 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11 月 1 日 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论口号的转变》一文，指出号召群众的口号必须符合实际，一定要依斗争实际形势的转变来谨慎决定。

11 月 16 日 在顺直省委机关刊物《出路》上发表《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吗？》的文章，坚决反对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的情绪。